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宇宙代数学

有人说：“古易八八卦，蔚然成大观。象数与易理，图书独一枝。”同印度《吠陀》、欧洲《圣经》并称为影响世界文明三大宝典的《周易》，以其文字系统和符号系统互相渗透而形成的独特理论结构，与象数义理相统一的神秘特色和内在价值，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周易》像开掘不尽的宝藏，吸引无数学《易》仁人，各家各派，众说纷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代兴盛，经久不衰。今天，《周易》研究已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全方位地展开。这种研究对于启迪人们思维，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特殊意义。

《周易》的框架

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悠久而深

远。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就应对《周易》这部千古奇书有所了解。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秘的幽光。”一般人都认为（周易）是天书，神秘奥妙，深不可测。其实，任何学说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与人类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思维方式紧密相连的。《周易》虽然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它仍然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由那些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智者仁人在生活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周易》，就可以把握《周易》基本框架、内容特色及其精神实质。

《周易》一书分“经”和“传”两大部分。经包括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解释六十四卦的卦辞和解释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传是对经的解释，包括《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个部分，通称“十翼”，又称为《大传》。《易传》对《易经》的义理、象数以及卜筮作了详细的解释。一般认为，《易经》形成于西周前期，《易传》形成于战国后期，从（易经）到（易传）的历史发展长达七八百年。

从形式上看，《周易》可分为符号（八卦、六十四卦）与文字（卦辞、爻辞）两部分。这两部分有机结合，共处一体。卦画本身没有表现出确定的意义，要理解其中蕴含着的

深刻思想，需要借助卦爻辞的文字说明，但卦画卜筮、卦位爻位作为易象，则代表着宇宙间一切事物，是对客观事物的区分和认识。爻象所代表的阴“--”和阳“—”，是对宇宙间各种纷繁复杂事物的高度抽象。卦画变化总是与客观事物的变化相联系的。《系辞传》说：“易者，象也。”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这表明，《周易》一书，符号系统和语言系统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从内容上看，《周易》包括四个方面，即辞、变、象、占。这四个方面概括起来为义理、象数两大部分。义理与象数的统一是《周易》的显著特征。义理寓于象数之中，离开象数就不能深刻地理解义理。《周易》是用卦象来表达思想，卦有卦之象，爻有爻之象，无论是卦象还是爻象，目的都是表意。理解《周易》就要根据辞来了解象，根据象来了解意。

易卦是《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组成易卦的最基本单元是爻。爻的符号是“—”、“--”，象征阴阳两类事物。“—”代表阳、刚、量、君、奇数等，象征积极的事物与独立的性格。易卦中“—”用奇数一、三、七、九中最大的九表示，称“九”；符号“--”代表阴、柔、消极、臣、弱、依附的事物与性格，用偶数二、四、六、八、十的六代表。《易》中阴阳主要表现在卦画上。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变化多端，其根源不过是“--”与“—”两种符号的排列组合。

“--”与“—”两种符号相互重叠构成卦画，卦有八卦、六十四卦。就卦形成顺序而言，八卦的三画卦产生在先，六十四卦的六画卦产生在后，先有八卦，再由八卦“因而重之”产生六十四卦。

八卦为经卦，由三个爻画构成，分别为 ☰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这八种卦画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不同类型的自然现象。八卦再自叠或互叠而构成六十四卦：☰、☷ 等等。由八卦“因而重之”出的六十四卦也称别卦。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都各有其象，各有其位。爻位指易卦中各卦所居的位置次序。爻位由卦的最下一爻或称第一爻往上数，依次为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位次。九代表阳，六代表阴，阴与阳各与位次结合为爻题。在六十四卦中，初、二两爻象地，人立地之上，故二爻为地位；三、四爻象人，人生存在地上，故三爻为人位；五、上两爻象天，人生存在天的下面，故五爻为天位。这种天、地、人爻位的区分是以人为中心而得出的一种直观的、经验的结论。还有一种区分是以阴、阳为基准，易卦六卦中，一、三、五为奇为阳位，凡一、三、五爻位皆为正位或得位。阳爻居于阴位，或阴爻居于阳位，皆为不当位或失位。当位为吉利之象，不当位为不吉利之象。古人还将爻位直接赋予贵贱之名，如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初九、九五为圣人，初六、六四、上六为小人，九三为君子，九二为庸

人，九四为恶人。由此可见，爻位在易卦中十分重要，不懂爻位就不懂得易象、易理。古人正是依照这种爻位模式，来推演解释事物的吉凶好坏。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传》这段话对八卦的形成演化及其意义作了简要说明。由“—”、“--”符号所组成的八经卦、六十四别卦，经过先秦学者、汉代经师、魏晋玄学家、宋明理学家的先后注释阐发，得到系统、完善、深化，逐渐成为一种认识自然、认识宇宙万物的独特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中国的先哲们在三千多年前以观天察地析人事的深邃思辨，创立了《易经》为核心的阴阳之道的世界观，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易经》无愧为中国古代文明之精华。

神秘的思维抽象

《周易》的最大特点和最神秘之处，在于它是用筮与卦来表达思想。或者说，是用象数表达思想。

我国历史上曾有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礼·春官·大卜》）《连山》是夏代《易》，《周易》是西周《易》，其间相距七八百年。这时期，我国尚处于神权时代，君权神授，天神统治着人间，一切学术均孕育于宗教之中。

作为《易》的符号筮卦，更有悠久历史。卜筮这一宗教活动早发生于《易》之前。《易》原本是卜筮之书，作《易》的目的乃是“以神道设教”。为这一目的，《易》必须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因而要借助于卜筮和卦象。以卜筮定吉凶，将吉凶用卦象喻示出来，让人感到卦爻所言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神的旨意。

关于易卦产生，《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之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段话虽不能完全作为八卦产生的根据，但从一个方面也说明，八卦的卦象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抽象化的结果，是一种思维抽象。

社会发展史表明，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人类，认识处在发展的最原始、最低级的阶段。人们只是本能的、自发地直观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极有限的事物。只能凭借当前刺激物所引起的直接感觉、知觉和表象，以及通过相应的行为动作进行思维。随着人类发展到现代人阶段，史前人类的认识也发展到较高阶段。人们在长期的谋生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劳动经验和简单的自然知识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运用一些原始的简单概念，对经验进行概括、判断和推理。这时汉字雏型也就出现了。汉字是典型的结绳刻木的记事符号或象形文字。随着汉字逐渐形成，中华民族抽象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原始社会末期，自然科学知识已有萌芽，人们对自然界的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时，人们试图

用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去代替对事物的虚幻的解释。同时，也试图从关于个别的、特定的事物的认识，发展到对整个世界进行认识，对周围事物进行概括。既然中华民族思维能力已经发展到概念思维抽象概括这样高的程度，那么，八卦创立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易卦是由“—”、“--”两个基本符号排列组合而成的。古人就是依据这些符号卦象，来概括说明天理人事和占卦休咎。

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要从思想上把握复杂的世界，只能借助于思维抽象，运用概念进行思维。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既可用语言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其他的符号表示。在《易经》中，古人是用“—”、“--”这两个符号表达概念的。这两个符号代表的意思，历代学易之人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代表天、地；有人认为代表阴、阳；有人说代表男、女；也有人说表示蓍草长短、奇数偶数等等。不管代表什么，“—”、“--”符号具有最大的抽象性和灵活性。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一切事物，一切时变，从而道出天下后世无穷无尽的前因后果及其基本规律。根据通行说法和《周易》系辞解释，“--”、“—”符号表示阴阳。当人们创造这两个符号时，头脑中就已经有了阴阳概念。而当人们运用这两个符号构成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时，阴阳概念就更加明确，并运用它进行占卜或思维。在《易》中卦画分阴阳，爻位分阴阳，一动一静，一奇一偶，一辟一阖无不分阴阳。阴阳是《易经》最高范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变化

道成为万事万物的准则。

世界万事万物莫不分阴分阳，阴阳是世界事物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最高抽象。阴阳概念就是从各种具体事物抽象出来的，因而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根据阴阳概念，《易》“立天立地”、“通志”、“定业”、“断疑”。《系辞传》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段话说明《易》能够提出前人没有认识到的问题，能够将前人知识丰富提高，使之抽象成为更高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易》是最为普遍、最为抽象的理论。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周易》的概念思维还很幼稚。在表达方式上，它主要运用类比和象征等手法，试图用感性形象来把握抽象，用有限的个别来说明一般，最终没有摆脱感性形象思维的束缚。由于《周易》是用卦爻符号表达思想，通过后人特别是方士术师的注解发挥，《周易》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八卦成了神秘莫测的“黑箱”，八卦学说逐渐与迷信混杂一起。

不管《周易》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如何与宗教神权联系在一起，也不管《周易》筮卦理论的抽象性是如何简朴稚嫩，我们都无法忽视《周易》符号体系和语言体系相互渗透而形成的独特的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生观，尤其是这部著作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周易》在独特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对客观事物规律进行了初步概括。这种概括，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

的。

筮卦作为符号系统，是《周易》阐释义理的重要工具和特殊方式。在《周易》中，筮卦的作用是怎样表达的呢？其意义又何在呢？

首先，筮卦是一种符号代数学。《周易》用筮与卦认识天道，推及人事。《周易》六十四卦所反映的世界，是一个由天地和由天地合德而化育生成的万物构成的和谐的统一体。它由天之道而推及民之故，由自然规律推及社会规律，由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律推及人的思想意识。《系辞传》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同类相聚。同类相聚的事物都具有共同的特点，而相聚的同类事物又以其共同具有的特点与它类事物区分开来。它们有同有异，有聚有分，吉凶就在同异聚分中产生。这表明，易卦变化与生成和自然界中天地万物的变化与生成相一致，易卦变化生成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成的摹写。

《说卦传》第二章从卦的形成来说明天、地、人三才之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仁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之所以为天，是阴晴寒暑使然。从阴晴寒暑这些现象总结出基本规律，则为阴阳，所以，

《易》在卦画上立天之道曰阴曰阳。地之所以为地，主要是山川河流使然，其本质为柔为刚，所以《易》在卦画上立地之道曰柔曰刚。人之为人，主要是社会关系使然，人类活动繁复杂多，然而作为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只有仁义。“仁者人也。”只有相亲相爱，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易》在卦画上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天、地、人三才均与阴阳相通，“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一卦之中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一卦六爻位中刚爻九与阴爻六迭用交错，所居无定。通过分阴分阳与迭用柔刚，卦爻经纬交织，“六位而成章”。

《周易》六十四卦揭示世界的千变万化、千差万别，要求人们从万物的差异中认识万物，寻求物我的关系，安排自我的位置。天、地、人三才各得其位，各守其道。例如，《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万物资始到品物流行，各有各的存在依据、价值和位置，各有性命，各得其所，和谐统一。

其次筮卦是程序规范思维，《周易》运用筮卦这种思维方式阐述义理。

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神话思维》一书中指出，神话也是一种思维形式。他说：“使神话有别于经验—科学知识的，并非这些范畴的性质，而是它们的样式。它们用来赋予感性多样物以统一形式，用来塑造散乱内容形态

的那些合成模式，展示出一种类似和对应的关系。它们是相同的直觉和思维普遍形式，构成了这类意识本身的统一性，因而也构成了神话意识与纯粹知识之意识的统一性。”^① 神话尽管荒诞，但却是世界大多数民族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神话思维和逻辑思维在制定逻辑概念、范畴时有其相似点，即都力图使概念范畴具有普遍性，试图寻找和建立事物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和相互统一性。

带有神秘色彩的《周易》筮卦，作为中华民族先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有着独特的运作规范和程式。筮或蓍，作名词用时，指筹码，用竹子做的叫筮，用蓍草做的叫蓍。作动词理解时，指卜筮活动。早在原始社会，我国就产生卜筮占卜吉凶的宗教迷信活动。对卜筮的意义，《礼记·曲礼》说：“卜筮者，先圣为之所以使民信，曰：‘敬鬼神，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原始的筮发展到《周易》创立时，虽然仍被称为“神物”，但里面迷信成分已减了许多，增加了大量的“天之道”、“民之故”这样的自然、社会方面的内容。有学者对《周易》之筮的性质概括为，以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哲学和知识为内容，以指导人们行动使之服从统治为目的的一种数学计算行为。

筮与卦都是《周易》的“神物”，尽管各有不同的表现，

卡西尔：《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但性质相同。筮通过数学计算表现自己，“圆而神”，运用无穷，变化莫测；卦通过卦画表现自己，“方以知”，止而有定，全部六十四卦的思想内容都藏于其中。《易经》包括筮与卦两部分，并规定了用筮求卦和计算占卜的基本方法。

对筮法，《系辞传》解释说：“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故再扚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大段文字，从内容上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讲筮法的数学基础，二是讲如何揲蓍求卦问题，三是讲六十四卦与数的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筮法共分为四个步骤：（1）“分而为二”。把 49 根蓍草信手一分，分为两部分，两只手各得多少没有定数，得出的蓍草是七、八、九、六四个数中的哪一个数，全在信手一分上。这信手一分也就分出了阳爻、阴爻。（2）“挂一以象三”。从分为两部分的蓍草中拿出一根 放在一边，于是 49 根蓍草形成为三部分。（3）“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就是将两手蓍草四个四个地数，每只手揲四之后的余数不外乎 1、2、3、4 这几种情况。（4）“归奇于扚以象闰，

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把一只手揲过之后的余数作为“扚”放在一边，接着将另一只手的蓍草揲过之后的余数也作为“扚”，与前面的余数放在一起。以上四个步骤算作一个回合，叫做一易。接着又依此法再进行两易，方能得出一个爻来。为什么“三易”才能得出一爻？因为三变的余数的总和有四种可能性，这四个余数分别被 48 减，再除 4，得出七、八、九、六。每“三易”都会得出这四个数中的一个数。奇数七、九称阳爻，偶数八、六称阴爻。经过三变只能得出一爻，一卦 6 爻，故需 18 变而成一卦。

（周易）64 卦，384 爻，阳爻与阴爻各 192，阳爻都是老阳即 9，阴爻都是老阴即 6。每个老阳的过揲之策数是 36，每个老阴的过揲之策数是 24。阳爻 192×36 ，得 6912 策，阴爻 192×24 ，得 4608 策，两数相加得 11520 策。所以，《周易》有了 64 卦 384 爻；“天下之能事毕矣”。

筮的实质是数，卦的实质是画，是符号。由筮求卦，使两者能联系起来，其奥妙在于阴阳共性上面。因为卦画是由阴阳符号组成，数有阴数阳数，当筮在“四营”、“三易”的数学计算中得出七、八、九、六这四个数时，也就意味着由筮方能求出卦来。

《系辞传》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周易》在经这部分主要是讲卦、象、辞。卦有两种，一种是三画卦，即八卦，一种是六画卦，即六十四卦。八卦是由太极、阴阳、四象发展来的，它将万事万物分成八种基本品类并指出这八类事物之性质。由八卦重成的六十四卦，比八卦

具体得多，它从动态方面反映世界事物的变化。六十四卦构成一个大的完整的历史过程，每一卦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一个环节或时代，而每卦中的每一爻则代表一个时代中的六个发展阶段。六十四卦有卦象、爻象之分，卦象、爻象都配有卦名、卦辞、爻名、爻辞，辞的表达依卦画而定，不能随意发挥。

卦名是根据卦象取的。例如困卦之所以称困，是因这一卦有困象。从困卦象看，䷮，坎下兑上，其象一是水在泽下，泽中干涸无水，正是困乏的表现；二是兑阴卦在坎阳卦之上，上六阴爻在九五、九四二阳爻之上，九二阳爻陷在六三、初六二阴爻之中，表明阳刚君子被阴柔小人掩蔽，也是困象。

（周易）画八卦以摄万有，立太极以统乾坤，设阴阳为变化之母；八八六十四卦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可谓博大精深，辉煌至极。千百年来一直被崇奉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正因为《易》道广大，无所不能，凡人凡事都以《易》道为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但由于《周易》是通过筮卦这种神秘形式来开拓自己的认识道路，难免使人们的思维被固定在结构严整的框架模式之中。也由于存在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因而容易表现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臆测和武断。

“变”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有没有长期稳定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特点是什么？对此，中外学术界均持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要把握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了解古代先民思维方式的奥秘，必须深入到《周易》黑箱中去。《周易》为我们能够提供理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的钥匙。

众所周知，《周易》这部珍贵的文化典籍，对中国数千年来的人文历史曾经发生过深远的影响。易道作为一种思维模式、世界观、方法论及逻辑的体系，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而且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政治、伦理、科学、艺术、文化生活各个领域。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少有的。《周易尚氏学》说：“易本用以为筮，故有卦辞，又有爻辞。其所言皆天地间公例、公理。……否泰往来，剥复循环，天道人事，无二理也。包括万有，孕育深宏，凡哲学无不根源于是。”尚氏以《易经》为我国哲学认识的滥觞，不无道理。

哲学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易经》虽然是古代卜筮之官在殷周以来积累起来的卜筮纪录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但其中确有许多具有理论思维色彩的哲学观点。卦爻既反映世界的变化，也反映世界变化的规律。卦爻自身只表明世界万物的具体变化，还处于浑沌自发的无言中。《易

传》则把卦爻关于变化的认识加以提炼，并用哲学语言明确无误地概括起来。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周易》已初步构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由它特有的一系列范畴、概念、命题所组成。太极、阴阳、变化、易、道、神等诸命题，则是这个体系的骨架。因此，《周易》充满了朴素的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集大成和发源地。

中国人的智慧，一个突出的内容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在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不仅《周易》系统讲辩证思维，老庄系统、兵家系统、佛学系统都讲辩证思维。但最有代表性，历史最久远且影响最大的仍是《周易》。《周易》一书蕴藏着辩证思维的萌芽，后来《易传》和易学进一步发展了《周易》的辩证思维，同时又吸收了各家观点，将早期带有某种直观和朴素性质的命题进一步抽象化、理论化，提出了一系列更具有哲学意义的概念、范畴，更接近于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我国古代辩证思维的核心内容是对立统一，其最高范畴是阴阳。把阴阳概念抽象为表述对立统一的最高范畴，并运用阴阳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观点，概括和总结有关自然、社会、历史等知识。《周易》依据“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理，把自然界与社会中的一切变化都看成是阴阳对立的力量交互作用引起的阴阳这一基本矛盾，在八卦中演变为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四对矛盾。天地是产生万物的根源，

雷风水火山泽都是它的派生物。在重卦中，阴阳又进一步演变为三十二对矛盾，如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三十二对矛盾也就是三十二个正反卦，六十四卦都是按正反两卦的形式排列的。重卦中，还有上卦与下卦或外卦与内卦的矛盾关系。可见，《易经》把矛盾关系看成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当然，《易经》所揭露的矛盾并不是事物内部固有的矛盾，大多具有表面性，有些矛盾甚至是虚构的。尽管如此，被披上神秘外衣的朴素辩证法观念仍是认识活动的基本方式和思维活动的基本方法，对辩证思维发展仍起到推动作用。

《周易》由于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作为认识和解决宇宙人生问题的最基本的方式或模式，开辟了中国传统思维之先河。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它通过《周易》的原始阐发而宣告于世并被普遍接受之后，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历时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定势。由此，决定了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这种稳定不变的思维结构和模式，就是传统思维方式。

所谓辩证法贯穿渗透传统思维方式，或者说，传统思维方式充满辩证思维特性，并不意味着在三千多年前产生的思维方式可以与当代的哲学思维方式等量齐观。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先进于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要早于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前 540—约前 480）、毕达哥拉斯（约前 580—约前 500）的朴素辩证法。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中国古代辩证思维要比

古希腊、古罗马深刻得多、系统全面得多。正因为古代中华民族理论思维领先于其他民族，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国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许多璀璨的明珠，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的发展，与儿童的思维和智力发展程序相类似，有一个从肤浅、幼稚到深刻、成熟的过程。以《周易》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思维经验和思维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些是对人类活动自身的探索和反思，有些是对自然界的直接思考和猜测，有的则是通过比喻类比、触类旁通而进行的思维跳跃。但由于奴隶社会末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周易）只能是我国古代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低级反思，是中国哲学的早期雏形。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周易》体系中确已形成，则是确凿无疑的史实。

第二章

《周易》的唯象思维

《周易》的象是筮卦的符号系统，它是由“—”“--”符号组成的卦画表现出来。

象的观念起源于古代的卜筮活动。“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左传·僖公十五年》）原始时代末期，先人用龟甲兽骨一类东西占卜，比较简单地决定一件事情做还是不做。根据安阳殷墟考古发现，商代后期大量使用龟甲兽骨，通过刀钻火烤裂纹所形成的“象”来推断吉凶。我国周原出土的甲骨说明西周早期也用甲骨占卜，甲骨上有筮数的记载。卜筮源于记事符号，用符号来求数目字，奇偶两个符号，用以表示一正一反两个方面。这两个符号排列组合，以六个为一组，可以出现六十四组各不相同的卦。考古资料表明，甲骨上的筮卦都是六个数目字一组，古人是用筮卦形成的规律和体系即象来推断吉凶，预测未来。

《易传》说：“易者，象也。象者也，像也。”又说：“圣

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这说明“象”是客观事物的模拟，但这个摹拟并不是像照相那样照下来，而是用一些符号来表示事物的“道”与“理”。卜象并非直接摄取万物的图象，而是以极抽象的奇“—”、偶“--”符号的不同排列而形成的卦画去分别指代万千世界。而《易经》正是运用“象”来托物言志，以“比喻”、“征”、“比”、“兴”等特殊手法来“明义”、“明人事”、“统会其理”。

我国古代巫史用象数符号建立起来的这一思想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分成两大学派：象数派和义理派。前面说过，卜象并不是直接摄取万物的图象，而只是以抽象的符号形式图解世界。象数是《周易》原有的重要内容。象有卦象、爻象，是作《易》者于宇宙万物中为卦义所取的法象。通过取象，处于六十四卦不同位置上的卦爻，才能借助所取法象得到说明。没有象，六十四卦就不能表达任何思想和意志。最初，六十四卦并无文字说明，就像一幅画，人们通过看“画”就能明白其中意思。古人把自己长期观察、体验世界的经验认识融汇在易卦中，里面蕴藏着关于世界知识的丰富“义理”教人遇事决疑。当然，作为愚昧时代人们掌握自身命运而形成的易学说，容易神秘化、迷信化。这就为《易》学分裂提供了温床。以孔子（前 551—前 479）为代表的儒学以《易》天道人事为归宗，形成义理派；而汉代经学则发挥《易》中的占验卜筮，滥用象数，穿凿附会，形成易学中的象数派。

象数派提倡象数。汉代经师如京房（前 77—前 37）、郑玄（127—200）、荀爽（128—190）等利用《周易》筮卦，结合阴阳五行、日月星辰、四季物候的变化创立所谓互体、旁通、卦气、爻辰等象数模式体例，宣扬神学迷信，使丰富的《易》理，变成神秘的教条。象数学着力阐发《易》中的卜筮迷信部分，增添了许多原来《周易》没有的内容，形成了象数学独特的思维模式。

象数学是汉代经师们利用《周易》的思想框架，熔铸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律历等方面思想文化资料，构建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并为自然立法，为处世垂范，为封建统治提供理论根据，陷入了唯心的神学迷宫。

《周易》象的建立，从认识论角度看具有两大作用：一是通过象数模式体例，将世界万事万物简约化、规范化，使思维从具体到抽象；二是利用抽象符号，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充实内容，使认识又从抽象到具体。这两方面作用形成认识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周易》唯象思维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

因象明理的卦象比拟

我们知道，《周易》是用“—”、“--”符号组成的卦画，即象来表达其中的思想的。人们主要是通过象捕捉内容，根据象来理解意。设卦、观象、明理是《周易》思维方

式的特点。

《周易》的象有三种指称：一是指阳爻 —、阴爻 --；二是指具体的实物；三是指无形的东西，如鬼、神、精、灵气等。但最根本的象是阴阳。《易》是以阴阳为卦画来反映世界及其变化。由阳爻、阴爻组合而成的卦，是一种象意符号，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其代表的天、地、雷、风等自然现象与性质，都是符号赋予的。卦画代表的内容依筮人占卜吉凶时的要求而定。所以“神无方而易无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 唯变所适。”（《系辞上传》）

揲著求数，因数设卦，由卦观象，依象系辞，并以此推断未来之吉凶，这是（周易）的体例和方法。这里的精髓是卦象，人们正是通过卦象及其变化去象征天下万物及其联系。

从根本上说，“象”是从观天察地的社会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它有双重含义，其一指事物的形象，其二是象征、类比、比拟。但（周易）里的“象”不是事物的图形临摹，也不是用词语形容，而是以奇“—”数和偶“--”数表示出来。它们的不同排列和重迭，象征着万千世界的复杂变化。正如《易传》所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极其数 遂定天下之象。”《易经》力图用象征比拟的思维方式揭示自然和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关系，并依据这些关系说明事物变化的原因。

作《易》的人先设卦，即画出六十四卦的卦画，如乾卦

画为 ☶ ，坤卦画为 ☷ ，屯卦画为 ☳ 。其次是观察卦画之中的象。最后系辞，在卦与爻的下面配上文字加以说明，让人一看卦辞就知道吉凶。例如：

泰 ☶ (下乾上坤)

泰，小往大来，吉，亨。（泰卦，小往而大来、亨通）

初九：拔茅如，以其汇，征吉。（第一爻：拔起相连的茅草，以其汇集，出征有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第二爻：包容八荒，利用冯河，不遗失远向，没有私朋，配了中正而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第三爻：没有平路不起坡的，没有过往的事物不反复的，在艰难中守正，无灾。不要体恤，要诚信，会有食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第四爻：翩翩轻举不能使邻里富有，不戒备信用。）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第五爻：帝乙嫁女，福祐大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第六爻：城池变为沟坑，不可用兵，自己在邑中宣告命令，守正，忧吝。）

又如，否 ☷ (上坤下乾)

卦辞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否卦，无人道，不利于君子，守正，大往而小来。）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第一爻：拔起相连的茅草汇集，守正，吉祥，亨通。）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第二爻：包容承受。小人有吉，大人闭害处塞，亨通。）

六三：包羞。（第三爻：包含羞辱。）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第四爻：有天命，无灾，同类得福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第五爻：否运要休止，大人有吉。将亡将亡，系结在桑木上。）

上九：倾否，先否有喜。（第六爻：否要倾变，先有否而后喜。）

上述泰卦和否卦都有卦辞、爻辞，而且卦画上表现为乾坤互置，上下相反。否是泰的反面。泰是交通，否是闭塞。泰是天地交通而万物生，否是天地闭塞不通而万物不生。泰是上下交而志同，否是上下不交而志不同。《易经》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既讲自然界的规律，也讲社会人事的道理。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人事两种规律有其一致性。泰卦、否卦就是明显地把自然界的规律和社会人事规律放在一起对待的。泰象征天地之间与人类社会有时会出现一种交通和畅的最佳状态。这种天地相交、二气相通，在卦画上反映出来就是乾下坤上。天在下，表明天气上升；地在上，表明地气下降。在上的往下降，在下的往上升，两者必然相交。否卦则不然，坤下乾上，天在上，天气未曾下降；地在下，地气未曾上升，二者必然不相交。否卦表明天地不变、世情闭塞。

《周易》六十四卦，卦卦都深含着义理。义理是根据卦象推断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一卦象都喻意一个或一些道理。从乾卦看，它的义理有三点：第一，自然界存在着两种相反的东西，它们能够相交相通。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相交是普遍存在的。它贯穿在万物之中，是万物生长发育茂盛的根本原因。阴阳相交，引申到人事问题上，君上与臣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也有上下相交而志同的时候。这时，社会生产发展，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泰的出现。第二，平陂城隍、泰极而否，一切事物都在无情地变化，由量的变化达到质的变化，这是客观规律。天道如此，人道也如此，谁也无法抗拒。第三，君处泰之时，要特别小心谨慎，不能盲目乐观，不然就会乐极生悲，泰极否来。要做到“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既要大度宽容，容忍一切可以容忍的事，也要奋发向前，锐意改革。既要远近亲疏兼顾，又要绝去朋比，无私无偏。

从否卦 ䷋ 卦象看，上三爻与下三爻与泰卦都是相应的，但泰否卦也并不相应。泰卦初征而四孚，二中行而五归妹，三陂平而城复，凡相应之爻义也是相交的。否卦初拔茅而四有命，二大人否而五大人吉，三包羞而上后喜，相应之爻，爻义都没有相交的意思。但否卦六爻之爻辞不见一凶咎字。原因在于否卦六爻阴阳平分，像君子与小人并生于世上，尚未到柔剥刚的时候，小人为害并未显著。如果六爻一阳在上受五阴之剥卦，即 ䷖，方成小人的世界。就否卦全卦看，君子道消 小人道长，“不利君子贞”。然而，从其各爻排列

看，情况并不是于君子不利。上卦三爻皆阳，君子在上，否已过中，形势于君有利；“休否”、“倾否”已势所必然。此时，只要大人君子顺应规律，心存危惧，积极行事，谨慎从政，便可以无咎得吉。这就是“先否后喜”。下卦三爻皆阴，小人皆受君子之治，自顾不迭，无暇无力将其为害君子的愿望变成现实。由于六三“包羞，位不当也”，小人便不能施展其用心，只能忍辱含垢，接受君子统治。一旦由位不当变为位当，小人便有可能干坏事，君子务必注意提防。

通过对泰否两卦的卦爻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易》中的象数与义理环环相扣，每每相应，卦象比附义理，义理蕴含于卦画之中。抽象简单的奇数偶数方程式，表达了万事万物的样式、形态、变化、发展、本质和规律。我们正是透过卦象比拟，掌握《周易》所提示的宇宙发展和人生变化的大道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周易》除了以卦画、卦序及其演变象征事物及其规律外，还用卦辞、爻辞的意象象征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虽然，卦画、卦爻辞比拟的事物和联系往往缺乏科学根据，是主观上的想象附会。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应肯定这种直观的感性认识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思维模式，属于一种低级的理性认识或抽象思维。它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理性的觉醒和认识能力的飞跃。

从人类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看，《周易》运用卦象比拟进行唯象思维，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人们认识能力受到实践手段和实践范围的制约，大

自然虽然向他们敞开了怀抱，但能反映到头脑中的认识却十分模糊而神秘。在当时，文字初造，语言简陋，言不足以属意，于是立象以属意，便成了认识的必然性。同时，人们的思维基本上是直观的、片面的、表面的抽象，形象思维是主要的思维工具。人们往往用这种自发的、宗教和艺术（形象）相结合的手段或工具，对扑朔迷离的自然界进行认识。这种认识反映在《周易》中就是一卦一事一爻一物的思维模式。

根据后人所作的《说卦传》，八卦的取象多达 102 种，在基本卦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基础上象征 102 种事物。

乾：天、圆、君、父、玉、金、寒、冰、大赤、良马、老马、瘠马、驳马、木果。

坤：地、母、布、釜、吝嗇、均、子母牛、大舆、文、众、柄、黑。

震：雷、龙、玄黄、敷、大涂、长子、决躁、苍筤竹、萑苇、行、杀。

巽：木、风、长女、绳、工、白、长、高、进、退、不果、臭。

坎：水、川、隐伏、矫柔、弓轮、劳、忧、赤、薄蹄、曳、通、月、盗、多心。

离：火、日、电、中女、甲冑、戈兵、大腹、鳖、蚌、龟、槁、赢。

艮：山、径路、小石、门阙、果蓏、闾寺、指、狗、鼠、多节。

兑：泽、少女、巫、口舌、毁折、附决、妾、羊。

八卦取象虽多达 102 种，但并不能反映世界万物的各种复杂情况，因而八卦相重，排列组合成六十四卦，其象征意义就大大地扩大了。每一卦都有一系列指物性的含义，既包括具体实物，又包括事物的属性、关系和特征。它们充分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对宇宙间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联系和思考。

《周易》由于用卦象表征了物及其性质，筮卦的原理与义蕴包含在卦象、运数与卦爻辞中，这就使《周易》中的哲学思想、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被笼罩在神学迷信的形式下面。本来，人们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感官接触外部事物，从而获得关于个别事物的片面认识，然后去粗取精，综合概括，上升为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需要借助思维工具进行加工改造。《周易》不是借助于科学的逻辑思维和概念分析把握自己的感觉经验，而是通过卦象进行类比思考。占筮得来的卦象实际上也是一种思维抽象，但它同客观事物本无关系。卦象解释主要是依据人们的生活经验，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都可以用卦象联系起来。通过卦象比拟获得“真谛”，因象明理，以象代思，主观臆测，任意比附。

这种因象明理的唯一思维，运用卦象类比，找出两个特殊对象在同一种关系中地位和作用的相似点，给人的认识予以某种启发，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以卦象、物象为工具的唯一思维模式，在人类早期认识活动中是自然产生的，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在那时，人类认识总是与宗教神话纠缠不清，自然界的必然性使人类怀有强烈的恐惧感和神秘感。

人们崇拜自然力量，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形成各种事物的神话宗教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借助某种符号形式，反映他们对自然力量的观念。哲学家卡西尔说：“神话的每一种源头，尤其是每一种巫术世界观，都渗透了对符号之客观性质和客观力量的信念。词的魔力，形象的魔力和文字的魔力是巫术活动和巫术世界观的基本要素。”^②在所有的文化形态中——神话和语言、艺术形态以及关于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概念的形式——符号发挥着积极的、创造性的力量。这种情况是多种文化形态间对应关系的实质性因素。”这就说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活动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符号形式。符号的表征功能超越了客体的现实，使人的表象内容与符号内容直接融合起来。《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它采用的卦象符号体系和唯象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殊标志，促进了古代人们认识活动的不断发展。我们要在认识其积极和消极二重性的前提下，充分肯定其地位和作用。

创意解经的卦象推导

《周易》唯象思维在后来的发展中突破了一物一象，单

② 卡西尔：《神话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7页。

一对应的象数比拟模式，形成了象外生象，“互体”推导、触类旁通、互为变卦的卦象推导模式。“神无方而易无体”，“惟变所适”，这是《周易》卦象的根本特点。无论讲卦象、互体、旁通，还是讲卦变卦爻变，相同之处就在于象外生象，卦爻辞牵就卦象，使言、意、象达到统一。

《周易》卦象由两个单卦上下相叠而成，单卦仍保留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原始意义，但其作用已不局限于自然物质而加入了人的因素。有的作为比喻，有的作为象征，让读者通过形象思维而对卦义有深刻的理解。卦象与卦辞配合，卦象用来当作卦文的示意图，卦辞也就是看图说话。例如遁卦：䷗ 艮下乾上，这一图象为什么取名遁卦？根据《序卦传》的说法意思有三：（1）艮下乾上是说“天下有山”，隐退者为了躲避世人，往往隐居山林之中，故卦象为遁，遁为消失隐退的意思。（2）乾为天，艮为山。天在上，是阳物，有上进的性质。山是高起之物，又是止之体，有上陵而止不进之象。一个要上进，一个上陵而止不进，乾艮相违，故卦名遁。（3）卦中二阴自下而生，是阴将长而阳渐消的时候，小人渐盛，君子当退而避之，皆遁。由遁卦卦象，人们可推导出象外象，引申出君子处世之道等许多意思。君子观道之象，受到启发，知道了应该如何远小人的问题。在遁的时候“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对待小人，不可使他知道你憎恶他，否则他必加害于你。但是与小人的界限要严格划清，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对小人让步，让小人知道你是不可侵犯的。“不恶而严”就是要外顺内正、待彼以礼、自守以坚

之意。

又如兑卦，䷹ 兑下兑上，卦辞为“兑、亨、利贞”。兑卦之义实际上是讲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和悦（悦就是兑）的关系问题。与人建立和悦的关系，是一件好事情，各方面都不至于反对，所以悦亨，悦而可以致亨。但与人和悦是有条件的，悦必以贞正为先决条件。悦不以正道，则为邪谄，邪谄是君子所不取的。还有一种兑卦解释，认为兑卦是商业的总结，卦象是重兑，兑为泽，泽犹润也；商人以利润为目的，兑上加兑等于悦利上加利。在这种解释中，兑是承用旧名而赋予新意之卦。

根据刚柔相长原理推断四时变化。《周易》把对立面的转化描绘成刚柔（亦即阴阳）消长的过程。刚长柔消，柔长则刚消。刚柔相长的过程实质上是刚柔渐变、相互取代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自然界客观规律，也是客观的自然过程。《周易》六十四卦有十二个特殊卦象，它们的刚爻与柔爻自初至长排列而不相错杂，这就是 ䷗ 复、䷒ 临、䷊ 泰、䷡ 大壮、䷔ 夬、䷀ 乾、䷞ 姤、䷋ 遁、䷏ 否、䷓ 观、䷖ 剥、䷁ 坤。从这十二卦象看，阴阳柔刚变化很有规律，前六卦是阳爻逐渐增加，阴爻逐渐减少，后六卦则相反，阳爻逐渐减少，阴爻逐渐增加。正是根据这一刚柔相长规律，《周易》把它与一年十二个月联系起来，认为十二卦的刚柔消长是天道运行十二个月消息盈虚的反映。“变通配四时”“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序卦传》）阴长阳消，阳长阴消，反复无穷，此乃天道。自然界中的天地日月

星辰运行不止、日月盈亏、四时交迭、昼夜更替是自然规律，非人力所能为。

把十二消息卦同十二月明确联系在一起，并使成为一种卦气理论的是汉代易学家所为。汉代的孟喜、京房以卦象解说一年的节气，提出卦气说，即用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认为春是少阳、夏是老阳、秋是少阴、冬是老阴，把一年四季用坎 ☵、离 ☲、震 ☳、兑 ☱ 四卦表示。震为动，比喻春天万物萌生；离为火，表示夏季暑热似火；兑为悦，喻示秋天万物生长，人们喜庆丰收；坎为劳，配冬天，万物疲劳，处于蛰伏休息状态。另一易学家虞翻提出十二月卦，他说：“变通趣时，谓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遁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谓十二月消息相变通而周于四时也。”根据这段话，我们将卦、月、时对应列表如下：

表 1

| | | | | | | | | | | | |
|-----|-----|----|----|----|----|----|----|----|----|----|-----|
| 复 | 临 | 泰 | 大壮 | 夬 | 乾 | 姤 | 遁 | 否 | 观 | 剥 | 坤 |
| 11月 | 12月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 子 | 丑 | 寅 | 卯 | 辰 | 巳 | 午 | 未 | 申 | 酉 | 戌 | 亥 |

汉代京房等人把中国古代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理论纳入八卦体系，将八卦各配以十干，将各爻分别配十二支，创造了“纳甲说”。（因甲是十干之首，故称纳甲。）对“纳甲说”，三国吴人虞翻（164—233）解释说：“甲乾乙

坤相得合木，谓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兑相得合火，山泽通气也；戊坎己离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风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阴阳相薄而战于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郑玄以卦象配二十八宿，创立了所谓的“爻辰说”。该说是以乾坤二别卦象征太极，其阴阳十二爻相间排列以纳于十二地支。以地支分布于四方以代四季十二月，然后每季纳七个星宿。构成四个同心圆相迭二十八宿爻辰图。图中每一星辰都有对应的爻位。爻辰图是典型的为自然立法，将象数推演的结果作为天体运行规律。

以上卦气说、纳甲说、爻辰说，都是汉代的易学家按《周易》象数推演排列成整齐划一的模式，用以框套四季、十二月、节气、物候、星辰的运转变化周期，模拟自然，绘制图象。它们对当时人们所取得的一些感性直观知识作某种形式上的归纳总结和排列组合，使其图式化、形式化、序列化，模拟转化，以预测未来。后来，这些学说长期被术士巫师所滥用。

为使《易》象变化无穷，说明更复杂的事物，汉代象数学家们还发明了“互体”、“旁通”的卦象推导方法。

所谓“互体”，即一卦六爻，除初爻与上爻外，中间二、三、四与三、四、五爻又交互而成两个三画卦，如随卦 ䷐ 的二、三、四爻构成艮卦 ䷳，三、四、五爻构成巽卦 ䷸。这样，一卦于上下二体之外，又增加两卦，不但卦象增加一倍，而且还可以将本体与互体参互取象。由此可见，互体说

旨在象外生象，扩充卦象容量。

所谓“旁通”，是一卦之中，阳爻改成阴爻，阴爻改成阳爻，构成新卦。新卦与原卦的关系就是旁通关系。如否卦 ䷋，阳改阴，阴改阳之后，就变成泰卦 ䷊。又如复卦 ䷗旁通为剥卦 ䷖。说明卦象相反之卦，可以相通。旁通之卦与原卦的卦象相反，使人们不自觉地运用相反相成的矛盾法则，学会从对立面考虑问题。当然，这种思维方法并非旁通论者的初衷。旁通论实质意义是象卦外生象，曲意附会，借象解经。

《周易》象数学创意解经的卦象推导，其思维方式是一种唯象思维。这种思维是将万事万物纳入主观创设的象数框架中，根据阴阳消长原理，结合星辰运转、万象变化的周期规律，阐发易理，以象解经。从而将《周易》神秘化、图式化、程序化，并通过易象的模拟转化，形成一套固定不变的唯象思维模式。

神秘莫测的卦象推导中的象外生象的互体旁通和图式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启发人们的思维，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中国古代天文、历象、物候等自然科学的萌芽发展与易象推导不无关系。卦象类比和推导，能诱发人们的想象力。人们能够在文字和符号两大系统相互转换过程中，推断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领悟自然界的有机联系和无穷奥妙。这就为人们的思维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八卦虽然简朴，寓意却十分广泛，且能启示思维，是打通科学联系的一把钥匙。学者们普遍认为研究《周易》，大

有文章可做。有人认为，六十四卦象中已显示出了当今的发明创造，例如涣卦像大舟，讼卦像铁船，未济卦像汽船，否卦像飞机，晋卦像无线电，复卦像地雷，等等。还有报道说，曾在法国留学的博士刘子华，用了三年时间研究太阳系各星体与八卦图的关系，证明每一对偶卦所属星体的平均轨道速度和密度，均为一个恒数。根据这一观点，他预测太阳系除九大行星外，还有一颗行星存在。他称这第十颗行星为木王星。他的博士论文《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日月之胎时地位，一颗新行星的预测》经过中外许多专家评审，通过答辩并于前些年公开出版。刘子华对第十颗行星的预测虽未经证实，但已引起世界有关学者的广泛重视。用八卦来研究现代天文，表明《周易》与科学的联系和对人们思维的启发意义是十分深刻和深远的。没有《周易》卦象的引申和推导，不找出不同事物的相似点和偶合系列，就不会有《周易》预测功能，对古代和现代的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立象尽意的意象思维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要把握事物的具体意义，往往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来进行。这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被称之为意象性思维。好类比，贵意象是《周易》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意象思维活动，带有具体性、经验性和直观性。它是以“象”作中介直接把握事物的理性具体即意。强调“象”，突出“象”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是唯象思维的中心内容。《周易》象数学中的八卦先天图、后天图、洛书图、六十四卦方位图、圆图、方图、太极图、无极图等等，都是运用阴阳符号组成的图象表现思维。这些图象都是古代人们思维的载体。思维的真正目的在‘得意’，《周易》就是通过卦爻符号体系来阐发天道人事。六十四卦及其所有的变卦，都蕴含着天地万物化成更新的深刻意义。

“立象以尽意”是中国古代人们思维从低级向高级的初始阶段。人类思维发展轨迹表明，图腾、巫术、神话思维等是人的行为思维向概念思维的过渡。这一过渡也是思维摆脱世界，“思维”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的独立化过程。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在思维独立化阶段，行为思维要变成概念思维，需要想象力、构思力，更需要思维操作工具——语言和符号。思维只有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独立。而人类语言符号体系的建立是与拟人化的我与思维分不开的。人类一旦把“我”异化出去，实现主体与客体分离，就会把自己幻想成超人，可以超越人类自身而变成主宰自然的力量。这样，就产生了图腾、巫术和神话，人类正是经过图腾、巫术、神话这些幻想形式，获得思维抽象能力的发展。由此形成抽象、想象、构思、比拟、联系、转换这些思维能力，还形成了诸如因果、相互联

系和转化、同一、差异等观念。

《周易》中的“—”、“--”符号何时形成，史学上说
法不一，但肯定产生于图腾、巫术、神话较为发达的年代。
据古甲骨文记载，我国殷周时代是迷信龟卜的，龟卜和占筮
是上古时代人们向天神或鬼神卜问吉凶祸福的方法。我国古
代神话《夸父追日》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对世界的探索，西
周时形成的卦象符号，表明了人们对自然界认识升华到一个
新阶段。八卦是以形象为思维中介。这种认识是先把握形
象，然后把握关系，具有经验性、直观性、内隐性、多义
性。同巫术思维、神话思维一样，八卦思维也是一种民族思
维形式，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思维框架和思维准则。

八卦思维是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符号性思
维。它既不同于感性的知觉表象，又不同于理性的抽象概
念，而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的意象思维。由阴爻阳
爻排列组合成的卦象隐含着自然、社会发展变化的道理。在
卦象中，符号和意义、形象和本体、思维主体和客体对象完
全合一。对此，《系辞传》概括说：“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
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
是故爻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
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就
是说，八卦以其卦象告人，爻辞和卦辞以其文句说明所占之
事的情况。刚柔爻象杂居一卦之中，表示事情的吉凶。爻象
的变动，是由于客观事物利害关系的变化，要随着事物变化
情况来判断吉凶。这段话对卦象和卦爻辞的作用做了说明，

并指出吉凶的由来是爻象变动所致，清楚表明八卦思维中符号和意义是有机统一的，是一种典型的意象思维。

《周易》运用卦象和卦辞阐发万物之义理，由符号形式的关系推论出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复卦（䷗），震下坤上。复是反本的意思。从卦来看，一个阳爻在五个阴爻之下，是阴极而阳反。对此，《序卦传》的解释是：“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就是说，阴阳消长是自然规律，阴可以剥阳，但不可以剥尽，剥到极处，阳便要复生。阳被剥极于上，就要复生于下。其间不会有一忽的间断，所以，剥卦（䷖）之后是复卦。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看寒暑变易，夏至十月阴盛至极，到十一月冬至的时候，阳气反生于地中。

复卦的卦辞和爻辞反复说明事物盈虚消长，对立而依存和转化的规律。“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复，吉；六三，频复，厉无咎；六四，中行独复；六五，敦复，无悔；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卦是讲阳被剥掉之后，又回复如初的道理。初九处在复卦之初，是最近最早的复，所以，不至于悔而得“元吉”。对一个人来说，有了过错就能认识到，认识了就改，这样就不至于后悔莫及。认识到过错马上就改，这就是“不远复”。上六以阴柔居复之终，有迷而不复之象。迷而不复，犹如一个人犯了错误不知悔改，动辄得咎，其凶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行师打仗，

必然大败告终。在此情况下治国，则君主必凶。只要迷而不复的状况不改变，便永远“不克征”，永远有灾祸，永远失败，永远“以其国君凶”。每卦在复的时候，一阳在下初生微动，纵然有五阴压抑在上，也显得生机盎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它停止向上的成长。这就是“天地之心”，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中刚柔相摩、阴阳消长、剥极而复的客观规律。

《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是一部哲学著作，概括了天下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故能“明天之道”、“察民之故”。有专家认为，六十四卦卦爻辞为周文王，周公所作，是当时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不是“筮辞的堆砌”，更非“迷信的典籍”。认为《周易》卦爻辞是在东土既定、殷民未清的情况下，周公、召公为了使德治保民的方针贯彻执行下去，永保周朝的长治久安，便命人将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记录下来，以指导后嗣子孙治国兴邦。《周易》卦爻辞所体现的天命不常，“革命”合理，事在人为，以德化民，修身齐家，自纳于德，民心可畏，见盛知衰，殷鉴不远，自强不息等观点，孕育了孔子仁义观念和德治主张，对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周易》上述思想并不是以史记典籍形式写成的，而是以占筮参考书形式发挥出来，所有观点都是用卦爻辞表达，并以卦画排列次序反映其道理义蕴。例如，“以德化民”思

想在“蒙”、“否”、“姤”、“恒”、“损”、“井”等卦中有所阐述。“蒙·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意为包容殷民，令男娶妻，让妇成家，君民两利。“恒·初六”：“浚恒，贞凶，无修利。”意为，对民煎熬太久，事必凶多吉少，对我无有所利。

由于《周易》总结了周灭商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等一系列人事观念，并付诸实施。因而，《周易》关于天命、政治、伦理道德的根本观点，就成为西周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石，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发展的源头。从中，可以看出《周易》的创立主要是为西周统治阶级服务的。六十四卦中，乾卦居首，以龙象征周朝统治者。龙处于变化之中，呈现出“潜龙”、“飞龙”、“亢龙”、“群龙”等或凶或吉状态，出现或“在田”，或“跃在渊”，或“飞在天”，或“战于野”等有利或不利的处境，但最终是“中行独复”，“反复其道”。这一卦象意味着，周王朝尽管经过君王更迭、兴衰强弱的过程，但最终还是要归复到周初的兴盛之道。

《周易》是在周贵族战胜殷贵族并建立了西周奴隶主政权的变革时期成书的。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必然要反映西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意识。由于当时社会崇尚卜筮迷信，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低下，西周奴隶主的意识形态采取卦象这种特殊的意象思维模式反映出来，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周易》采用意象思维方式表达天理人事，并借用符号和文字两大系统的相互转换，将深奥的哲理寓于简洁严整的卦象形式中。把思维内容纳入符号系统的框架图式，必然要

求对思维内容进行加工整理，使之条理化、明晰化、概念化。而人们正是运用抽象符号形式来推论出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这种抽象符号形式思维的特殊性使《周易》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性，使意象思维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削足适履”，机械套用等消极作用。但是，我们充分肯定《周易》意象思维方式对人们锻炼思维，开阔视野，提高思维能力的意义和作用，充分肯定它在中华民族早期认识活动中的主导性和必然性。

第三章

《周易》的整体思维

《周易》把阴阳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看成是自然界和社会万物生成发展的基础。阴阳交感而万物化成，气化凝聚为万物。为此，《周易》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涵盖极广的哲学命题。世界万事万物莫不起源于一阴一阳的合二而一，任何事物都按照一阴一阳的规律发展变化。基于阴阳概念具有包揽一切的普遍意义，《周易》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衍生万物，世界是一个“生生之谓易”的有机整体。在这有机整体的范围内，阴阳相推，刚柔相摩，“先否后喜”；“否极泰来”，一切对立和变化都会自我调节，最后达到事物自身平衡稳定的“常道”。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并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变化中求不变，两极相融，对立统一，是《周易》整体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则。

阴阳统一 整体思维的基础

阴阳、奇偶的对立的观念是《周易》体系建立的基础，也是其整体思维的基础。没有阴阳对立这一基本矛盾，八卦、六十四卦就难以成立。阴阳这一基本矛盾，在八卦中演变为天与地、雷与风、水与火、山与泽四对矛盾，进而演变为重卦之间的三十二对矛盾，如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等。六十四卦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是按正反两卦的形式排列成体系的。上卦与下卦也往往表示事物的对立与矛盾关系。例如无妄卦 ䷘（震下乾上）与大壮卦 ䷡（乾下震上），从卦象看，无妄卦为帝王权威之象，天有雷霆；大壮卦则相反，表示人民反抗的力量壮大，足以危及帝王统治。由于六十四卦是由八种卦画“因而重之”得来的，因此，上下卦颠倒互为两端的情况多次出现。将原卦和颠倒卦合为一组，表示一件事物的两端或多歧现象。如损卦 ䷨（上一阳爻，中三阴爻，下二阳爻），上下颠倒就成为益卦 ䷩（上二阳爻，中三阴爻，下一阳爻），上下两端正好相反。损、益两卦表示一种结果之两端。又如渐卦和归妹卦，其内容为妇女守节与女子私奔，为一种婚姻制度之两端；咸卦和恒卦为夫妇之两端，咸言夫道，恒言妇道。咸、恒、渐和归妹这四卦，都是讲夫妇、男女关系，但各有侧重。咸与恒主要讲个体家庭中的夫妇关系，渐与归妹则侧重在女子出嫁的

问题上。其中恒与渐重夫妇之义，咸与归妹则重男女之情。这四卦通过卦义相合，阴阳相应的推理阐发，论证世间男女夫妇之间的伦理道德。

（周易）卦象和卦辞都体现了对立统一思想。它在《周易》中主要表现为：分阴分阳，分刚分柔，阴阳相感，刚柔迭用，一分为二，合二而为一。经由的是二，追求的是一，对立育万物，万物归一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一切对立都以统一为最终结果，此谓“常道”。这种观点表现为一种整体稳态平衡的思维模式，整体是这种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思维模式在《周易》中有如下表现：


第一，注重阴阳消长的过程。阴阳作为对立面，在卦辞中充分表现出来，乾坤、吉凶、得丧、泰否、损益、大小、远近、内外、出入、进退、上下、往来、既济未济，等等。这些矛盾对立的范畴和概念，反映了天地万物的矛盾对立现象。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从事物矛盾对立面着眼，是人们认识的起点，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周易》以柔代表阴，以刚代表阳，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和天道运行一样，是刚长柔消，柔长刚消，刚柔相互消长的过程，这是自然界和社会变化的客观规律。“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对阴阳消长之规律，人们只能认识它、顺应它、利用它。刚变柔的例子如：六刚爻的乾 ☰，一变为姤 ☱，二变为遁 ☶，三变为否 ☷，四变为观 ☵，五变为剥 ☶，如此阴长阳消直至六爻全成阴爻，便是坤卦 ☷。刚变柔，阳变阴，最后剥到尽时，刚长柔消的时候必然到来，如此反复，故剥卦之后

为复卦。这样一个柔长刚消，刚长柔消的过程乃是“天行也”或曰“天地之心”。

第二，注重阴阳互相渗透，刚柔交错。所谓刚柔交错，是指一卦中上体刚爻或柔爻与下体柔爻或刚爻之间的特殊关系，表现为一方一个单独的刚爻与另一方一个单独的柔爻的交错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刚柔相易，称卦变。刚柔交错的卦象只有震、艮、坎、巽、兑、离六卦，乾、坤两卦除外。六卦前三和后三上下一组合，演绎出不同卦形。这种现象说明，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对立面的两极交互渗透，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第三，注重万事万物的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周易）认为事物分为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如天地、乾坤、阴阳、刚柔、男女等，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必然统一为一个东西。既强调一分为二，又重视合二为一，把任何事物都看作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实际上，《易》是世界，是乾坤，乾坤矛盾运动的过程也就是《易》。《系辞下传》指出：“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坤合德生成六十四卦。乾坤、阴阳、刚柔在运动中经过“相摩”、“相荡”、“风雨”、“日月”、“寒暑”的作用而形形成象，成男成女。《易》的变化就是这样一种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如《易》损卦六三爻辞是：“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对此，《系辞传》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

也。”这里突出强调阴阳两仪怎样合而为一。天地、男女是阴阳的泛指，是二，一阴一阳，因此，两者势必氤氲交密，精气交构，以致精醇专一，化生万物。天地万物都是这样合二而生一。由此可见，没有二便没有一，二必发展为一。是二必损一，是一必得一，结果只有二，二是一的统一体，阴阳变化而化生为一。

一阴一阳是矛盾的两极，它们并不是绝对对立，而是相互吸引、和谐相融的统一体。《周易》中的泰卦 ，乾下坤上，地在地上，显然是一对矛盾。“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传》）泰之所以为泰，所以吉亨，是因为“小往大来”，上下相交通，天地相交通。在泰卦中，地在地上，天与地实际上不能相交，但天为阳，阳气上腾，地为阴，阴气下降，于是阴阳二气必然相交。阴阳相交就是阴阳和谐统一。阴阳只有和畅，才能万物生遂，蓬勃发展。否卦则与泰卦相反，天地否闭，阴阳不通，刚柔不和谐。这种情况在社会关系上则人道不通，正气不伸，小人得志。阴阳统一和谐是万物之根本，抓住这个根本就能正确认识事物，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从部分中抓住整体。这是阴阳两极相融原理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矛盾是思维的本质，只要人在思维着，运用着语言、符号、逻辑系统，就必然有矛盾。在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对矛盾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周易》理解的矛盾是处理经验直观

思维层次上的矛盾，而现代思维对矛盾的理解则扎根于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的、深层的机制中。虽然（周易）的矛盾观是带有直观性的经验思维，但不能否认它的辩证性。“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这种从阴阳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的观念，实质上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对现代人来说仍有启发意义。

总之，《周易》通过对阴阳对立统一性质的论述，直观地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阴阳两极互感贯通，相融统一，乃是《周易》整体思维的根本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周易》形成了一个以阴阳为轴心的八卦整体观和整体思维模式，为中国整个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

感性同一整体思维的特征

任何思维整合，都建立在某种客观的或主观的相关性之上。八卦思维将世界万事万物纳入特殊卦象中进行思维整合，同样也需要在主客体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斯特劳斯在《野性思维》一书中举了一个原始人分类的例子：本世纪初，九百名来自三十多个部落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被任意编组生活于一个政府拓居地。他们重新按其传统建立了有系统的社会。这个社会系统是按各自部族原有图式建立起来的，其逻辑依据或是人们的亲属关系，或是方位关系，或是自然现象和自然物种之间的关联。这个例子表明，

原始人类思维是根据对象的外在形态区分不同的事物，是一种连整性的具象思维。它同样力求有序化理解世界，按照客观的某种关联性，整合他所理解的世界，达到某种感性的同一。感性同一就是将外部直接感觉所摄取的客观事物形象，按照相同、相类、相似特性统一起来。如看见红色的流星，就认为它可能会带来火灾；看到巨大的健壮的松柏，就和人的旺盛的生命关联起来。原始思维就是这样用一种特征来理解另一种特征，借助某种形式上的相似和一致，将一事物特性能够移到另一事物上去。

一切原始民族都非常看重祭司和巫师，一旦遇到人力所不及的事情，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其用意就在于通过祭祀，使自己能进入神灵状态，达到人和神，人类和鬼魂的同一。这样，神灵就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这种思维方式，给整个原始人的生存方式和求优模式带来重大影响。很明显，原始祭祀活动实际上是灵实相关的思维在实际活动中的感性表现。

《周易》观物取象，以象譬物，通过八卦卦象和卦辞比附明了天理人事，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原始思维特征。凭主体直感而直解对象，即以自己内心的印象、观念、想象来理解外物、识别外物，这样便把一个自然对象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感觉，直接看成了对象本身的性态，从而导致心物混一，主客混一。例如，《周易》乾卦爻辞中说的龙象，属于自然现象。初九为“潜龙勿用”，九二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些爻辞意味着龙

由潜伏到腾空，同人的政治生涯从不见闻到飞黄腾达是一样的。这就把天道与人事联系起来，以自己对自然的感觉来理解天道人事的规律。八卦学说的特点是以八卦象征各种物象，再用八卦象征的物象，说明重卦的卦象，以此解说一卦的卦辞和爻辞，论证所占之事的吉凶。卦爻辞同卦爻象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联系的纽带为所取之物象，把物象同卦爻辞相匹配，以断吉凶。利贞、贞吉、贞凶、贞厉、终吝、无咎、有悔、悔亡等都是表明或吉或凶的用语。

《周易》虽成于西周，但其源头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的卜筮活动，它实际上应算古代的“卜筮之书”。揲着求数，因数设卦，由卦观象，依象系辞，这是《周易》一书的方法和体例。在这套程序里面，卦象具有重要意义。卦象虽然只是一、一符号的组合排列，但人们通过它的排列形状，可以把它与不同对象关联起来，客观认识对象和卦象之间形成一种感性同一性。人们直感认定的不是客体对象本身的特点和本质，而是客体对象与卦象的某种关联。人们的感受的是卦象与客体的相关性。人们正是通过这种相关性来整合出现在他的意识中的纷然杂陈的世界。

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缺乏形而上学的东西，只喜欢具体思维，不喜欢抽象思维，哲学思维与经验世界不可分。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特点。八卦思维是一种唯象思维。思维机制主要是建立在感性经验之上。认识主体的主观感觉和内心体验投射在客体上，使客体呈现出具象性特征。在“象”里面，掺杂有人性善恶、吉凶征兆、情

绪体验、幻觉想象、主观设定等一系列感性因素。认识也是以这种“象”来对事物进行注释说明，即仔细观察理解客体对象与相应的象之间，在结构与功能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两者相互关系。以“象”解物，实际上是以物解物，即把对一个对象的解释转移到对另一对象的解释，使不同事物的相同表征并联起来，让它们互相说明。八卦思维就是依照感性同一原则，将客体互相联系，互相解释，以物解物，从而寻求共同性的一种认识活动。将不同对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寻找共同点，或用一物比拟另一物，说明其共同性，这无疑是《周易》整体思维的一个特征。

天人合一 整体思维的主题

《周易》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气相通，一体相承的。因而，《周易》里面，天人同构，一一对应。天人合一，演成系列，变成联系，奉为易道。易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作为“天人之道”，它的外延扩展到宇宙人生各个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说卦传》）这表明包含一切的《周易》，其内容不过是天地人三才而已。天

地人是《周易》的关键所在，缺少任何一个，《周易》便不成成为《周易》。所以，“天人之道”是《周易》所推崇的重要“易道”。它追求的是天与人的统一与和谐，这是《周易》整体思维的一个根本点。

《周易》六十四卦之首卦为天即乾。可以这么说，没有天这一概念，整个易卦体系就建立不起来。天与地不可分，所以，六十四卦第二卦为地即坤。《易传》对乾坤两卦居首和乾先坤后的卦画排列特别重视，反复强调，如“乾坤其易之门焉”；“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乾坤是天地，天地生万物，万物生生不息之谓“易”，《易》是乾坤之抽象，乾坤合德生《易》之六十四卦。八卦取象尽管灵活多变、不一而足，但乾坤两卦取象天地则是固定不变的，是主象。有了乾坤、阴阳矛盾运动，才会成象成形，成男成女，乃至化生万物。

六十四卦的变化囊括天地万物。卦的变化实质上是阴爻、阳爻排列的变化。在阴阳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中，对立的双方又都包含着天、地、人三才。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后，三画卦变成六画卦。六画卦的初、二、三、四、五、上均有天、地、人的意义：五、上在卦画上代表天，初、二在下代表地，三、四在中间代表人。六爻代表天道、人道、地道，而万事万物不可能超出天、地、人三道之外。《易》六画而成卦，兼三才而两之。天、地、人三道虽是《周易》三个同一等次概念，但天尊地卑，地依附于天，

天地不可分，乃是自然。所以，天、地、人三道归根到底反映的是天人关系，是“天之道”与“民之故”的关系。

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是由天讲起，然后归结到人道上来。例如乾卦是讲天的，卦辞是：“元亨利贞”，意思是健。乾就是健，天的性质就是健。而健是天体有规律地运转，永不停息，什么力量都不能阻止它，改变它。“元亨利贞”不仅指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也可以指人的仁义礼智，以及其它具有乾健意义的人事物。乾卦六爻的每一爻辞都是讲人事。如初九“潜龙勿用”，指人处在乾初九时，需晦养以待时，勿有所施行，勿有所作为。又如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爻刚健居中得正，又在君位，龙自下而上，由潜而跃，已飞上天。居此位的圣人是君子大人中最高明最伟大的，其地位和才能可以破除一切障碍，犹如龙在天上自由飞腾，使天下享得其利。六十四卦从乾坤至既济未济，莫不以点评人事为立足点，人道反映天道，天道说明人道，天人合一，天人同构，致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主要哲学家都以论证“天人合一”为首要任务。他们之所以把“天人合一”作为哲学主题，是因为“天”（天道、天命、天理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表现整个宇宙的最高范畴。“人”（人道、人伦等）则是人类社会的最一般概念。“天”和“人”是任何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派别林立，形式千差万别，但在思维方式和要解决的问题上则有其共同点，即都以讨论“天人合

一”为中心课题。如果能在“天”和“人”之间找到统一性，并能说明这种统一性，那么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例如，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等问题都可以得到理论说明。《周易》是中国哲学传统之源，一开始就将天人问题提了出来。虽然《周易》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天人合一”这四个字的成语出现很晚，是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 - 1077）正式提出的），但其思想贯穿《周易》整个体系之中。

《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有三点：

一、强调天与人各守其道，咎吝有别。天人关系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即自然，这是天的基本含义，有时也含有天命，神的含义。爻辞讲“飞龙在天”、“初登于天”、“有陨自天”指的是自然之天 指笼盖大地之上的苍穹。但“自天祐之”、“公用亨于天子”里的天是人格化了的天，有神的意思。这两种含义形成一个抽象概念“天”。所以《易传》对天、天道则有更多论述，提出“天行健”、“有天道焉”、“立天之道”等思想。在《易传》里，天与地是统一的，“易与天地准”，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天地乃是自然 始终居卦象之首位。《周易》讲人，分“大人”、“君子”、“小人”。“大人”、“君子”是治人之人，是统治阶级，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小人”则是被统治阶级，是庶民百姓，是治于人的人。革卦说：“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三者变化不一。“君子”与“小人”在《周易》中频繁出现，带有政治、道德色彩，有褒贬之分。“《易》为君子谋 不为小人谋”表明《易》中

的人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君子。只有君子、大人才能同天发生关系，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天人合一”的前提是“天人之分”，《周易》追求天人和谐统一，首先承认天人不同，各有区别，各有其道，不容混淆。当然天道与人道并不是背道而驰，绝然不同，而是一体两面，从根本上说可合二为一。因为天人是（《易》为连结的中介，《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能“察于民之故”。它作为天人中介，当然能够将天人统一起来。

二、认为天的运行规律与人的活动规律有一致性，天的规律必在人的规律中得到反映。《周易》看待天人关系，着眼点在于规律性上，只有这样才能“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彖传·恒》）天之动是自然的，人之动是有意识的，规律所起作用各自不同。人之动的规律需要人自觉地认识并加以利用，人的主观意识和行动要符合客观规律，要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但《周易》认为人的规律可以在天的规律中找到根据，天的规律则必在人的规律中得到反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曷之时大矣哉。”（《彖传·贲》）这说明天有什么样的规律，人也就有什么样的规律。天养，人也养；天感，人也感；天恒久，人也恒久。天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具有同一性，这是《周易》天人合一观念的主要表现。

三、圣人能够顺应、运用天之规律，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

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人能否顺应、运用规律是主观的，有条件的，不是自然而然的，只有圣人能做到。一般人只能按照圣人的做法去做，方能做到与天同德。圣人能够与天地日月鬼神保持和谐一致，而普通平民百姓不能。这是说，人类要与天保持和谐一致，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进行一定的主观努力。圣人讲求仁义礼智，穷尽人性。人性与天性相通，“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只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方能“知天矣”。《周易》把“天”与“人”相类比，赋予“天”以强烈的“人”性色彩，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一理性的、道德之化身。人们要与天地合其德，首先就要修身，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发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由于把自然与社会、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维特点是求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这统一的联系中，《易》“与天相似，故不违，知周中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上传》）这样“不违”、“不过”、“不流”、“不忧”、“能爱”的天人和谐一致的境界，是《易》所追求的。正因为强调天人的统一强调天人和谐，所以，反对过与不及。这一思维方式的积极意义，从政治上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稳定。社会稳定是相对的，稳定是发展过程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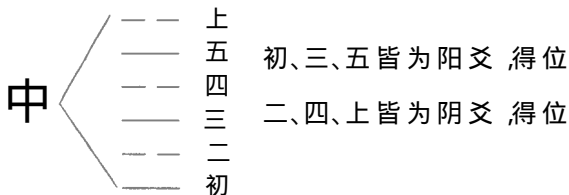
稳定，“生生之谓易”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还对中国古代医学、天文、地理等学科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医学受《易》学普遍联系求同一思想的影响，特别注重人和周围环境的有机联系，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有机联系，人身体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各种医疗方法之间的有机联系。并用阴阳的平衡和谐作为判明病因的依据，特别是用“气”来说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有机统一。联系的观点是中医学的最重要思想原则和方法论原则。当然，也要看到“天人合一”思想在汉代与迷信思想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文化。汉《易纬》用牵强比附、生硬割裂、胡乱联系的手法，企图把所有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纳入统一的象数模式中。片面地、孤立地、主观地对《易经》进行神秘化解释，从而把《易经》“天人合一”思想变成“天不变，道也不变”、“天人感应”之类的唯心论哲学命题。

中和化一 整体思维的宗旨

《周易》在论述阴阳对立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阴阳和谐的整体观念，强调阴阳当位，执“中”而协同，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与稳定。

我们知道，六十四卦是六画卦，一卦六爻，各爻都有其意义。那么，怎样确定每卦的意义？爻象与卦象有何关系？


卦象爻辞如何断定吉凶？这些问题都与六爻的位次有关即与爻位得失有关。结合卦象，分析爻位，以观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是《易》象数的奥秘。《易》学规定：一卦六爻之中，奇为阳，偶为阴，即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阳爻居阳位为当位，阳爻居阴位为失位，同样，阴爻居阴位为当位，阴爻居阳位为失位。我们从既卦可以看出阳爻、阴爻皆当位，如图：




在上图中，二为贞之中，五为悔之中。如果阳爻在五，阴爻在二，称为阴阳二五得位，这种情形叫“中”；如果二为阴爻，五为阳爻，即二五阴阳相应，这种情形叫“和”，阴阳既当位又相应，叫做中和。上图的既卦就是既当位又相应，是典型的中和。《易经》分析卦象，当位不当位、相应不相应是两条重要依据。

中和是（易经）及易学家们进行爻位分析、断定吉凶的准则，历来被世人推崇为最和谐、最圆满、无矛盾、无缺陷的理想状态。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和为贵”等儒学传统观念乃是（周易）中和观念的发扬光大。当然，用卦象是否中和分析世界万物，特别是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未免失

之偏颇。神秘的象数机巧，很难揭示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图景。

《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爻在卦象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同其他各爻的关系，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位与失位，中与失中；二是相应与无应，和与不和；三是相承与不相承，顺与逆。这些构成爻位关系网络。根据不同爻位关系的分析，可得出或吉或凶的结论。例如临卦 ，由泽地二体构成，地下有泽便是临，下二阳上四阴。“初九，咸临，贞吉”。意思是说，临之初九处在阳长之时，得位居正，并与得位居正的六四相应，所以“贞吉”。初九与六四是阴阳相感的关系，初九是以德感六四，不是以势逼六四，是感临，故得贞吉是必然的。临卦六五的爻辞是“知临，大君之宜，吉”。爻六五表明以柔居中，下应九二刚中之贤，任之以临下，如此善取天下之能，善任天下之聪明，正是人君所宜有之知。以此知临天下国家，岂有不吉之理。这里的大君之宜指君子以众知为已知，善听取臣下意见，吸取众人智慧，这样才能管理好国家。君子这一作法称为“行中”，行事得中，不刚不柔，既不宽纵废事，又不苛严理事，宽严适度，中和当应，故“临 元亨利贞”。

《易传》认为，既不中，又不应，背离和中状态，是最危险的卦象。如睽卦 ，兑下离上。离为火，火焰向上；兑为泽，泽润向下，一个在上且向上，一个在下且向下，有两体背离之象。又因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虽同位一起，但毕竟要嫁到不同的人家，也呈相违之象。从卦象看，

九二六五，阴阳皆不得位，但二五相应，君阴臣阳，君而应臣，故小事吉。这是说，处在睽的时候，事情已经睽乖离散，故不应以愤嫉之心勉强合睽，而是要采取贵中温和的办法，周旋委曲，慢慢解决问题，才能摆脱危险状态。

阴阳是否中和，实际上是阴阳是否和谐协调。和谐协调既是生命之原理，又是事物稳定性的可靠保证。乾卦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彖传·乾》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是什么 所谓“太和”就是阴阳矛盾双方处于均衡、和谐、统一的状态。乾卦取象是天，乾道变化即天道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万物获得生命和属性，也就是“万物资始”“品物流行”。万物各不相同，但能彼此协调，和谐相处，这叫“各正性命”。千差万别的事物如果各正性命，并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和和谐性，就会“保合太和”。“太和”是气，是天地氤氲之气，阴阳会合之气，万物依此气以生以成，存而分之。

阴阳之“太和”是天地大化流行之根本。阴阳矛盾只有达到和谐统一，事物才能得到稳定的发展。这是《周易》演易之宗旨。这一宗旨也体现在《周易》的思维方式中。强调以柔济刚，以刚克柔，坚持不走极端，奉“中和”之道为常道，遵“中正”之行为常行，执“中”而协同，中和而致一，这就是《周易》整体思维的根本宗旨。

整体综合 整体思维的定势

《周易》自问世以来，研究者代代不绝，注《易》、阐《易》、解《易》、说《易》之作不下三千部。尽管意见纷陈，但对《周易》主要的经典性表述的理解都有共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作为自己的观念定势和方法定势，去把握宇宙整体运行的动态过程和内在机制。《周易》形成的整体思维定势，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主体实践性特征。从根本上看，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学说，是关于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学说。因此，它特别突出人的主体性。这就决定了它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维。《周易》在西周时期就提出天道、人道、地道三道和谐问题，之后发展成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一气、天理良知、天理人欲等学说。这样的主体性思维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它在人和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基础上，面向自身，进行内在的自我体验和自我反思，辅之以道德实践，达到人生意义的真谛。

中国哲学为什么始终围绕天人关系来展开自己的思维？除了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外，思维传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国家，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使人与自然界形成一种特殊关系，由此孕育出一种强调自然界整体性及事物之间内在关系的有机自然观。我国古代氏族由图腾崇拜中形成的神秘的集体表象，天人浑然一体的万物有灵

论，在《周易》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保留和发展，其思想影响深远。由于缺乏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和自然界有机统一的传统自然观，在几千年历史中保持着主导地位。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始终处于直观猜测和朦胧意识之中。

《周易》提出的整体论的初步图式，奠定了我国传统思维的基础。整体思维图式在后来的发展中更臻于完备，对整体思维模式的发展有贡献的，当然要首推儒学。其中有三个阶段：（1）孔子发扬了天人合谐统一的思想，提出“扣其两端用其中”、“过犹不及”的中庸观。孔子罢鲁相后，周游中原诸国，广泛接触了老子、师襄等明于易学之人，回归故里后，笃易学，编订《周易》，冠为经。秦焚儒书，唯《易》不毁。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周易》成为儒生必读典籍，并奉为群经之首。孔子虽保留天命信仰，但不言天命，重生不问死，极力使自然人化，创立了以伦理政治为重心的思想体系。为实现“仁”的理想，孔子提出“中庸”这一方法论原则。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把中庸视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中庸是把握了事情的两端之后，选择适“中”的办法对待这一事。孔子认为，处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即要执中、用中，“过”与“不及”都有失偏颇，都会陷入片面性而导致谬误。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周易》中的中和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强调阴阳协调，追求天人合谐，突出稳定平衡，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点。这一思想对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当然有一定意义。但

是，一切对立都以统一、和谐为最终结果的观点，则缺少批判否定精神，表现了传统思维求稳防变特征，成为一切守旧势力的思想基础。（2）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前 180—前 115）以儒家为主导，以阴阳五行为框架，融道、法、名等各家，提出了更加系统、更加完备的整体模式。这就是“奉天”、“法天”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宇宙观。天人关系是董仲舒着重论述的中心问题。他认为“天”通过阴阳、四时、五行之气的变化，对自然和社会起主宰作用。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天”通过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与五方（东南西北中）相配，有目的地产生出来的。人本于天，受命于天，因而要服从于天。他承认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双方构成的统一体，阴阳矛盾双方必有一方居主导地位。“阳尊阴卑”，阳主阴次，这是永恒的“天之制”。由此，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命题。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基础上，将自然观、道德观、人生观、历史观等各种观点贯串成一个系统的整体意识形态，以适应当时汉武帝“大一统”时期的历史需要。董仲舒的天人整体观念对后人有很大影响。（3）宋明理学从形式上否定了“天命论”，自觉地注意世界本原的探讨，把“理气”、“心物”作为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来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对立统一思想。宋明理学是恢复儒家传统的新儒学。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朱熹（1130—1200）是新儒学集大成者。他运用“理气”来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并把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统统融入其体系，建立

起庞大的“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结构，并运用“理气”学说更加完备地解释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天、地、人“三才”既合为一，是极大的和谐，同时三者又有等级、尊卑之别。朱熹从其哲学逻辑结构出发，通过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序列，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联系与变化，以“阴阳”对立统一与奇偶数律，作为宇宙生成的基本规律。认为矛盾两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在朱熹哲学中，矛盾对立统一观点贯彻始终、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思维特征得到充分体现。他无愧为中国唯心哲学整体观的集大成者。

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据突出的主导地位。整体观念通过儒家文化的弘扬，深入人心，渗透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各个领域。同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为主这一特征相比，东方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例如，中国人名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中国文字（汉语）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会意文字，具有书画同源的整体特点。中国人写文章习惯有头有尾、层次分明、甲乙丙丁、起落有致，不可颠三倒四，注重整体结构的完整性。中国人画画，讲究布局轮廓、风貌神韵，强调对浑厚隽永的意境加以直观领悟。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更是突出整体观念，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明确规定个人要无条件服从国家、君主、家族的

整体利益不能突出个性“红杏出头”否则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众必诛之。在行为活动中，以尽善尽美为宗旨，以忠孝节义为美德，以圣人完人为楷模，时时处处都要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整体形象，以大自居，以全为荣，个性尽消融于“大一统”之中。

整体观念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占主导地位，从政治和伦理道德要求上看，是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整体观念及整体思维定势正是顺应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它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子系统组成。这三个子系统在结构功能上互补协调，相互作用，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一个超稳定系统。儒家传统思维方式的整体观，无疑可以凝聚起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突出君王统治地位，兼容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由此成为封建社会超稳定机制中的重要部分。所以，整体思维在中国比较发达，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整体思维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整体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要理论地再现这幅画面，自然要把事物、现象

的普遍联系看作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个特征。唯物辩证法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把世界看作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就必然要求用整体性的观点观察事物。否认事物、现象间的普遍联系，孤立地、片面地观察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形而上学的思想和方法是与唯物辩证法根本对立的。整体思维分析研究事物现象的多种多样联系，如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而每一种联系都是整体不同方面的联系，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联系又都是有机统一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周易》所体现的整体思维坚持普遍联系的整体观点，基本上满足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原则。天人合一、中和化一、阴阳统一等整体观都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比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

当然，我们要看到，《周易》整体思维原则被应用于封建政治观和伦理观时，具有保守性。这种思维方式适应了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窒息了人们的批判精神和斗争意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周易》中的整体思维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中形成的，其思维形式还比较粗糙，思想内容还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带有原始朴素的性质。它与在现代文明条件下产生的唯物辩证的整体观是不可相比的。《周易》整体思维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模糊性。这种整体综合观在考察事物时，通常导致忽略细节和成分的分条缕析，往往提供的是关于对象的模糊整体图景。在落后

的农业生产方式中，朴素模糊认识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需要来说，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庸”的思维模式使人们害怕走极端，驱使人们创造一种特定的含糊其辞的表达方式和具有无限涵容量的“高谈阔论”。《周易》阴阳整体观可用来解释电、地震、磁、火药等近乎一切现象，但又不能对一切现象作出本质意义的科学解释。正由于这种微言大义、似是而非的朴素辩证观，使得论述缺少明晰、准确的科学考察和论证，大都是凭日常经验的直观和感觉外推，这就难免在学术中牵强附会，笼而统之，无法摆脱思维的直观性和模糊性。

第四章

《周易》的逻辑思维

概念是逻辑思维的起点，概念的产生标志着思维独立化行程的开始。人一旦把概念、范畴置于人与自然现象之网中间，人就从本能的野蛮人转化到自觉的文明人。从而，开始了真正的逻辑思维的历史，开始了文明人的发展历史。《周易》是中华民族逻辑思维历史的开端。

思维形式概念化

在《周易》体系中，逻辑抽象首先表现为思维形式概念化。《周易》抽象逻辑的基本方法，是通过抽象与概括、类比与推理、分析与综合，把握对象世界的差别与同一、多样性与统一性。从而找出对象世界变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



阴阳概念是易学形成的理论基础，也是八卦思维的细

胞。在《易经》卦爻辞中没有阴阳二字，阴阳是在《易传》中明确提出的。但没有阴阳二字，并不是说《易经》就没有阴阳观念。概念是观念形态，它既可以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符号表达，还可以用人体语言等形式表达。阴阳这一概念在《易经》中是通过符号“—”、“--”表现出来的。人们创造出这两个符号，就表示有了阴阳这一观念。当人们运用这两个符号组成卦爻错落有致的卦画，说明万物生成变化的时候，其阴阳概念就十分明确清楚了。

阴阳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其代表的意义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早在商代，阴阳观念就初步形成了。那时，生产已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天文、气象、历法等方面的知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大量记载了这些知识，人们把晴天记为“阳日”，阴天是“不阳日”或“晦日”，以出日为阳，覆日为阴，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在阴阳区分的基础上，将阴阳属性作了进一步推广，以阳代表天、日、昼、暑、强、男、牡等事物的属性，以阴代表地、月、夜、寒、柔、弱、女、牝等事物的属性。并认为这两种属性可以产生两种力量、两种作用，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消长变化。显然，阴阳概念在这里被赋予了抽象性，并用以表明事物的一般特征。

《周易》的“—”、“--”符号，是对什么的抽象，学者看法不一。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象征男女性器官，“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子遗。画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

象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妇、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有学者认为 八卦是古人对于数有了奇偶分类观念的基础建立起来的，是古人在数理方面的一种抽象实录。“筮字从竹。竹棍有两种：一种是一节。用来象征阳性，“—”像一节竹之形；一种是两节 用来象征阴性“--”像两节竹之形，这和奇数为阳、偶数为阳的概念分不开的。三个竹棍摆成一个经卦，六个竹棍摆成一个别卦，爻和象都是像竹棍之形。”（高亨《周易杂记》）不管 “—”、“--”卦画是怎样产生的，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种符号是人们思维形式的抽象 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没有这种抽象，阴阳概念就确立不起来。用概念进行思维 是思维成熟的标志 是理性思维的基础。《周易》运用阴阳概念来分析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阴阳概念在《周易》体系中，不仅揭示两类不同事物的质的规定及其属性，而且还揭示了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变成了关系范畴。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交感关系，一种是排斥关系。例如，泰卦 ，其卦象看起来是天地易位，地在天上。天代表阳气，地代表阴气，阳气上升，阴气下降，意味上下交通，阴阳相感，两者相互吸引贯通。与此相反，否卦 ，其卦象是天在地上，天地各处原位，按照阳气上升，阴性下降的特性，卦象中的天地则出现隔绝、分离、相斥的趋势，阴阳不能贯通。在六十四卦中，阴阳交感和相斥的情况很普遍。而根据卦象阴阳是否交感相斥来判断一事吉凶，说明《周易》阴阳概念已经是一种思维形式。运用这种

概念思维，可以把握事物的性质、特点和相互关系，从而达到对事物的理性把握。

“—”、“--”两个符号组成八卦的基本卦象，已不是某一具体事物的物象，而是一切事物的共象，反映一切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相互作用。《周易》中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也不是指这八种具体物质，而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对自然界进行深入观察比较得来的观念概括。这种概括体现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即从具体的、个别的山、水、火、雷、风等现象的观察和实践中，得出一般的、抽象的山、水、火、雷、风概念。并以之依次组合成六十四卦，象征宇宙间的一切事物。

“变”是《周易》另一重要概念。世界万物分阴分阳，世界万物的变化也莫不起于一阴一阳。“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普遍规律。阴阳变化是万物变化之根源，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的本质是阴阳“生生”的过程。阴生阳，阳生阴，生生无穷，没有止息。“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变易，是变化，是阴阳二气永不停息的变易、变化。这一变化的道理称为“易”所以西方人将《周易》就直接译为《变化的道理》。

什么是“变”？“一阖一辟谓之变”就是说 阴阳如同一扇门，打开是阳，关上是阴，一开一关就是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就是卦中的阴爻和阳爻，奇数七、九为阳爻，偶数六、八为阴爻，阳即刚，阴即柔，任何数都有奇偶之分。阳爻九退至八，是阳变为阴，阴爻由六进至七，于

是阴变阳，如此阴阳变化就是“刚柔相推”。古代人们从这一筮法变化中抽象出“变”的概念，以表示万物变化之意。

六十四卦体现事物的各种变化。每一卦中的六爻具有更活泼的性格，更能体现事物的变化。一切卦的变化都起于爻变，阴爻变成阳爻，或阳爻变成阴爻，卦象就发生变化，一卦变成另一卦。各卦通过爻变而互相转化。例如，坤 ䷁ 第六爻变成阳爻，就成剥 ䷖，坤卦第一爻变为阳爻，即成复 ䷗。《易经》中大多数卦的第一爻和第六爻所系的系辞，往往包含着“变起于微”、“物极必反”的观点，朴素地反映了渐变发展为突变的思想。《序卦传》对这一思想有具体说明：“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涣者离也，物不可终离，故受之以节”；“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这些卦序命题反映的是量变质变转化的规律。

《周易》是在古代卜筮活动中产生的。古人以筮求卦，以卦断吉凶，这一过程都是变化的过程。变使《周易》充满神秘的色彩。《系辞传》把一到十分为奇五数（一、三、五、七、九）、偶五数（二、四、六、八、十），奇五数相加为 25，偶五数相加为 30，奇偶数总和为 55。这 55 个数通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反复进行三次，可得出或七或八或九或六四个数。根据这个结果而画爻

组卦，从而可以设卦系辞而卜吉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传》）乾坤两卦代表天地，它们的策数相当于一年三百六十天这一数目。六十四卦代表万物，所以它们的总策数相当于万物之数。万个策数可以极尽世界上万事万物及其无穷无尽的变化。

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个爻变，占卦时往往将前后两两卦联系起来。这样，爻变就成几何级数增加，而无穷在变化。无论如何变卦，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答案。但变卦只有两种前途、两种结果，一是凶变，一是吉变。一般说来，引起阴阳交感的爻变，被看作是吉变；引起阴阳相斥的爻变，则被视为凶变。《易经》认为，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无始无终的循环，变化的动因归根到底是“阴阳相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传》所谓感、革、相感、相摩、相荡、相推、生生、氤氲、相逮、不相悖、通气等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即在说明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原因。《周易》还认为，爻象和事物的变化，有其规律性，人事的吉凶也并非出于偶然。但爻象的变化并没有固定的格式，爻象可上可下，可以有应，可以无应，有时居中位，有时不居中位，并非一个模式。所以，《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总之，卦爻变化既有法则或道，又

不拘一格，人们事先难以预料其后果，这种性质称之为“神”。它表明事物的变化既有必然性，又存在着偶然性。

由上可见，“变”是《周易》概念思维的重要杠杆。人们借助于“变”这一抽象的概念形式，了解卦象变化的各种形式、变化的特点和变化的一般规律。同时，人们又在卦象的千变万化的感性认识中，把握变这一抽象概念，如果没有“变”的概念。《易》就不成为《易》。不掌握“变”，也就无法理解《易经》宏富浑广的理论。抓住“变”的概念，并用以去理解《周易》象数义理，这是学易的一个重要方法。

与“变”概念相联系的还有“时”的概念。“时”在《周易》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天地万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天地盈虚，与时消息”^①，“凡益之道 与时偕行。”^②《彖传》无论在描绘整个日月星辰的宇宙运转，还是说明万物生长繁殖，“时”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概念。《易传》在说明占卦过程、解释卦象和爻象、阐发卦辞与爻辞时，无不利用“时”的概念。“时”作为论述宇宙法则、说明自然现象的基本哲学范畴，与阴阳变通学说融为一体，构成全部易学的理论基础。

关于时间的概念，古人早已形成，基本上表示世界运动变化之秩序，“列星随旋，日月递昭，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③“四时”概念生动地显示出自然界各种现象和事物变化的次序。

荀子：《天论》。

《周易》也采用“四时”概念，不过并不是时间的抽象延续性，而是外部世界永恒变化的过程。在这里，“四时”概念把时间的顺序流逝与万物变易合而为一，表明时间的延续是阴阳、刚柔相长的过程。所以，在《周易》中，时间并不呈现为一条直线，而表现为由阴阳交替分合而形成的波状起伏的曲线。四时交替就成了阴阳之道。

“时”的观念不仅反映了《周易》对自然界万物生成变化过程的认识，而且也包含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彖传》有很多关于因时而变，因时而行的思想。“应乎天而时行 是以元亨。”（《彖传·大有》）“天下随时 随时之义大矣哉！”（《彖传·随》）“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彖传·坎》）“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彖传·遁》）“损刚益柔有时 损益盈虚 与时偕行。”（《彖传·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彖传·艮》）这些论述都把“时中”作为人的行为准则。“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够因时而行、因时而变的人是聪明人。“时中”是事物最佳状态，也是人的行为的美德。孔子的儒学特别推崇这一美德，孟子（约前 372—前 289）更是将“时中”作为理想的人格标准。后来也有人把“时”与“数”、“命”的概念相联系，宣扬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个人的命运皆由“天定”。

《周易》通过观察和实践，把对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的认识抽象为阴阳、变、时、几、大德、神明、天命等具有极大普遍性的概念，并运用这些概念进行逻辑

辑思维，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具体的认识对象中找出共同联系和共同特征。这种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个别到把握一般的概念思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发展。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周易》中的概念思维形式还是比较原始的。就阴阳概念来说，还没有摆脱具体物象的阴影，阴阳在《易经》中总是与一定的物质载体相联系的，还带有某种直感整合思维的特点。由于阴阳概念只是对自然界物质及属性的抽象，因而作为世界万事万物（包括精神和物质现象）的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说明，难免有些牵强之感。例如在精神现象领域，用阴阳解释就不易做到完满无缺。

卦序推演逻辑化

《周易》中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被称为卦序。通行本排列的顺序是乾卦为首，次为坤卦，终于未济卦。具体排列如下：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六十四卦这种排列，是（易）作者逻辑思维的结果，其逻辑思维体现在：

●对立面的排列和组合

《周易》六十四卦首乾坤次，乾坤并列于卦序之首。乾坤即天地，把乾坤立于卦序之首，意味着，天地为先，有天地然后万物生成，有了乾坤才有其他六十二卦。然而，乾坤是天在上，地在下，天是阳，地是阴，天是刚，地是柔，两者乃为矛盾统一体。《系辞传》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坤二卦在《易》中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整个六十四卦的体系之中。如同天地创生万物，乾坤二卦也创生其他诸卦，其阴阳矛盾也在诸卦中体现出来。《周易》按照阴阳矛盾对立的观点，对六十四卦进行排列组合，表现出深刻的辩证思维特征。

从卦象上看，六十四卦具有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性质。孔颖达在《正义·序卦疏》中说：“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这正是指六十四卦互相矛盾转化的意思。“二二相耦”，即每两卦为一对，互相配合。这种配合有两种形式：一是覆即二卦象颠倒，如屯 ䷂ 与 蒙 ䷃，需 ䷄ 与 讼 ䷅，两卦象上下颠倒；一是变，即卦象六爻皆相反，如乾 ䷀ 与 坤 ䷁，坎 ䷜ 与 离 ䷝。非覆即变这两种结合方式也叫反对方式，覆即为反对卦，一卦为另一卦的颠倒；变即为正对卦，两卦相应各爻阴阳互异。

正对卦与反对卦都叫做对偶卦。除此划分外，对偶卦还

有奇偶之分。奇数对偶卦是说，一卦仅与另一卦为偶，而不与任何其他卦为偶，如乾与坤，坎与离。奇数对偶卦在六十四卦中共有八对：乾与坤、泰与否、随与蛊、颐与大过、坎与离、渐与归妹、中孚与小过、既济与未济。偶数对偶卦是指一卦与另一卦成反对卦，又与第三卦成正对卦，如：震与艮为反对卦，震与巽又成正对卦。这样，偶数卦成对之数便增加一倍。

由于卦画是由“—”、“--”对立两画卦构成，八卦里面每两卦正好卦画相对，分成四个对立面。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画“因而重之”得到的，其矛盾对立面依然存在，六十四卦就有三十二个对立面。所谓对立面组合的原则也就是刚柔交错的原则，刚柔交错使卦形发生变化。在六十四卦中，有十八卦的上下体是由一阴卦一阳卦组成，而阴阳二体刚柔相易推演出其他卦画，此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即卦变。卦变就是依对立两画的交错比应而逻辑地推出新卦来。

六十四卦每一卦上下体都存在着矛盾关系，有一部分卦，上下卦之间虽然没有明显的矛盾关系，但卦象同实际事物的关系是反常的，也构成一对矛盾。每卦都是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图象。同时，六十四卦中每二卦形成一对矛盾，共三十二对矛盾，这种矛盾关系叫做正反卦，如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等。六十四卦大都是按正反卦的矛盾关系排列成体系的。正反卦连在一起，有正卦必有反卦，依这种逻辑来判定卦的吉凶休咎。古人占卦时经常采用双卦占法，即连续算两卦，以比较初卦与变卦（即前卦与后卦）的关

系。目的也是为寻找两卦中的矛盾关系，推断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

总之，《周易》在演卦时，依照事物对立统一的逻辑，将矛盾法则贯串到易卦体系中，使相邻两卦卦画不反则对。这种依对立面来排列组合卦序的思维是具有辩证法思想的理性逻辑思维。

●从抽象到具体

《周易》六十四卦所反映的世界，是一个由天地合德化育而成的万千世界。这个世界品类各殊，千差万别，具体生动，丰富至极，但都是由乾坤、阴阳、刚柔这两种力量在运动中“相摩”、“相荡”，经过“雷霆”、“风雨”的“鼓之”、“润之”而化育生成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传》）说明易从太极开始，经阴阳两仪到四象，然后八卦，六十四卦生成，直至万事万物出现。这一过程反映出《易》之思维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到多的逻辑思维。

孔子在《易传》中，对乾坤合德生成六十四卦这一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进程有生动的说明。他认为六十四卦依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至既济、未济的顺序排列，是一个有规律的排列。后卦是前卦的逻辑延伸，是思维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展开。《序卦传》将这一逻辑行程作了比较透彻的阐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

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六十四卦名排列均是以“必……故受之以……”句式出现。这种排列是把卦序推演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过程。一卦结束，另一卦开始，前后有某种因果联系，卦名也表现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从乾卦、坤卦至既济、未济，《周易》思想内容从一般抽象的必然本质推广到更多的、具体的、无序的个别现象，认识也得到丰富和发展。在这一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推导中，《周易》构造了一个天地万物化成论的宇宙模式。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易传》是根据《易经》卦象的象征意义以意说卦，运用天地、阴阳、刚柔、君臣等概念解释卦辞卦象，予卦象以象征意义。这些抽象概念与神秘的卦象结合起来，成为人们推理的依据。《周易程氏传》则根据这一特点，认为《易》及其六十四卦所代表的是道，是义理，是事物的所以然。卦象仅仅是表达意或义理的工具。《程易》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而明理，由象而知数。”把易象看作是理的推演，是圣人根据推理而创作的。《说卦传》也是把《易》看作是圣人顺其性命之理而作，“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由于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地有地道，所以一本而万殊，万物皆由“道”生。卦象不管怎样千变万化，都是“太极”或易道的衍生。

《易传》讲“道”围绕这一范畴探寻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系辞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的东西，是抽象的东西，器是有形的、具体的东西。“道”与“器”的关系实质上是抽象规律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无方无体”的“道”支配着具体器物的变化。同时，“道”也只有通过“有方有体”的具体器物才能显现出来。“道”与“器”不可分割，“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道是客观规律，是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它体现在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天道、人道、地道“三才之道”也无不是一阴一阳的对立统一。正是因为“三才之道”都是阴阳化生，所以，六十四卦能“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由“道”不仅能推断宇宙万物，而且也可能推演出世间复杂的道德人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序卦传》）立太极以统乾坤，以天地、阴阳、刚柔说明万物化成及人伦建立，“三才之道”归转于一。《周易》从抽象到具体，以道称名取类，推论卦序，逻辑严密，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智慧，其逻辑思维水平精微深幽，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从逻辑思维形式看，从抽象到具体是思维把握认识对象的逻辑行程的一个阶段。人们认识具体真理有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抽象的规

定只是理性认识的开端，尚没有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只有从第一条道路发展到第二条道路，从思维的抽象规定上升为思维的具体，才能从孤立的、个别的规定性的认识上升为认识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统一，达到具体真理。这说明，从抽象到具体是一种认识本质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一方法对人类思维来说具有普遍意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必须严格遵循客观的逻辑顺序，上升的每一个步骤、阶段都是逐步的，并与前一个步骤、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周易》卦序从抽象到具体的推演与上面提到的抽象到具体的含义并不相同。但作为逻辑思维形式，它同样是理性思维的表现，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思维方法一样，也是人的理性思维方法。在《周易》卦序排列中，由阴阳太极到万事万物的衍生化成，当然不是从抽象概念到思维具体的上升过程。但它的确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推演出世界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及其规律。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天理到人事都与阴阳存在必然的联系。阴阳衍生万物，万物反映阴阳之道，涉及的是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也就是人的理性思维的逻辑内容和具体形式。这对形成理论体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周易》卦序逻辑推演所表现的矛盾对立统一原则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都是阴阳学说的应用。阴阳观念不仅影响《周易》和儒家理论的形式，而且也是道家理论的基石。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以阴阳为哲学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性质。《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阴阳之道，阴阳二气相交即生万物。道家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都以阴阳范畴说明万物的性质及其变化过程。道家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同《周易》并列为中国哲学史上宇宙形成理论的两大大系统，其理论都是由“道”之阴阳而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具有较浓的理性思辨色彩。

因果关系条理化

在《周易》逻辑思维中，因果关系是阐发思想内容的主要手段。它将象数同卦爻辞结合起来，以辞解象，力图说明卦爻象同卦爻辞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用思维的逻辑性联系取代客观联系，把偶然联系看作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周易》思维的一个特点。

处在普遍联系、相互制约中的任何一种现象，必然是由另外一种或一些现象所引起，它又必然引起另外一种或一些现象。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就是原因，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就是结果。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将这种因果关系抽象出来，就形成因果观念。因果观念是人类一切自觉活动必不可少的逻辑条件。在思维活动中运用因果关系考察、认识复杂的客观事物，就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使认识条理化、规范化。

哲学史表明，原因和结果是人类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

中，首先遇到的一对范畴。因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首先就要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现象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人类对自然作用的结果。这样，因果关系便成为人们思维的首要对象。人类早期的图腾思维、巫术思维、神话思维都是以揭示因果联系为特征的。原始人的思维活动有两个领域，即经验与非经验领域。在经验领域里，他们完全按经验行事，按习惯思维。在非经验领域，他们遇到的是不了解的新奇事物，大量的不可知的东西使他们感到难于理解，便借助巫术。通过对现实的过程和对象的模仿，使现实本身按照所希望的意图受到影响，从而把握非经验领域中的偶然性和不可知因素。巫术的模仿行为要寻找现实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古代的占卜则明显是寻找客体之间某种因果必然性。神话思维寻求世界起源和众神诞生问题的答案，而因果联系正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总之，人类早期思维的各种形式，都或多或少地运用因果概念来说明客观世界之间的普遍联系。


《周易》虽然不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仍带有朴素直观性质，其逻辑思维是简单运用表面化、形式化的因果观念，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贯穿起来，以求规律性说明。

《周易》将因果联系纳入逻辑思维，一方面强化了理论的普遍意义，把事物间的偶然联系看作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万事万物都服从一种必然性。而作为必然性反映的理论当然也就具有普遍适用性；另一方面增添了理论的神秘性，因果联系绝对化就是一种神学目的论。事物一经产生就注定如此，可

以预示它们任何变化发展，万事万物，概莫能外。这种必然性无疑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周易）的因果观在筮卦取象、观象系辞、说易解易中都有体现。

首先，筮与卦存在着因果联系。与其他典籍不同，《周易》是用筮与卦即数与象表达思想。数与象是抽象的，它能适应一切情形。当具体的偶然的卜筮现象用卦象表示出来后，偶然的的东西就变成了必然的东西。在古代，卜筮活动是由专门人员进行的，这种数字计算活动目的是为了明狐疑之事，使民信时日，敬鬼神，定犹与。筮是用蓍草进行数字计算，通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从天地之数五十五中求出七、八、九、六四个数中任何一个数。七、九是奇数，代表阳符号“—”，八、六是偶数，代表阴符号“--”。经过四营三易得出一爻，一卦六爻，需进行四营十八变方可求得一卦。筮是数，卦是画，两者能够联系起来，其奥妙就在于阴阳上。卦有阴爻阳爻，数有阴数阳数，阴阳是它们的共性。不管数目多大，都能从中得出阴阳来，偶然的筮法必然得出阴阳结果，由筮总能求出卦来。这种偶然与必然的因果联系是固定不变的。《系辞传》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筮由于得出阴爻阳爻不确定，因而称为“圆”。同时，筮得的六个爻是阴是阳，如何交错，形成六十四卦中哪一卦，这是人事先不能决定的。筮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由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着，这就是神。神是不为人左右却能决定人的命运的超自然的东西。实际上，这里的神不过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事物变化的必然性趋势。筮

得出什么卦来，全是由阴阳不测造成的。“阴阳不测之谓神”是最好的解释。阴阳不定 使得无论怎样筮 都会得出相应的卦。有筮就有卦 卦象是 筮的必然结果。

其次 卦名、卦辞依卦象而定。“观象系辞”两者存在着因果联系。卦象、爻象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字是随意称名取类 还是依画而断？圣人设卦观象系辞 而明吉凶”。系辞是观象的结果，有什么象就系什么辞，不能随心所欲地取卦名、配象辞。例如鼎  巽下离上，鼎卦之所以名鼎，既取其象也取其义。取其象，是从卦形看很像一种器。最下一爻是阴爻，像器之足；二、三、四三爻是阳爻，阳为实，中实而容物，像器之腹；上二爻，一像器之耳，一像器之铉。器而有足有腹有耳有铉，正是鼎之象。从上下二体，上体中虚，下体有足承之，也是鼎之象。取其义，则巽下离上，木入于火，有燃烧而假之以器，故有烹饪之义。有烹饪之义，便是鼎。根据卦象，配写卦辞、爻辞，卦辞用尽可能简练的语言概括一卦的卦义。卦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卦辞则反映这一时代的总特点。爻代表一个时代之中一个发展阶段，爻辞反映这一发展阶段的特点。卦辞反映一卦之象，是静态的，故取一外象即可。爻辞也反映象，但是反映动态的象，故一卦六爻往往取多个象。即便六爻取同一象，这一象也必须能反映动态。鼎卦的卦辞是“元吉亨”解释是：“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享帝养贤两句指明卦义所在。鼎的功用是

烹饪，烹饪的意义在于享神和养人，享神养人最重要的是享上帝和养贤。鼎卦所以能致元亨，因为其下体是巽，巽有顺义；上体是离，离有明义，刚而中虚且在上，有目明之象。六五是柔爻，柔本应居下，而今进而上行至尊位，居尊处中，下与九二刚阳正应。这样，下巽顺于理，卑巽下贤，上离聪明睿智，柔而应刚，得乎中道，是以可致元亨。鼎卦六爻皆有爻辞：“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以上六爻的爻辞莫不与鼎之相应部位的功用有关，卦辞六爻合起来正是一个完整的鼎的形象。

第三，吉凶是爻象的结果。明吉凶虽是靠象、爻辞来实现，但吉凶的成因却是爻象所决定的。“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传》》爻象动于内则吉凶现于外，如影随形，如响应声。爻象是吉凶的本原，吉凶是爻象的结果，吉凶与爻象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所以，欲知吉凶，须先看爻象。看爻象主要是看各爻在全卦结构中所居的地位及其性质。爻位分贵贱、刚柔、阴阳，分天道、人道、地道。爻处什么位置就决定了所占之事的高低贵贱，吉凶顺逆之性质。看爻象还要看各爻变动情况。“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支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这说明吉凶、悔吝、

利害之引起是各爻变动不居的结果。各爻变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所致。爻象关系变动主要是比、应、承、乘四种类型关系的变动。按规定，二爻相邻者为比，内外卦（上下卦）相对应的爻为应，一爻位于他爻之下为乘，一爻位于他爻之上为承。柔承刚为顺，刚承柔为逆，阴阳各当其位为得位，否则为失位。“故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顺逆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外内；远近始终，各存其会，避险尚远，趋时贵近，比复好先，乾壮首恶，明夷务暗，丰尚光大。”^①这段话将八卦断吉凶原理作了简要概括，阐明了吉凶与爻象之间的因果联系。

第四，八卦占筮由象解义，由因到果，推事析理，见微知著，从客观条件判断事情发展的趋势。八卦预测占筮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断，而是有严谨的逻辑推理。由因及果，观象析义，每一推理都是因象明理，合乎逻辑。例如，“坤，初六”说：“履霜，坚冰至”。字面意思是刚踏秋霜的时候，可以预见到寒冷坚冰的冬天即将到来。由秋霜推出冬冰，依据是初六这一爻象。初六为阴爻，是全卦的开始，往上五卦全是阴爻。初六正是阴气滋生的起点，爻位往上，天气将越来越冷。卦象表明“履霜”与“坚冰至”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由微知著，由原因可推断出结果。这种逻辑联系实际上是人们实践中无数次经验的总结概括，是客观的因果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又如，“睽，六三”说：“见

王弼：《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

輿曳之牽，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六三与上九正应，有与上九相合之志，但前有九四牛掣之阻，后有九二輿曳之牵，受到严重的阻碍。六三虽是阴爻，但处刚位，处刚而志行，它要强力前进，结果就受到“天且劓”的惩罚。所以，六三爻表明人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而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失败无疑。这是由行为过程推测结果，其中因果性十分明显。《周易》卦爻辞有许多是用自然现象的因果必然联系来比附人事的。如小畜卦“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阴云密布而雨不降，原因是由于正吹西风。用这一现象来说明人事斗争是激烈的、艰苦的。小畜卦是一阴爻五阳爻，六四一阴爻要止住其余五阳爻，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六四畜止下卦之三阳爻斗争结果未见分晓，阴畜阴的任务没有完成，犹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六四在畜止阳爻的斗争中，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正如吹西方使密云不雨，六四作用尚未施展是阳刚未被畜止的主要原因。

第五，《周易》把自然与社会、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放在一起考察，试图从天人关系找出因果规律性的联系，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神秘因果观念的萌芽。《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自初到上，有始有终，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与阶段。卦爻既反映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及规律，也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是一致的。但自然规律被认为是社会规律的根据，社会规律是从自然规律推导出来的。天人合一，但天是人的根

据，从天道导出人道，讲天道目的是讲人道。《周易》卦爻的初始目的是为人设计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最佳行动方案，告诫人们要依“道”而行，指示人的行动方向。“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传》）道在《易》中只有一个，它存在于天地万事万物之间，无处不在，无所不包，问题在于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差别。有人能认识，有人则不知，有的则知之不全面，至于寻常百姓，虽天天与“道”接触，但却不知“道”为何物。正因如此，《易》力图使道能统一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事业，解决天下人的问题。《易传》在解释卦象义理的时候，总是将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前句讲自然现象，后句则讲人事教训。例如解释师卦的象辞是：“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师，坎下坤上即地中有水，是聚众之象。君子应当懂得容民畜众的道理。古代兵农合一，容民畜众是讲军事方面的内容，如果兴师动众，会殃及天下。但是师以顺动，打仗是为民众解除暴虐苦难，即为民众欢迎。又如解履象时说“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类似解释很多，都是以自然现象比附人事活动，用自然规律说明社会现象。认为社会行为都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根据，人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守的规则同自然规则是一致的。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仁义乃是阴阳合德，本质上都是自然规律的反映。正因如此，人们才可以依《易》明事故，通忧患，预测未来事变，指导人们的行动。

由上可见，《周易》逻辑思维中，因果联系是一重要环节。卦辞与卦象、爻辞与爻象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历代易学家都是根据这种认识，努力寻求卦爻象和卦爻辞间的内在因果逻辑联系。或者通过对卦象的各种解释，或者通过对卦爻辞的注释，将两者用因果系列贯串起来，以证明《周易》是神圣的典籍，具有完整奥妙的思想体系，是彰往察来，预先测后的圣人之书。事实上，《周易》虽是周人占筮典籍，但此书编纂却颇费心机，既有前后一贯的深刻思想，又有统括全书的逻辑艺术。从乾卦到未济卦乃是一严密的因果系列，后卦依赖于前卦，前后两卦或相因，或相反，卦名义理均体现出因果联系。乾坤屯蒙讼师比，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的因果序列，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因果必然性的真实写照，也是人类思维必须遵循的逻辑。按照这一逻辑，人们的思维整合才能概念明晰，条理清楚，理论的概括性、预先性等功能才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据象归类程式化

人类认识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的逐渐化过程。要做到从不知到知，由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现象的认识对本质的认识，需要运用归纳方法，对纷繁杂乱的具体感性认识进行归类整理，找出彼此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去粗

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改造制作，这样才可能获得规律性认识。《周易》卦象并不是神秘的东西，六十四卦是古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这种认识经过分类归纳、逻辑抽象、深刻反思而变得系统化、规范化、程式化。六十四卦反映着六十四类不同的事物或现象。这就是说，世界万事万物可归类于六十四卦序列，由六十四卦可推导出万事万物，此乃谓《周易》生大业，八卦定乾坤，易与天地准，阴阳变化生。

●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八卦要说明天地万事万物，首先要对万事万物进行归纳分类。归纳是从许多个别或特殊的事物中找出同类，并概括出一般性知识的思维方法。这一方法在《周易》中具体表现为“据象归类”，即根据八卦代表的八类象进行归类，主要是依据事物静态性、功能特性、动态属性确定事物类别和相互关系。

《周易》把宇宙中复杂纷纭的事物及其现象，按照其性质划分为八大类，这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基本卦象。表面看起来这是八种不同的自然现象。实际上八卦主要意义是给世界上万事万物划定八种性质。世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包括在这八种性质之中，不属于这一种性质，就属于那一种性质，没有超出这八种性质之外的事物。《说卦传》就八卦各自性质作了解释：“乾，健也。坤，止也。兑，说也。”这八

种性质可以指代很多实物。八卦取象的实物并没有明确规定，实物变化不定，可以是自然物，也可以是社会现象，还可以是人生态度。它们外部形状虽不相同，但只要能反映同一性质，就可以归纳为同一象或同类。由于八卦取象灵活多变，因地制宜，所以八卦象能比附许多事物及性质。如果八卦重叠为六十四卦，其取象范围则无所不包，天地万物，概莫能外。

根据《说卦传》取象传说，八卦取象范围可列表如下：

表 2

| 卦名 | 震 | 巽 | 离 | 坤 | 兑 | 乾 | 坎 | 艮 |
|-----|--------|------|------------|----------|-----|---------|---------|-------------|
| 卦象 | ☳ | ☴ | ☲ | ☷ | ☱ | ☰ | ☵ | ☶ |
| 物象 | 雷 | 风 | 火 | 地 | 泽 | 天 | 水 | 山 |
| 性质 | 动起 | 入散 | 丽煊 | 顺柔藏 | 说 | 健、刚君、阳 | 陷润 | 止 |
| 时令 | 正春 | 春末夏初 | 正夏 | 夏末秋初 | 正秋 | 秋末冬初 | 正冬 | 冬末春初 |
| 方位 | 东 | 东南 | 南 | 西南 | 西 | 西北 | 北 | 东北 |
| 颜色 | 玄黄 | 白 | | 黑 | | 大赤 | 赤 | |
| 人 | 长男足 | 长女股 | 中女目 | 母腹 | 少女口 | 父首 | 中男耳 | 少男手 |
| 动物 | 龙 | 鸡 | 鳖、蟹、蚌、龟 | 牛 | 羊 | 马 | 豕 | 狗 |
| 自然物 | 苍筤竹、萑苇 | 木绳 | 日、电、甲冑、科上槁 | 布、釜、大舆、柄 | 毁拆 | 冰、金玉、木果 | 沟渎、弓轮、月 | 径路、小石、门阙、果蓏 |

| 卦名 | 震 | 巽 | 离 | 坤 | 兑 | 乾 | 坎 | 艮 |
|----|-------|---------|-------|------|------|------|------|----------|
| 关系 | 万物出乎震 | 万物絜齐 | 万物皆相见 | 万物致养 | 万物所脱 | 阴阳相薄 | 万物皆归 | 万物所终 |
| 其他 | 敷大涂 | 不果长高鼻进退 | 戈兵 | 众文 | 巫妾 | 寒 | 为坚多心 | 阍寺指、为坚多节 |

上表归纳分类是以八卦象为基础，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则，把与卦象相应、相同、相感、相似的事物划归一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验上，本乎地者亲下，各从其类也。”（《易传》）各从其类在八卦中是据象归类。例如震类系列表示春天，震雷出现，万物萌苏，东风吹拂，大地玄黄（青），鲜花绚烂（甫）。又如乾卦代表天，天在自然界中统摄万物，居万物之上，所以，与此同样性质的事物就应为同类。父是一家之主，君为一国之王，首为一身之高位，都有最高性质，自然就属于乾卦系列。大地、母亲、腹、釜均有孕育化成之功能，因而也属同类。

将功能、性质、属性相似、相应的事物归类是《周易》归纳法的主要形式。当然，也按事物的外部形状进行纯粹形式上的分类，如按圆形而将天（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木瓜、玉石等外形相似的东西划归同类。从整体上看，按事物外部特征进行分类的归纳法在《周易》中使用不多。按象的性质归类是《周易》思维方法的出发点。由此出发，《周易》应

用矛盾两极相互依存相互对立原理，将八卦两两配对，并归纳出它们各自表征的属性。如乾坤两卦象，所有属性均是对立统一，如下表：

表 3

| | | | | | | | | | | | | |
|---|---|---|---|---|---|---|---|---|---|---|---|----|
| 乾 | 天 | 尊 | 高 | 阳 | 动 | 刚 | 父 | 日 | 君 | 昼 | 暑 | 贵等 |
| 坤 | 地 | 卑 | 低 | 阴 | 静 | 柔 | 母 | 月 | 臣 | 夜 | 寒 | 贱等 |

《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生生变化”摹拟出自然和社会各种物象，“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卦象尽管千变万化，但最终都归于阴阳四象八卦。按八卦归纳逻辑，就能把天地万物按不同性质进行归类。并能加以区别和认识，判断他们在性质上的相同性和差异性，这是中华民族思维能力的一大飞跃。

●卦象归纳程式化

八卦思维是靠卦象来进行的，卦象取象范围是天地万物。八卦卦象由于阴阳变化莫测而显得丰富多采，天地万物都可置于其中，人们的思维对象就是丰富多采的卦象。而怎样认识卦象的本质意义，首先是要看爻位所处位置。爻位在卦象中只有六位（初、二、三、四、五、上），不管什么事物或现象都只能在六个位置进行排列组合。六爻还分成天、地、人三种爻位和刚爻、柔爻或阳爻、阴爻两类爻。这意味着卦象思维总是在阴阳的对立统一模式中进行。位分阴阳，

爻也分阴阳，同一性质的爻处在不同爻位上，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爻位决定了某一物象的特征和意义。分析卦象不能离开爻位和卦位的变化，八卦思维对客观事物的归纳始终都是建立在卦位爻位的基础之上。卦爻位性质决定了客观事物的价值属性。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都各有其象，各有其位。把爻象和爻位结合起来，然后解释卦名、卦辞、爻辞，这是八卦思维的基本程序。而把世界万物变成卦象，实际上是进行逻辑上的爻位归纳，将客观事物用卦爻位进行表征。通过爻位的比应承乘，事物的性质就显现出来。爻位归纳是从个别、特殊、多样的事物中求得一般，撇开客观事物的差异性而找出共同性。但爻位有固定的性质，并具有等级、尊卑、贵贱、吉凶的区分。因为，对万千事物的归纳，在爻位上只能表现出两种可能性，即被赋予阴阳、刚柔性质。所以，这种爻位归纳万变不离其宗，阴阳相推，非阴即阳，始终摆脱不了这一归纳逻辑的窠臼。

● 易卦推演占吉凶

（周易）用归纳法将万事万物纳入卦象体系，使其呈现阴阳特性并居其爻位，然后根据卦象推断吉凶，预测未来。推断演绎是从已知推出未知，这种推断是八卦思维的重要功能。八卦推断占吉凶的依据是卦形。“一阴一阳之谓道”卦象呈阴爻阳爻互相交错之态，同性相斥，异性相感。“天地

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彖传》）天地感即阴阳交感，凡上下两卦有交感性质的是吉卦，反之，凡不会引起交感的卦都是凶卦。例如革卦 ䷰，火在下泽在上。水火相克，水灭火，火涸水，有变革之象，故卦名曰革。水之性向下火之性向上，上下卦相感，故“革，己曰乃孚，元亨，利贞，悔亡”。事物过时了，才要变革，变革的目的是旧变新，穷变通，所以革之而可以元亨。但变革旧事物是极难的事情，必须遵循正道去做，倘若任意胡来，则一定失败。能够坚持正道去进行变革，纵使时间久，险阻多，最终也将成功，成功则悔亡。凶卦的例子，如否 ䷋，天在上，地在下，天地隔绝，不相交感，完全是否之象。在否之时人道不通，正气不伸，小人得志。

判断吉凶还可以从爻位上看出来。爻位错乱，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都是凶之兆。如恒卦 ䷟，“初六，贞凶，无修利”。天下事都有日月积渐的过程，处在恒的时候，尤其应该注意这点。初六居恒之始，要作长久打算。但是初六以柔居刚，体巽而性躁，求胜心切，想要一锹掘个井，故曰浚恒，欲速则不达，必凶。

八卦占吉凶是一种依卦推理的思维方式，推理作为从已知推出未知的逻辑认识，带有预测的性质。预测只是一种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当然，这种预测也有必然性因素。我们用逻辑推理去推断某一结论，如果有充分条件作为前提，那就必有某种结果，这是因果必然性。但有时只能得到

“大概如此”的结局，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结论。八卦推论大都是或然性判断。所以，按卦算命，完全靠运气。有些事可能按预测方向发展而条件没有多大变化，此时，就能得到预期结果；有些则条件不断变化，并没有按预测方向发展。当然就测不准了。事实上，《周易》卦爻辞都不把命题绝对化，卦象都只是性质相似，可以表同类性质的任何东西，故它只能在可能性中推测。而且，推测的结果也不只是或吉或凶的两种可能，还有吝、厉、悔、咎等可能性。《周易》不讲非此即彼的绝对性，而强调变的辩证法，这是符合思维推理的基本要求的。它可以避免思维僵化和独断论，使人们更好地扩大认识范围，从未知领域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成功进行预测，不断推进实践纵深发展。

第五章

《周易》的情感直觉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重视人的问题，重视人们的情感因素，强调“天人合一”，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在以人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主体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在思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人为本的道德学说

《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内涵十分丰富，对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人生论等都有许多论述。“《易》是寡过之书”；“《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说明《易》的主题是论述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把握时变，如何趋吉避凶。这无疑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都是为人设计的，始终都讲人的问题，人是该书的起点和终点。

《周易》论述人事是与天道联系在一起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是其最重要的概念，离开“三才”则无《易》可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 故易六画而成卦。”（《说卦传》）天、地、人既是构成客观世界的实在内容，也是易卦形成的主要依据。因为，《周易》是一部论述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典籍。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讲人，讲天讲地的目的是为了讲人。这一点从卦象的爻位排列次序上就可以看出来。八卦是三画卦。上爻代表天，中爻代表人，下爻代表地。六十四卦是六画卦，初爻、四爻表地道，二爻、五爻表人道，三爻、上爻表天道。《周易》特别看重二、五爻位，“二五得中”。把人道放在中心位置。说明人在《易》中的突出地位，同天地相比较，更重视人事，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自《周易》提出天人观念以后，天人关系就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先秦时期，儒家孔子继承周代《易经》理论传统，认为“唯天为大”“知天命”，然后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涉及到天人问题。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提出了比较完整意义的“天人合一”思想。两汉时期“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儒家经典统治了三四百年，“天人合一”发展成“天人感应”，董仲舒曾指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宋明理学继承了儒家思想传统，以“天人合一”为

其所要论证的基本命题。他们强调天理人道的一致性。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的本性得之于天，天的本性又在于人性，天的本性又表现在人性上。所以“性即理”，人的本性即是天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致思方向虽然不同，但都以阐明“天人合一”之理为己任。这表明，正是基于天人关系，并以天人关系为立足点，在思维方式上才表现为一种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点的人本主义观点。

这种人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或者是一种“伦理关系中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伦理关系之中来论证人的主体性问题，强调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同时，又把人的道德性加之于“天”，使“天”成为道德理性的化身。视“君义臣忠”、“父慈子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为“天理”的基本内容，给“天”赋予道德性，把道德实践活动作为最根本的实践活动。这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在《周易》一书贯通全篇是其精髓。例如，《系辞上传》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几句话准确地将《周易》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揭示了出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正是《周易》的要害和关键。这一思想贯穿于《周易》六十四卦的始终，并且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基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这些儒家理论均源自《周易》这一思想。

《周易》首卦是乾，坤卦放在乾卦的后面，这一取象显

然是为了表现乾尊坤卑。乾卦取天为象，乾六爻取龙为象，表现天龙独立独行、自强不息的性质及其至上地位。乾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意思为健，表明“天”有规律地运转，永不停息，什么力量也不能改变它、阻止它。“元亨利贞”也指人事的仁义礼智四德，是崇高无比的德行。与乾相比，坤则是顺乾承天，取象为地，卦辞是“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坤取牝马之象，说明坤对乾的从属地位。因为牝马要受牡马的约束，顺从牡马的管辖，牡马刚健自强，牝马柔弱顺从，坤卦的性质就是顺。坤卦辞明确表明坤以乾为尊为主为先，甘居乾后，团结同类却不私结朋党，全心全意为乾服务。坤卦六爻都是讲坤如何顺乾而动。坤初六“履霜 坚冰至”，一开始就提防坤道滋长，告诉人们要防微杜渐，不能使坤道得势。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是说坤道发展到与乾道对战的时候，是最可怕的局面，此时乾要同坤血战，以避免天地混杂，乾坤颠倒之事发生。

乾坤两卦讨论的是“天人之道”的问题，实质上是讲君子、圣人与平民百姓如何各守其道、各修其道的问题。乾道是“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坤道是“以厚德载物”对天地来说，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自然本性，但对人来说，则非自然本性，需要通过“道”的修炼。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顺天应人”，才能使人的言行符合天道，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周易》不但为人设计了一套理想人格，而且还提出许

多人格修养、完善人生的途径和方法。“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系辞传》）乾卦德行是健，特点是易，坤卦德行是顺，特点是简，人掌握这两方面的德行修养就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而其途径是要在事业进程中加强德行修养，修养德行要落实到成就事业上。乾坤两卦的卦辞和爻辞讲的就是人们如何践行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这两种德行。乾卦自初至上六爻是君子进行德行修养的过程。“初九，潜龙勿用”，是说君子须将自己的德修养完满无缺，然后方可有所行动，有所作为。“勿用”是隐、遁之意，隐不是简单的事情，一般人做不到，唯有有龙德的人能隐。隐是为了“不易乎世”，做到自己的意志、主张不为世俗所移易，不与之同流合污，洁身自好，行之若素。龙德在九二阶段只是德已修成，有君德而无君位，还未到发挥作用之时。“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时，君子还要不间断地进德修业，始终保持奋发有为，不断进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九三居下卦之上，但又在上卦之下，居上位“惕”而不骄，在下位“惕”而不忧，能上能下，不骄不忧，虽处危地，也可无咎，终日乾乾，自强不息。乾九五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既居君位，又有君德，到九五，其思想、意识和行为可与天时、日月、四时、鬼神合拍，既符合自然规律，也符合社会规律。在上九阶段，要求君子能够做到得意知返、进而知退、存而知亡、得而知丧，能够掌握进退存亡之规

律，这也是君子自强不息的表现。坤卦卦辞也是强调君子的道德修养问题，指出君子之修德不但要自强不息，孜孜以求，还要“厚德载物”，宽容大度，承天应人。当然，善恶务须分明，对善要顺势发展，对恶纵然纤介些微，也要防微杜渐，不能让其发展。故君子小善莫不为，小恶莫不去。乾坤两卦提示的修养方法是辩证的、具体的、全面的，既要自强不息，积极有为，又要谨慎从事，功成不居，既要刚健济世，又需柔恭守静，这样才能达到天地合一，阴阳相济，主客统一的至善至美的德行。

《易经》六十四卦，均是以天道附会人事，强调天道就是人道，顺天还要应人，顺应天时，也是符合人的意愿的。革卦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汤武伐桀纣是顺应人的革命之举，既体现天意，又合乎民心。暴君违背民心，就是违背天意，讨伐暴君，当然就是顺天应人。《周易》的天人关系大都是通过人事活动来论述的，其内容涉及到历史（需、讼、晋、明夷、屯、蒙、革、鼎）、国家制度（师、比、同人、大有、噬嗑、贲、井、困、随、蛊）、伦理道德（小畜、履、豫、谦、咸、恒、损、益、升、萃、大畜、无妄）、婚姻家庭（渐、归妹、家人、睽、蹇、解）、日常生活（颐、大过、旅、节、丰、涣）、人生修养（乾、坤、中孚、小过、既济、未济）、人事规律（复、临、泰、否、大壮、夬、姤、遁、观、剥）等各方面。六十四卦是建立在人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是对人的感性实践的概括总结。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人

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认为“天道”或“自然”法则是由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体现出来的。认识了人之所以为人，也就认识了天之所以为天，自然之所以为自然。由于《周易》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因而其思想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其思维方式就带有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情感因素渗透到认识活动之中，人的思维则表现为一种内在的自我体验和自我反思。

至善至美的价值观

《周易》强调以人为本的道德实践，通过这种实践以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人所追求的至善至美的理想状态。要达到这一理想，就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中以唯善唯美为价值取向，以实现“天道”为理想追求，以“知行合一”为修养原则，以“自强不息”为精神动力。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并不是某种不可达到的“彼岸”之物，而是天人之间的和谐，情与理之间的交融，又是人对自我价值的体验和实现。

因此，它是德与行的统一。德必见诸行动，行动中也当体现德。《周易》中的乾坤两卦就是谈德与行。君子自强不息是说君子应该不断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完善自己的人格，以达到至善至美之境界。在这种修养践履中不仅能完成理想人格，达到圣人境界，而且可以求得“真知”。强调在个人的笃行中体会“仁”，在道德实践中“存心养性事天”以成

圣人。这意味着践履只是对“天道”、“人道”的体验过程。因此，它重视经验知识而轻视理论玄思逻辑推导，是一种实践型思维方式。

天地之道和人之道表现虽然不同，在天地则为阴阳刚柔，在人则为仁义，但天人是合一的，天人本来只有一个道，即“性命之理”。《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谓“继之”、“成之”就是要实现道，即通过人的道德修养实现道。这是一种善的行为，是仁义之性的体现。天道不在人性之外而在人的内在本性之中，因此，要实现天道，就要“尽心知性知天”。这是内在的自我超越，不是向彼岸的超越，不能在自己的心性之外去求什么天道。所以，尽心知性是一种“道”的体验过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是天德，乾坤合德而创生万物，这就给“天”赋予了道德性。天之德是人之德的化身，两者是一体两面，是同一个东西。人进行道德实践就是去体验天之德性。

《周易》乾坤两卦从总体上说明了人的道德实践是一个刚健奋斗、自强不息的过程。从初爻到上爻，反映出道德修养过程不同阶段的特点，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例如卦乾，初九“潜龙勿用”。要求安静以待，勿要有所行动；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若惕厉无咎”，要求终日谨慎，朝夕戒惕；上九“元龙有悔”，要注意刚健有度，不能在顺利时得意忘形，而任意胡来，否则就会走向反面而导致悔吝咎凶的结果。君子自强不息，终生都在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

境界。在这一道德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以达到天人合一的道德理想。《周易》对君子的道德实践有很高的要求，基本的要求是要遵循“仁义礼智”四德。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按（文言传）解释就是讲仁义礼智。这四德是君子人格的基本规定，是君子道德实践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君子以德为行”，君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按德而行，君子成德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周易》重视德行修养，又主张“崇德而广业”，把养德行与成就事业统一起来，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修养德行，修养德行要落实到成就事业上。所谓“知行合一”道德实践活动的典型特征，既是要求知“道”，又要求行“道”，是一种“道”的“体验”。在体验“道”的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中，人不断完善自己，不断地将自己的行为规范落到“仁义礼智”的德行之中。

《周易》主要是谈“立人之道”，人是中心内容。“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这里的仁义是道德之根本。要建立仁义道德规范，需要不断加强人的道德修养，所以，《周易》特别强调道德修养问题。而道德修养主要是反身修己，修己就是主体自我体验。《易经》蹇卦卦辞中明确指出“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修己是主体自觉行为，是以自身为对象的自我反思，自我体验，自我觉悟。因为反身修己是成就自家身心性命之事，是陶冶情操，完成一种理想人格，而不是获得关于善、美的概念知识。所以，它不需要进行辩论和探索，也不需要公理化、形式化的知识系统。

对道德修养问题，《周易》提出了许多比较具体的方法

途径，涉及人生各方面，六十四卦中有二十九卦谈到君子德行修养问题，具体如下：

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蒙：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小畜：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有：火在上天，大有，君子以遇恶扬善，顺天休命。

蛊：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大畜：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颐：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大过：泽天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坎：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咸：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恒：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遁：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大壮：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勿履。

晋：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家人：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睽：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蹇：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损：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益：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升：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震：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艮：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渐：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节：泽上有木，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小过：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既济：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上面列举的这些德行修养的途径和方法，显然是经验型的、实践型的。虽然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主要解决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力求达到主客体统一或天人合一。修己是立人，立人之道是仁、义二字。要达到仁义，非一日之功，须长期渐进，孜孜以求，不断体验。只要“精义入神”，“穷神知化”，坚持长期自我体验、磨炼，就能“德之盛也”。德盛而熟，则仁义自得。这是君子之道，小人是做不到的。君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最关心、最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并要求人们的道德达到圣人的水准。

仁义为元德，是最大的善，是人道，也是儒家推崇的人格最高境界。人与人之间，虽有五伦九族、亲疏远近之分，但都摆脱不了仁义这一道德准则的制约。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其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仁正是人的同情心表现，而这种同

情心又是普遍存在的情感。“仁者爱人”，禹稷的饥弱同怀，文王的泽及枯骨，孔子的老安少怀，孟子的苛政猛如虎，政为不忍之寄，等等，都是仁心表现、爱人之举。敬老、慈幼是基本的仁举，如果做到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仁民而爱物”，使仁心扩展到宇宙万物，那就“是心足以王矣”。由此可见，仁这种道德行为乃是一种情感体验，通过对仁的自我体验而达到至善。由我到非我，由爱人到爱物，仁心具有普遍意义。主客一致，物我一体，这是尽善尽美的道德实践之真谛。

《周易》按天地、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内在联系推论出仁义道德规范，置人于纲常伦理关系中，这就使人成为道德行为的主体，而不是认识的主体。从而，就把认识看作是对道德行为的体验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概念分析。人在道德实践中体会到善和美，而这种善和美又是与仁义联系起来进行价值判断，不合仁义的不能算作美和善。《周易》的价值取向是唯善唯美，美和善是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情感需要。这样，对美和善的追求也就成了思维的重要内容。而人的情感需要又是思维的重要动力。在这种情感思维方式支配下，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是去求得“真”知，而是致“良知”，一切是非曲直都是以自己“良知”作为判断标准。“良知”实际上是人的自然心理情感及其体验的升华，是仁义的理性表现。仁义的情感判断标准在于至善至美，而不在于客观真实性。

崇尚善美的情感思维是《周易》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必然

产物。道德实践是人对善的行为的情感体验。善的就是美的，对善的体验即是对美感的体验。人在情感体验中感受到天人合一、情景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感的乐趣。作为情感体验的善，是一种心中的仁义之性，它是内在的美，即“心灵美”。善和美的情感意识来源于人的道德实践，没有入的道德修养就没有善美的情感意识。仁义之性充实到人的意识和行为当中，就能升华出善和美的情感意识来。

由此可见，情感体验是从人的情感出发，从感性经验出发，对客观知识不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也无需逻辑概念上的分析，而是根据人的主观情感需要，根据主体自我体验，对认识对象进行选择、过滤和净化。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不是着眼于这一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及其与人的关系，而是着眼于人的情感需要和道德评价，体验出某种意义来。《周易》情感体验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发展有很大影响。情感思维以人为中心，从人的道德需要和利益出发，必然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是求善求美，而不是求实求真。人们只注重自己的切身利益，求吉问凶，而不去科学地认识事物，探明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这样就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把医学、数学、天文历算、农业技术等实证科学视为“小技”，而把“身心性命之学”看作“大道”。伦理道德高于科学真理，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

穷神知化的精神境界

《周易》六十四卦表达天下之理，尽管天下之理和变化之道隐藏在事物深处，不能明察，但它们包含在卦爻象和卦爻辞之中，可通过（周易）的“微显阐幽”来把握。《周易》所以能微显阐幽，知往察来，掌握天下之理和变化之道，就是因为“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传》说：“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凶吉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在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在这里“睿知”是深远望之意，所提到的神，含义不一，但主要还是指“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不测是变化无穷、生生不灭的意思，这种“神”乃是易之根本。把握这种易“道”就能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于“神”就是易变，所以穷神知化。穷即“研几”，穷极事物中深藏着的天下之理和变化之道，通晓万物化成之秘密。当然，穷神知化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必须要有深刻的心理体验和极高的德行修养，才能达到精义入神、穷神知化，使主体与客体达到高度的和谐一致。

“穷神知化”的要点在于涵养自致、气质自化、仁知自得。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在于心理素质的自我修养。自得乃心得，即用心揣摩，用心体会。为什么心理体验能够穷神知化，能够掌握天理人道？原因在于天理人道是一回事，是为易道。天人感通，心和万物完全相通。二者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合二为一。心本身即体现了天地万物的道理。天地万物的根本道理，无须在天地万物中去认识，而是通过自我心理体验去掌握。

自然现象丰富多采，变化无穷，社会现象、人事吉凶悔吝亦是如此。然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万事万物，万殊万变都有共同性，遵循同一规律。这就是“德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传》）。日月相推，寒暑往来，草木枯荣，世事更迭，人间盛衰，都同归一途，表现为屈伸相感的规律性。生必有死，枯必有荣，屈必有伸，反之一样。这种规律就是神，是阴阳之气变化的结果。然而阴阳变化对人来说是玄妙难测的，天地变化的规律并不是轻易就能知晓明白。所以，古往今来很少有人对屈伸相感之几微能了如指掌，透彻省悟。人们处阴阳变化中而不觉，终日思虑憧憧，屈时忧而怨忧，伸时乐而妄乐，始终摆脱不了混沌迷惘之困境，无时不受到客观自然规律之摆布。屈是忧，伸是乐，极少能伸屈自如，忧乐坦然。

人欲达到“何思何虑”、“何忧何惧”的境界，必有“精义入神”、“穷神知化”之功夫。《系辞传》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尺蠖作为虫类是靠一屈一伸而前行，龙蛇冬天蛰伏不动。尺蠖龙蛇的屈伸动静，对于它们的生命来说同等重要，必不可少。有屈无伸、有蛰无动或无屈无伸，无蛰无动都是不可能的。凡物有动必有静，有屈必有伸，这是阴阳变化规律之所然。对人类社会来说，这一规律同样适用。“精义入神”便是屈伸动静相依相存的表现形式。“精义入神”是人类屈静修养的功夫。进行这种修养时，是屈之至，即屈静阶段，然而，精义入神正是为了出而致用，屈静过后便可以利其用而安其身。对于人的修养而言，“精义入神”意指向内用功夫，是微显阐幽，研几穷理，“利用安身”是向外用功夫，是伸。由屈而伸，对事物体会愈深，干什么事情就可以泰然处之，得心应手。但“精义入神”和“利用安身”还只是处于知晓阴阳不测之物这样的“知”的阶段，还要进一步达到更高的“穷神知化”阶段。“穷神”不但知晓“神”，而且其聪明智慧几乎与神明相契。此时，阴阳造化，主客体臻于统一，人们屈伸自如，无所思虑。“穷神知化”是一般人不能企及的，唯有圣贤方可体悟。据说，古人只有孔子及其弟子颜回能称得上如此之人。孔子“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里的乐而忘忧，表明孔子、颜回已超脱了凡人为屈忧伸乐所累的迷惑状态，达到忧乐坦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易传》所谈的“穷神知化”实质上是一种心理体验活


动，神不仅仅理解为阴阳不测，易道变化，而且还可以理解为人的心灵智慧，即“心”。“心”即“神”即“易”。它与天理人道融为一体。如果说“神无方易无体”的话，那“心”，也是出入无时，没有时空限制。它是一种主体精神，具有极大的主体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心”既是本体存在，又是体验活动，是存在与功能、本体与作用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心”的概念应用非常广泛，可表示知、思、性、情、意、欲望、志趣等认知行为和心理活动。“心”的体验在《周易》中基本上是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就是不作主客内外之分，不可以客观事物为对象，不要概念逻辑分析和语言文字界定，而是直接从主体心理体验中领悟到天地万物变化之道，从主体心理体验出发通晓宇宙人生的根本意义。为什么从“心”中可体出“道”来。因为天人同一。人和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的，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天之所以为天之道就是心之所以为心之道。据此，要体验天之道，只需体验“心”之道。“心”的体验“体物而不遗”。只有“心”的体验才能“穷神知化，与天为一”。

心理体验也是人的情感思维形式。喜怒哀乐、信念意志等情感因素是心理体验的主要内容。《周易》理论中的基本思想，通过这些情感因素的心理体验，从而在卦象中体现出来。人们将自己的心理体验投射到天地万物之中去，以人的主观心理体验来理解、解释蕴藏在天地万物中的天理人道。

《周易》反映出这种心理体验状况，主要表现如下：

喜阳恶阴。喜阳恶阴这种心理在原始人类中已经萌发。

人们喜欢白天、太阳、晴暖的天气，而厌恶黑夜、阴雨天气。因为原始生活穴居山野，采果打猎是维持生存的基本方式。如果是黑夜、阴雨、寒冬，他们就不便谋取生活资料，有冻馁之虞，而且还易受毒蛇猛兽的威胁；如果是在晴朗的白昼，人们可以自由活动，尽情享受大自然的赐予。这种生存环境自然就形成原始人类喜阳恶阴的心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喜恶心理扩展投射到社会领域，产生了喜君人、恶小人，扶阳抑阴、阳尊阴卑等社会意识。这种心理意识经过长期积淀，凝结到人们的思维习惯中去。《周易》就是在这一社会心理支配下来阐发易理的。《易传》开宗明义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整个《周易》体系都贯串这一思想。既然一阴一阳之谓道，那么阴卑阳尊就是道的永恒性质。而由阴阳化生的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天地、君臣、父子、夫妻、男女、刚柔、上下等都有尊卑贵贱之分。

喜阳恶阴心理也渗透到《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之中。爻位分阴分阳，分刚分柔，并赋予优劣善恶的人世感情色彩。阳刚是优的、善的，自然受人尊敬喜欢，因此阳盛刚长为好；阴柔是劣的、恶的，自然遭人厌恶鄙视，因此阴盛柔长不好。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和天道运行一样，是刚柔相互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卦象中表现为阴爻 --、阳爻 — 的排列组合和相互转化。《周易》认为刚长吉，柔长凶，刚与柔相互消长反映人间君子与小人的斗争。例如剥卦 ，刚在上，五柔在下，柔长刚消，刚几乎被剥尽。此卦表明小

人得势，小人尽剥君子。这时，君子应什么都不干，“不利有攸德”，切勿妄动。又如泰卦 ䷊、否卦 ䷋，两卦都表现出人们喜阳恶阴的心理。否卦卦辞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意思是说：否时，坏人得势，不利于君子正道，阳刚美好的景象逐渐消逝，阴邪坏事滋生蔓延。泰卦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泰卦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外卦象征丑恶的阴爻逐渐排除消去，内卦象征美好的阳爻都已汇集拢来，这正是受人欢迎的“泰”的境地。总之，《周易》充满了好恶爱憎的心理体验，根据这种体验直接领悟出客观事物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趋吉避凶。卜筮断吉凶是《易经》基本职能。《易经》正是通过卦象和卦爻辞来表达吉凶祸福的基本取向，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逢凶化吉。为判断利害关系及程度，《易经》创立了七个常用贞兆之辞：吉、利、吝、厉、悔、咎、凶。吉为福祥、喜庆之事；利为可得利益之事；吝为艰难困苦之事；厉为危险之事；悔为悔恨懊丧之事；咎为轻微灾患之事；凶为祸殃之事。《易经》六十四卦，每卦都有这七种价值判断之语，它们是易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使没有出现这七个字眼，人们也可根据卦爻辞来理解这些字眼的含义。

趋吉避凶、趋利避害，这是人类本能行为。人们在行动中总是选择好的、有利的一面，而避开不好的、有害的一面。这一价值取向告诉人们要在有利时行动，不利时不能轻

举妄动，要谨慎戒惧。这种心理在《周易》卦象中表现为阴阳交错，凡上下两卦有交感性质则吉，没有交感则凶。“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彖传·咸》）通过卦象征兆判断吉凶，并无科学性。但这种求卦问吉的占卜方式却是人们趋吉避凶心理的集中表现。人们喜欢吉利，盼望成功，这是人之常情。《周易》卦辞爻辞则迎合这种心理，吉凶断语大都以吉利、无咎、无悔居多。“自易之既作而观之，则六十四卦未有一卦不可为也，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一爻之不吉。”^①说明《周易》注重易之吉相，吉比凶多，使占卜者容易碰到好运气，以增强行动的信心和决心。

人的趋吉避凶心理还反映出人们居安思危、处吉不骄、处凶不乱、化凶为吉的理智选择。《周易》是周代的大作，其思想自然要打上时代的印记。周以百里小邦，与殷商大国长期角逐，历经艰苦磨难和流血牺牲，最终以周代商。周王君临万国，一朝天子，唯恐得而复失。因此，常常教导周人“居安思危”、“不敢荒宁”朝乾夕惕，趋吉避凶。“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发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已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下传》）由此可见，《易》系辞体现着一种战战兢兢、如履

薄冰的临危心态。《易》辞始终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心存危惧，谨慎从事，必然平安。反之，麻痹大意，漫不经心，则必倾覆败亡。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危自安来，亡自存来，乱自治来。君子要深知此理，居安思危，存而不忘亡，只有这样恒畏“其亡”，江山就能像“系于苞桑”一样巩固。一部《易》书从始至终，归根结底是告诫人们两件事：一是敬畏，一是求得无咎。其目的是指导人们如何趋吉避凶。

心理平衡。我们知道，《周易》重视时中、中和，强调整体平衡。这一思想反映出人们追求公正与平衡的心理。

“阴者之所求，阳也，阳者之所求，阴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交感而成为一个整体。天地万物变化发展都处于阴阳整体平衡的状态之中。如果不注意平衡，就会陷于过与不及的极端，从而阴阳失调，万物不兴。《周易》心理平衡原则在卦爻象及辞中都有体现。如乾卦各爻之龙，好强冒进，六爻皆为龙，实为群龙无首。“上九，亢龙有悔。”亢是过度之意，乾于上九，龙至于亢，应为时势之必然。但事物总有两方面，超过了度就要求向反面而转为退。元龙如果不注意谦退，就会有悔。根据这一情况，乾卦“用九”则对群龙压抑，要求不要为首，注意谦退。又如“家人”卦，“初九，闲有家，悔亡。”家庭是人们获得心理温暖和慰藉的地方，如果一开始不立下规矩，实行约束，就会滋生松弛松懈的心理。这样就会伦序搞乱，子弟变坏，后果不堪收拾。所以，对家庭来说，要有弛有张，有宽有严，不可使懒惰心理

放任自流。“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家长以自身的模范行为感动家人，从感情上把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和谐起来，使他们莫不相爱，而不能将威严强加到家庭成员头上。损卦和益卦是相互补偿的关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损卦要人民对国家负担贡赋义务，而益卦则给人民以补偿。只有损益互补，才能平衡人民心理，使人民乐于尽义务。《周易》最后两卦是既济和未济。既济离下坎上，六爻皆当位正应，离火炎上而居下，坎水势下而在上，上下交融，阴阳感通，仿佛大川已济，一派升平气象。在这时，易于令人心理满足，产生麻痹情绪，人于既济生止心，止心生则怠惰不勤，不思进取。这种心态是十分有害的，时间一久则衰乱不可避免，所以，“初吉终乱”。到了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这是说，未济之亨是部分的，老狐能亨，小狐不能亨，小心谨慎者亨，大意莽撞不能亨，要看事态的发展和主观的努力如何。“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序卦传》）事物变化没有穷尽，生生不已，没有止境，这一辩证思想集中反映在未济这一卦上。未济即未穷，未穷即生生不已。未济卦虽终而意未尽，以未尽为六十四卦之结尾，蕴含着积极的平衡的心理机制，激励人们始终不懈，奋斗不止。

超越自我的直觉体验

《周易》的卦象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象数符号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符号和意义、形象和本体、思维主体和客体对象完全合一，意义通过符号表现出来，象数表现出无形无象的本体意义。“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系辞上传》）根据卦象来认识易理，是意象思维形式，它是从具体形象符号中把握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不重视语言的逻辑分析，也不使用逻辑语言，却重视象数辞占所指称的本体意义或抽象意义。通过“象”这个中介，在道德情感、心理情感的直觉体验中，完成天人合一、心理合一、主客统一的整体认识。

《周易》认为，天人遵循的是同一个“道”或“理”，即“性命之理”。天地之道与人之道在形式上不同，前者为阴阳柔刚，后者为仁义，但二者都“顺性命之理”。所谓“顺性命之理”是顺其天道人性合一之理。“性命之理”的性是就人而言的，是人的内在本性；命是就天而言的，是天之理。性命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性来源于命，命实现为性。命决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之道，要通过人去实现出来。同时，人性只有超越自我，才能成为天地之道。性来源于命，实际上是将命内化为人性，天道变成人道。这是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内化阶段。天道被内化为人道而

存在于人的内在本性之中，要实现这种天道，就需要主体的自我超越，也就是要“尽心知性知天”。只有经过自我超越，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天道性命”。

怎样实现自我超越而达到“性命之理”？这需要主体的直觉体验。直觉体验就是体神以明理。理是无形的，既在象数之中，又超越象数之外，要认识性命之理就要靠人的精神去感应和掌握。“精义入神，以致用。”事物变化之“道”无形可见，无名称谓，只有靠精神这面镜子去体认。但这种体认并非要百般思虑，苦心追求，而是以宁静之心去把握它，用“神”来感通它。“神”的这种直觉感通既不需要感性认识，也无需理智分析，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直觉思维。

实现通感的过程，就是进行直觉体验的过程。“道”或“性命之理”、“寂然不动”与此相通的只能是“神”。因为“神”无形无体，变幻莫测，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它能与“道”感而相通。在这里“神”既是实体，又是功能。作为实体是说神是道的化身，是道的体现；作为功能是说神具有神明作用，它能“妙万物”，与“道”能“感而遂通”。“神”的主要特点就是体验。但这种体验与道德体验不同，也与心理体验不同，它带有直觉的神秘性，是一种直觉体验。

“神”与“道”相感通的基础是屈伸相应，阴阳相感。一物有一物之变化，一事有一事之时宜。认识事物就要因时而变，不能执一不变。《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是事物万千变化的具体描述。然而，不管事物变化如何千差万别，但都遵循同一规律，这就是阴阳相感，屈伸相应。阴阳

相感而万物化成，屈伸相应而变化生矣。日月往来，寒暑相易。草木生灭，人事盛衰，均是屈伸、阴阳使然。当然，阴阳变化之道不是直接为人所掌握的，人们实际上很难把握阴阳变化、屈伸相感之几微，正是“几微”变幻莫测，便称之为“神”。变化由阴阳相推造成，阴阳相推，或阴或阳，两者不测，正如阴爻阳爻组合的卦画那样变化莫测。事物屈伸相感之“几微”是“神”，它与“道”感而遂通。所以，要体“道”就要“研几”，要体验出“几微”中的性命之理来。

直觉体验是体察万物变化展开的初始状态，从万变中体验出不变来。为此，就要“研几”、“精义入神”，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系辞传》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深，言事理深奥难测；几，言事理细微未著。圣人利用《易》之“至变”以穷极事理不易见的几微，利用《易》之“至精”以穷极事理中难测的“深”。把握了事理中的奥秘和“几微”，就能明了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系辞》对《易经》特点概括为“三至”（“至精”、“至变”、“至神”）和“四尚”（“尚其辞”、“尚其变”、“尚其象”、“尚其占”），这一概括突出了《易经》的中心要旨是“变”。“唯变所适”，人们要按（易经）的“变”去认识和实践。但如何“至变”、“至精”呢？这就需要“研几”。“几”存在于复杂的“变”之中，它“象见而未形”，易逝易隐，单凭感性直观很难确切掌握，只有“极深而研几”，才能“知几”。“知几”就能“探颐索隐，

钩深致远 以定天下之吉凶（《系辞传》）

“研几”是要探究卦爻变化以及事物变化的原因，《易传》把这一原因称为“神”。“研几”也就是“穷神知化”。魏晋玄学家韩伯在对《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一语注释时说：“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诂者也，故曰阴阳不测。……是以明两仪以太极为始，言变化而称极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为者，穷理体化，坐忘遗照。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不思以玄觉，则以神为名。盖资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于神者也。”^①神是万物变化之根源，万物有形象，神则无形象可言，所以它“阴阳不测”。要找出这种变化之“神”，不能求其所以然，不能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来得到，而只能自我“穷理体化，坐忘遗照”，使自己的灵魂同“神”化合为一。这就是“穷神知化”的过程。在此过程，对事物的认知是不必要的，功夫全在于崇德。只要时时刻刻修养自身的心性，不为形累，不为物迁，即可以与道同体，神与物冥。人的修养心性达到这种境界，德盛仁熟，其结果必然是“研几”得“神”、“穷神知化”，天下万事万物变化之规律已被认识透彻。

由此可见，上述的“研几”或“穷神知化”，是一种无须感性和理性思维的直觉体验，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自得”。对这种不依门傍户的自得功夫，孟子有深刻论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

韩伯：《周易集解》。

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自得”的意思是说事物变化之“道”或“神”的获得靠自我体验、自己求得，而不假借外界之物来帮助自己体“道”。这种自我体验行为是人的本能，正如人渴而知饮，饥而知食那样，无须他人教导，也不必用心思虑，只需自己修心养性，经过自我长期修养磨炼，就能心领神会，把握“神”、“道”。

自得的直觉体验是“穷神知化”的关键所在。这种体验是一种玄思、静思的体道行为，通过它而达到对万物变化之根本原因及意义的终极认识。据此而言，《周易》的直觉体验又具有一种直观的理性主义倾向，而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着重大影响。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特别重视“心”的自得作用，强调“心”的直觉体验。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老子主张“涤除去览”，要求排除耳目见闻的影响，而发挥“心”的作用。三国魏人王弼（226—249）认为圣人的心智比一般人要高，因而圣人能和本体之“无”相通。北宋哲学家程颐（1033—1107）说：“尽己之心则能尽人尽物。”朱熹强调要充分发挥“心”的作用以穷物理，认为“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能存心而后穷理”。所有这些论述，都表现为直观理性主义。它否认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强调“心”即理性对体神明道的作用。但是这种理性没有科学论证，也没有明确的界定，具有整体模糊性，并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

第六章

《周易》思维与自然科学

《周易》象数与义理的有机统一和互相转换，使（周易）体系能容纳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它不仅奠定儒家理论基础，初创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而且还“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周易》理论宝库中蕴涵着大量的以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利用的范畴框架、符号系统、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

具有中国特色的朴素自然观

我国古代对自然界和人类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周易》一书中得到比较完整、比较深刻的反映。《周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中的天、地、雷、风、水、

火、山、泽八种物质是宇宙万物构成之始基，八卦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征宇宙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周易》是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学说。“生生之谓易”八卦所摹拟的宇宙构成图景，是生生不已，千变万化，具有无限发展过程的宇宙。这就是《周易》的朴素自然观。

《周易》朴素自然观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阴阳交错”、“刚柔相推”、“天地相感”而生变化，位于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意思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彖传》）乾元强调万物创生化育过程是由乾开始，乾坤合德，共生万物。没有乾坤就没有万物生成，也就没有“易”。六十四卦也是由乾坤所创生，是乾坤交错，发展变化的结果。《系辞传》特别强调这一观点：“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刚柔相推，阴或变阳，阳或变阴，阴阳相荡而生变化，这既是《周易》卦爻生成的根据，又是客观世界变化的原因。阴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观点，道破了《周易》的实质性内容。阴阳、刚柔、天地是具有相同性质的概念，彼此均可互代。“天地感而万物万生”、“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等命题与刚柔相推、阴阳合德而生变化的观点是一致的。反映出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根本认识。这种自然观虽很朴素，但充满着辩证精神，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周易》自然观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天命观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对天的认识可能是古代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开端。天苍苍，地茫茫，旷达深幽的穹宇笼罩大地万物。日出日落，寒暑相易，狂风暴雨，雷鸣电闪，如此之神力，皆为天使然。凡此种种，人们自然对天的魔力产生敬畏之情，也极欲探知天之奥秘。对天的理解，《周易》不是盲目崇拜和赋予宗教神秘性，而是以人道来解释天道，从人事中把握天理。太阳运行，四时变化，寒暑往来，昼夜更替，这就是“天”。但《周易》把自然之“天”同人类活动和社会规律联系起来，强调天人关系的统一性，强调“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谐、协调。《周易》认为“天行健”，天的生命力就是天命；“天人合一”要求人们“享天之命”；“承天而时行”；“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周易》中，“天”作为命定、主宰义和作为自然义的双重含义始终存在，具有某种不确定的模糊性质。“天人合一”命题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与崇拜。人适应和遵循自然规律，就会得吉利贞，反之则有咎有凶。这是客观必然性，故人要顺应天道。由天道推及人事，也是不能违反的。人，特别是统治者不能不修德行和违背民心，唯有德者，能使民归之，“诸侯”顺之，才能爱民、保民，进而稟受天命。有德者，受天命。失德者，天降丧。德是入之道，与天道一致，通过德，天与人、天命与人，心合而为一。“以天为宗，以德为本”，敬天尊祖，以德配天，天人相通，“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这是《周易》所描

绘的天人合一的美妙之境，是其朴素自然观的充分体现。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周易》中是通过卦象阴阳两爻的相感相斥的运动变化而反映出来的。阴阳是客观世界变化发展的最终原因。在《周易》产生之前，还有一种“五行”说。它把自然现象和人的活动归结为五种物质元素，即水、火、木、金、土。水有润下之性，火有炎上之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销熔而改变形状，土可以种庄稼。把水、火、木、金、土看作是五种性质，而不是五种具体的物质，“五行”说实际上是用这五个范畴来解释和说明世界，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一种根本观点。阴阳五行说和《周易》在战国末期已彼此沟通，互为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音律、医学、农学等具体学科的发展。

我国古代自然观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及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一致与统一。这种自然观的形成与中华民族思维传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前面讲到，《周易》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发源地。《周易》体现出来的整体思维、唯象思维、情感思维等思维方式，都带有朴素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都是从事物的整体、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有机统一中来理解客观事物。而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则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立足点，由这种思维模式出发，就会把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相分，作为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但中国古代文化氛围突出人的体验而不是逻辑分析。人不是对客观世界进行知性认识和理性分析，而是对《周易》提供的卦象进行体验。卦象是自然、社会、历史、

精神世界的摹拟，万物变化无不体现在卦象之中，也无不体现阴阳消长的规律。无论是天体运行、季节变化，还是人体机能、个人命运、历史变迁，都是阴阳消长、阴阳盛衰之象。人们观象系辞，得知的是吉凶悔吝，而不是客观对象的具体知识。人们不需借助其他认识工具和手段，凭借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心理体验，即可直观出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本规律。这是因为，宇宙万物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道”。体验到人道，也就体验到天道、地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任何事物都可通过象的体验而得到说明。把握了这种象的统一性，变化莫测、零乱杂多的感性世界即可归纳为一个同一、和谐、秩序、相互爻感互应的整体。

《周易》以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观点解释说明自然界，带有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必然产物。《周易》自然观虽然是有机整体自然观，充满辩证精神，但它忽略对客观事物的细节和成分分析，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往往是模糊的，不精确的。这种辩证综合的自然观，虽然使古代中国在自然科学许多方面有所建树，但由于整体模糊性，也严重制约了我国民族理论思维和科学技术发展。这种自然观与西方近代实验分析、逻辑推理的机械自然观不同，缺少科学实验和理性分析基础，而且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占主导地位，使中国自然科学长期处于直观猜测和朦胧意识的水平上，落后于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朴素自然观由于是以模糊方式表达的，缺乏事实材料的分析和验证，因而始终不能转化为科学的思想体系。

中西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差异之一，是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周易》的天人协调性，肯定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天地合称“三才”，同为万物之本，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性即是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都表现为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对立统一。天人和谐是人生的理想追求，人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把天人合一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这就忽略了物质生产这个建立、保持和发展人与自然统一的关键环节。通过道德修养而不是通过物质生产达到天人合一，势必影响人们对自然界本身知识的探求，影响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分立，认为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去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知识就是力量”，人掌握知识就是为了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所以，他们追求知识，追求科学技术，这就必然会推动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

象数模拟的古代天文历法学

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与《周易》有着不解之缘。有人认为，《周易》来自古代历算和天文观测活动，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阴阳五行思想在哲学、文学上的反映。天文、历法

在我国是最古老的学科。古代劳动人民非常关心天空中日月星辰的变动情况，探索天体运动的规律，用天文历法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根据实践需要，我国古代人民创立了年、月、日、时的计时系统，在殷商时代已采用干支纪日。干支纪日是以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顺序相配组成。一日一个干支名号，日复一日，循环使用。战国时期，根据月初月中的景象和物候知识，将冬至点开始到一个冬至点（一个回归年）的日数分为二十四个区间，给出了专有的名称，这就形成立春、雨水、惊蛰、春分……二十四节气。为了确定月亮、太阳和恒星的准确位置，我国在殷末周初（约公元前十二、三世纪）建立了按时圈与赤道相截的点来划分的完善的赤道区分体系，也就是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就像公共汽车的站牌，按照它的指示就可以明确说出太阳所处的位置。我国古代天文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二十八宿星象图上，恒星观测要依靠它，制定历法离不开它，特殊天象的出现也是以它作为记录方位的依据。

我国古代天文学又始终是和占星术联系在一起的。古时观察天象的人是巫士，星辰运转的知识都为他们所垄断。他们把观察到的一些星辰运行现象和世事、人事联系起来，变成一套复杂的占术体系。“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

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① 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冯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意思是说靠美德行使统治权的人可与北极星相比，他总是保持着原有的位置，由众星围绕保护。用天象来说明人事，是古代占星术迷信活动的基本特点，例如，“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用昼象类比人事，使古代占星术复杂化、神秘化。星象变化复杂，如果不具有丰富的天文知识，很难进行这种星象占卜。所以，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占星师。古代科学结构是同宗教迷信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统治阶级利用占卜迷信维护其政治、经济政策的手段。《周易》就反映了这种时代背景。《系辞传》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把八卦看成是圣人之作，不过是为了提高《周易》之权威，依托远古神人的创造。实际上，八卦不过是卜筮者求吉凶的发明创造，与占星术一样，也是用物象来解释人事，祈求神灵赐给预知。不同的是，《周易》是用蓍草占卜。其筮法同占星术形式虽不一样，但实质意义是相同的，都是把天象作为占卜的依据，八卦的形成与天文历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周易》思想体系建立后，无论是对儒家封建政治理论形成，还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张守节：《正义》。

人们往往用《周易》原理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从八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科学的框架模式。这一现象在汉代表现得最为突出，西汉时期，对《周易》的解说成了专门的学问。其中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学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孟喜易学是以阴阳说解释《周易》，以此推断人事吉凶和气候变化，由此提出“卦气说”。这一学说通过京房得到进一步发展。“卦气”是以《周易》卦象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即以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是书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凡八变而六十有四。于是往来升降之际以观消息盈虚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万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辩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节气，志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京房《易传》），可见，京房易学模拟造化、包罗万象，大凡四季气候，日月星辰，地理方位，生物繁衍，都可通过卦气推导而预测出来。孟京易学的卦气说，是西汉时期天文学的理论基础，人们均以卦气说来解释天文现象。当时流行的是“正卦说”、“辟卦说”、“纳甲说”、“爻辰说”，这四种对天文历法的解释，具体内容如下：

一、“正卦说”即以易卦推衍四季、二十四节气。根据《说卦传》中“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这一段话，象数家以震、兑、离、坎配东、西、南、北四方，四正卦同时主四季，震主春，兑主秋，离主夏，坎主冬。四正卦各主管二十四节气中的六个节气。震卦主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六节气；离卦主夏至、小暑、大暑、立秋、

处暑、白露六节气；兑卦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六节气。也可以将四主卦的每一爻代表一节气，如坎卦初六为冬至、九二为小寒、六三为大寒、六四为立春、九五为雨水、上六为惊蛰。其它三正卦例此。此说还以四季配四方，东方配春天，南方配夏天，西方配秋天，北方配冬天。四正卦坎离震兑是取该四卦的卦义来比附四季、四方、二十四节气。

二、“辟卦说”，即以易卦配十二月，七十二候。十二辟卦是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依次配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此十二卦代表一年节气中的中气。因每卦刚柔两爻变化过程是一阴一阳消长的过程，这十二辟卦又称十二消息卦。前六卦复 ䷗、临 ䷒、泰 ䷊、大壮 ䷡、夬 ䷪、乾 ䷀，阳长阴消，复卦阳气始动，乾卦阳气盛极，此六卦又称息卦。后六卦姤 ䷫、遁 ䷗、否 ䷋、观 ䷓、剥 ䷖、坤 ䷁ 阴长阳消，姤卦初六表阴气始动，到坤卦六爻皆阴，阴气极盛，此六卦又称消卦。十二辟卦共七十二爻，配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在《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书均有记载。“辟卦说”将这种物候学知识同卦象联系起来，七十二物候正好与十二消息卦的七十二爻相应。“候以天五”，每两候之间相距五日，二月三十天，则每月有六种物候。按着卦气图上所示，每一节气有三种物候，如立春，其物候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立夏是“蝼蝈鸣”、“蚯蚓生”、“五瓜生”等等。七十二物候是从观察不同地区

一年四季植物生长荣枯、动物生育往来、四季气候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概括出来的。按物候知识，古代的人们可以预测季节变化趋势，指导农事活动，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象数学家们将物候学知识绘成卦气图，编定阴阳变化、寒暑相易的大成之序，认为自然变化可按图推算，“刻期不爽”具有重要意义。三、“纳甲说”，即以易卦配天干，五行。“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京房《易传》），八卦配十二干，乾坤两卦是父母卦，可配以甲乙壬癸，表示乾坤乃阴阳之始终，其余六子卦依次配以庚、辛、戊、己、丙、丁。八卦同天干相配之后，天干两两组合再同五行相配，制成八卦纳甲图。它不只用以记时，主要是用于说明社会现象。八卦与五行本是古代思想家探讨宇宙万物本原问题的两种理论，汉象数学把五行学说纳入八卦体系，构成了神秘的“纳甲”思维模式。四、“爻辰说”，即以易卦配地支，二十八宿。此说其一是按《周易》六十四卦的顺序，每对立两卦，其六爻配以十二辰，代表十二个月份，为一年；三十二对卦象，则代表三十二年，从乾坤到既济未济，往复循环，推算年代。其二是以乾坤两别卦象征太极，其阴阳十二爻相间排列以纳十二地支。以地支分组布于四方以代表四季十二月，然后每方纳七个星宿，构成圆形爻辰图。“爻辰”说中的星辰与爻位的对应关系，是象数推衍的结果，它不以科学观测为基础，只是为汉《易》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孟京易学借助于当时的

天文、历法讲《周易》，反过来又对天文历算起了重要的影响。在此以前，战国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天文历法的理论根据。孟京的卦气理论创立后，天文历法就采用卦气说来研究，解说星象和历算。汉以后，天文历法就采用卦气说来研究，解说星象和历算。孟京的卦气说成为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历书都运用卦气说来解说明历法。如东汉末年的《乾象历》、北魏的《正光历》、唐《开元大衍历》等。汉代著名学者张衡、王充、僧一行都对卦气理论给予了肯定，强调卦气说对制定历法、观测天文的天文历法学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阴阳平衡的中华医学养生学

《周易》的核心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我国古代中医学全面参照和吸收了《周易》这一思想精髓和思维方法。可以说，没有《周易》就不可能有中医基本理论的形成。中医学是建立在《周易》的阴阳理论基础上的中华医学理论。所以“不知《易》不足以医”。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奠基性著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周易》阴阳学说论述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施治方针。该书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把人体组织结构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人体外部属

阳，人体内部属阴；人体上部属阳，下部属阴；背属阳，腹属阴；四肢外侧为阳，四肢内侧为阴等。并把每一脏腑的功能也区分为阴阳两方面，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等。

《周易》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阴阳相互依存和阴阳消长平衡的关系之中，阴长阳消或阳长阴消都不能超过其极限，“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易传》）。这一观点和方法，在《黄帝内经》中用作为临床施治的根本方针。人的正常生命活动是以阴阳协调平衡为前提，阴阳一旦失去平衡或称阴阳失调，则人体正常平衡状态遭到破坏，阴阳偏盛偏衰都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阳虚则内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寒热病证均为阴阳失调所致。《内经》还认为机体阴阳任何一方虚损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不足，“阳损及阴，阴损及阳”，最终会造成“阴阳两虚”。机体一旦阴阳两虚，“阴阳离决”，那么，生命就会终止。阴阳失调既然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在临床诊断中就要辩证施治，“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只有分清阴阳，才能抓住疾病的病因，无论望、闻、问、切，都莫不以先别阴阳为首务，分清阴阳虚证后，再确定治疗方案，治疗的目的也是调节阴阳，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

汉代是汉《易》大发展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兴旺时期。《周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随着解易说易易学的盛行而得到广泛传播。正是在易学的启迪下，人们加深了对自然界的认识，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黄帝内经》

本是道家黄老之术，但书中大量引用了《易传》经典论点，以此为医学理论根据。《黄帝内经·素问》以乾坤卦象文和系辞立论，以阴阳说解释生理现象、解释疾病成因，并以阴阳相互依存的法则来论证如何进行疾病治疗。按照阴阳对立统一规律，解释生理、观察病理，对疾病辩证施治的中医理论是世界医学中的一大流派，其影响早已超越中国范围，其理论精华也越出了治病医疗樊篱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的基本原则。

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创立的中医六经理论是中华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医临床理论的基本支柱，有与《黄帝内经》齐名之誉。六经学说即三阴三阳学说。六经指厥阴、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表示三阴三阳六种象。也就是人体六种生理和病理状态。如太阳，指体表高热，阳气盛大的“太阳病”；阳明是阳气内外俱亢，身体内外高热，此谓“阳明病”。六经是六象，是把人体无穷变化的证状抽象成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六象系统。六经与《周易》的象数观念密切相关，三阴三阳组成六经，就是来源于八卦之象。它根据易卦六爻成象、变化无穷的思想，从而提出中医六经的辩证纲领。

中医学的基本概念均来自源于《周易》。《易》称八卦，中医有八纲、八法、八阵、八虚、八风；《易》有太极，中医称其为精、气、神。“天地之气，合之曰人。”（《内经》）中医六经把人体看作是一团完整的气，它既包括有形的生物物质，又包括无形的生理机能，气是人体的“神”、“神无方

而易无体”，这看不见的“神”主宰着人体生命。“调阴与阳 精气乃光 合形与气 使神内藏。”（《内经》）阴阳相合产生精、气、神，于是生命就有了根本。这些概念均是《周易》理论的推广与应用。《周易》的象、数、理、时、气诸原理都渗透到中医理论之中，并在历代中医大师的理论中得到发展。对此，明代中医大师张景岳（1562—1639）明确指出“医易同原 同此变化也。”（《类经图翼·医易义》）

汉易的象数学派重视阴阳六爻的象数变化，试图从六爻之变化推断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联系与变化。汉易的象数学对当时的中医学影响很大。当时的医家认为天下之象既然可以从数上而定，那么人体自身及百病之象，亦可以从数上考察。按此思路，提出“六经”学说。所谓“六”则是借取《周易》八卦中的六爻之六。东汉张仲景在注解伤寒论时指出：“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 阴阳离也。阴阳交易 人变病焉”；“病发阳者七日愈 发于阴者六日愈 以阳数七 阴数六故也”（《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伤寒例篇》）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张仲景是用《周易》象数理论来论证“六经”的。八卦六爻之象数，“七日来复”之义理，无不体现在伤寒论篇中。

古代中医还根据《周易》天人相感原理，将脏象学说与太极图原理结合起来，构成一人体结构模式。这一模式将人体五脏六腑统统形象化，“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认为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肾主冬，把人的脏腑与四时联系

起来。在人体结构图中，甲为胆，乙为肝，丙为小肠，丁为心，戊为胃，己为脾，庚为大肠，辛为肺，壬为膀胱，癸为肾，每一脏腑各有定位，与天干地支相连。脏为阴而居外，腑为阳而居内，外阴内阳呈交感之状，正如坤上乾下的天地交泰，互相感通那样。阴阳交感，则人体机能平衡协调，身心健康；反之，阴阳不交，阴阳离散，则生命垂矣。把人体结构模式化、形象化，使得太医能根据脏象太极图来制定人体内部病变情况，从而利于辩证施治。

养生和气功也属于中华医学的宝贵财富，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其发展也与《周易》理论分不开，都受到《周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养生和气功领域，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和称道。融天、地、人三道于一体的《周易》同养生气功之术是相连相通的。明代大医师张介宾对人体养生与易道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深刻说明，他说：“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他称天地之易为“外易”，身心之易为“内易”，天地身心，内易外易，都是“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气互相平衡，彼此调和是天地万物之规律。天地交感，阴阳感通则万物化生，同样，人体内部如果像天地阴阳那样处于交感姿态，能调和人体中的阴阳二气，必然产生人体功能变化，形成新的力量，促进人体健康。

人体阴阳两种力量平衡协调，为什么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祛病强身和延年益寿呢？这是因为，人体是由许多阴阳

对立的双方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如细胞有红细胞和白细胞之分，正常细胞中可分为环状腺嘌呤核苷酸和环状鸟嘌呤核苷酸这两种相互对立物质。这两种物质保持平衡，就能共同完成生理调节功能。如果鸟嘌呤升高显阳性，身体就会产生病变，而要控制病变就须用药升高腺嘌呤水平，使其呈阳性，以抑制后者，从而保持阴阳平衡，细胞还具有原料输入与产品输出、养料吸收与废物排除、食物分解和蛋白质合成等对立性质的功能。没有这些对立功能的平衡协调，就没有生命的存在。人体许多功能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体，营养物质的同化与异化，肌肉的收缩与舒张，神经的兴奋与抑制，体温的产生与散发，血液的凝固与反凝固，免疫系统的抗原与抗体，等等，都是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功能，这些对立面具有阴阳对立性质，对立面双方互相依存，有机统一。如果统一体破坏，对立面不能协调平衡，人体机能就会遭到破坏。

养生学特别注重“天人相应”这一养生原则，提倡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掌握四时变化，有天地万物，然后才有男女，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的生命源泉取之于自然界。因此，《周易》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只要和自然界相协调，做到“天人相应”，就可以健康长寿。我国古代医书《内经》就是根据这一原理，提出“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的养生原则。同自然时间节律性一样，人体生理活动也有规律性和时序性，现称之为“生物钟”。人体温度之升降，

情绪之高低，呼吸之快慢，智力之强弱和其他许多生理周期变化，无一不有时日、月份、年际的节律变异性。呼吸是日快夜慢，血压是晨低晚高，甲状腺的分泌功能冬强夏弱，如此变化表明人体生理现象与自然时序紧密相连。对此，古代养生理论提出了要依四时万物生、长、收、藏的节律养生祛病。全面探讨了人体生理、病理变化与太阳的运转、月球的盈虚、昼夜的更替、季节的循环等自然变化之间的相应关系。指出要“天人相应”，而不能“天人相忤”。例如，《黄帝内经》的《素问》篇，就要求“与四时合其序”。人们须顺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气”变化特点，调摄精神，达到养生防病之目的。春天的养生之道是迟睡早起，早晨宜于松缓衣冠，舒展形体，使人精神活跃于春意盎然之中，否则就易伤肝损气，易患风寒；夏天气候炎热，人们应晚睡晚起，保持心境愉快，使体内的阳气宣泄于外，不然就会心气郁积，易得疾病；秋季人们要早睡早起，保持安逸宁静，收敛神气而勿外露，这样会使肺气强劲，增强对严冬的适应能力；冬季要早睡晚起，保养精神，恪守阳气，避免受寒，以待日光。人们只要与四时相适应，不违反自然规律，就会延年益寿，身心健康。如果不顾日月运行之规律，颠倒日作夜息之次序，任性而为“天人相忤”就会生理功能紊乱衰退，疾病缠身，未老先衰，身虚短寿。

我国古代养生学还强调“养德”，保持心理健康和精神愉快。《周易》里面蕴藏着人的精神状态要与人的形体相统一的思想。人不但要与天时合序，天人合一，而且还要形神

合一，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促进人的身体健康。《周易》这一思想在古代养生学中得到具体的应用和证明。“养生在凝神，神凝则气聚，气聚则形全，若日逐攘忧烦，神不守舍，则易于衰老。”（《医钞类编》）“喜怒不节，生乃不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诸如此类的种种论述，都说明人的精神状态与人的身体功能互为影响。人的精神如果剧烈波动，就会诱发病痛，“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易经·无妄》）而心情坦然，宁神静养，有助于病体早愈。总之，人的生理心理必须相应协调，养生必养德，才能真正做到身心健康，益寿延年。

气功是古代养生的重要方法，练气功不仅能祛病延年，强健身心，而且能增强人的感觉机能，萌发释放潜在的人体能量。千百年来，气功在我国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结构，其理论主要是由天人合一的整体生命观理论、精气神三位一体的内脏相关理论，经络理论，阴阳五行理论，天干地支理论等构成的学说体系。气功锻炼方法是内求法，这一方法类似《周易》反求诸己，穷理尽性的体验方法，是通过运用内向性意识的锻炼来提高人体的身心机能。气功学说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各个不同层次和过程统一起来。这个统一的世界也就是八卦所代表的宇宙万物，即宇宙全息统一场。整个宇宙都在全息统一场中得到和谐的统一，人与宇宙在这种场的交感中实现了融合。气功呈现出来的各种奇异功能是人的意志作用的结果，其内在机制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人与自然发生的感应关系则是肯定无疑的。气功

修炼是由静而动，习静养气，正如《系辞传》所描述的那样：“《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通，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气功通过意守丹田的静修静养而达到天人合一之境。

八卦模式的数学和建筑学

中国历史上，大凡精通八卦的人都有数学计算的杰出才能，不精通数学知识也就不能精通八卦。因为八卦的筮法是一种复杂的数学计算，八卦学说的产生是与数学计算活动有密切联系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六十四爻，这就是数学中的重复排列： $2^2 = 4$ （四象）， $2^3 = 8$ （八卦）， $2^6 = 64$ （六十四卦）。《易传》还认为八卦筮法是通过算出九、八、七、六四个数确定卦形，九代表阳爻，六代表阴爻，用奇偶二数解释筮法和卦象的形成。古代的数学家和易学家都认为伏羲画卦是我国数学的起源，而且都认为阴阳学说是数学原理的本质核心。一切数学问题均可用《易》理加以解释说明。“观阴阳之割裂 总算之根源。”^①我国第一部算经《周髀算经》就谈到数、易同源，并引用《周易》观点论述算经。汉代赵爽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解释《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将勾三、股四、弦五解释为“因奇偶之数，以制其法”，“配

刘徽：《九章算术注序》。

阴阳之义”。宋代易学家邵雍（1101—1077）、陈抟都以象数而著名于世，其易学被称为数学。他们把奇偶二数作为“天地之正数”，认为一切数和一切象，都是从奇偶二数推导出来的，并把六十四卦象纳入奇偶二数排列组合的系统，以奇偶二数作为画卦的基数。这一思想潜在着现代计算机使用的二位进制数学萌芽。莱布尼茨就是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发明二进制的，认为六十四卦的排列是把六十四卦用二进位法写出来。如果把阳爻当作 1，阴爻当作 0，自下而上地将三爻写成三位数字，其结果如下表：

表 4

| 卦 | 乾 | 坤 | 震 | 巽 | 坎 | 离 | 艮 | 兑 |
|-----|-----|-----|-----|-----|-----|-----|-----|-----|
| 符号 | ☰ | ☷ | ☳ | ☴ | ☵ | ☲ | ☶ | ☱ |
| 二进制 | 111 | 000 | 100 | 011 | 010 | 101 | 001 | 110 |

（三画卦相重为六画卦，其二进位符号仍可写出来的，如泰卦 ☰☷，可写为 111000，否卦 ☷☰，可写为 000111。）

莱布尼茨对八卦评价很高，为此还专门同康熙皇帝通过信，将八卦称之为世界最神秘的发现之一。当今天有人认为八卦就是一部电子计算机，八卦学说包括了当代电子计算机的主要特性，其易数的运算、易理的逻辑、易象的贮存记录都与电子计算机功能有相似之处。《周易》与计算机好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古代建筑也深受《周易》思想观念影响。《周易》中的“天人感应”、“天尊地卑”、“得中重时”等基本思想渗

透到古代建筑观念和建筑格局中。无论是都城皇宫，还是百姓住宅，大凡兴工动土，都要察看地形，看它是否得风水，然后择宜土、避凶地。相地术即看风水在古时非常盛行。我国历史最早的先秦文献就有许多相地术方面的记载，商周时期已将“相地”作为建筑的必需步骤。《尚书·盘庚》记载商王盘庚迁都于殷的理由：“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把迁都于殷看作是天帝授命。周成王营建洛邑三次，每次都通过占卜来相地相宅，卜得吉兆后再来营建。秦汉之际相地之术掺杂了阴阳八卦，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荒诞迷信成分，把相地与观天结合起来，使相地术成为迷信术。东汉的王充（27—97）在其著名的《论衡》中就谈到宅地与人事的相互关联。认为兴建宅舍，应该避讳，要选择风水宝地而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他说：“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论衡·四讳篇》）向西扩建宅室被认为是最大的禁忌和不祥，此后，人们便将西看作是凶相，讳西就成了相宅的一条原则。

古代相地术重视察看山水走势，讲究建筑物的方位、向背、排列结构，同时，注重“气”。把《周易》的阴阳之气、刚柔之气同地势方位联系起来，将“气”同“形”、“势”并列为相地三要素。认为山气刚，川气柔，“刚柔相荡而地道立矣”。故古人常把依山傍水之地作为修筑阴宅墓穴、阳宅村邑房舍的理想之处。即使近代，也有些农村人非常看重村前村后的“风水林”，因而树林乔木同河流一样，能“藏风得水”，保持生机，如果滥伐“风水林”就会“生气逃逸”，

村邑衰败，人丁不兴。

滥觞于《周易》的相地术，历史悠久，深入民间，它所体现的易道精神，对中国建筑风格形成有很大的范导作用。我国古代最基本的住宅是四合院，以院为中心，四周以屋舍。庭院既是采光日照通风之处，也是通道和活动中心，整个建筑呈现出封闭性、内向性特点，高墙深院，重重屏障。大到皇宫城池，小至平民宅邸，都大致如此。这种平面展开，以院为单位，由房舍、墙垣围成院的建筑格局，是《周易》天人感应，人神一体的思想寓意的写照，是内向性思维的结果。

（周易）的阴卑阳尊思想对古代建筑设计也有着明显影响。按古人习俗，居中面阳（南）为尊，面东西者次之，面阴（北）者则显卑。在建筑设计时，特别重视位置方向，往往取背阴向阳，座北朝南方位。古时的王宫、衙署、坛庙、佛寺都以向阳面南为正，大多数百姓民宅也都是座北朝南，以显尊严，宫庭殿宇的布局严格以阳尊阴卑原则排列。例如北京故宫，座北朝南，南北中轴线上主要是宫殿、宫门，供皇帝所用，嫔妃大臣则置于中轴线两旁。天安门、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乾清坤宁两宫、神武门、地安门处在同一南北轴线上，轴心是太和殿。故宫的建筑结构，体现了《周易》阳尊阴卑、天尊地卑的思想观念，皇帝是天，是阳，因此要置于故宫的中央，只有这样才能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指导思想，住宅设计皆按君臣父子、长幼有序的伦理原则进行，正

房或上房是长辈之尊位，偏房或厢房为晚辈之所，界限分明。宫院衙府、豪门邸宅的设计都有不同，等级森严，不同等级的人其宅室高低、形状、颜色、图案等都有差别。由于这种区分相沿成习，使得中国古代许多建筑都是墨守成规，终年不变，处处似曾相识，缺乏创造性和吸引力。

第七章

《周易》思维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文化艺术、政治思想、法律规范、伦理道德等诸多内容。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林林总总、方方面面，零散而无序，但从精神实质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却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精神实体，是在以《周易》为源头的儒家思想和思维方式规范培育下的精神之花。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什么？现在并无一致意见，有多种概括：（1）中庸。宋明理学提出中国文化的道德就是“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的先人们一开始就有“中”的观念。《周易》阐发了这一观念，推崇执中，时中，孔子则明确提出中

庸之道。从尧舜开始，这一思想就一直流传下来，对世人影响深远。所以，中庸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2）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君臣有礼、长幼有序、夫妇有德、父有慈、子有孝、兄弟恭，各有义务，各守其道，此为礼。把礼当作处世之道。（3）天人协调。“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天与人之间存在着交感关系，天人相通相感，合二而一。人心是自然的体现，人心就是一个小宇宙，“ 尽心知性 ”可以知天。这是一种内在超越，人不是从现象以外，外部世界去寻找价值标准，而是到内心里面去寻找真、善、美。这种内在超越是中国文化的核心。（4）刚健有为。《易传》说：“天行道 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运行不息，称之为健，人应效法天的“健”而“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奋力前进，永不停息。自强不息精神激励中国人不断探索，不断把中国文化推向前进，使古代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历史事实。以上这四种概括，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人这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都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将这四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更抽象的概括，人文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人文主义是借用西方的说法。在西方 17 世纪，新兴资产阶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道反对神道，强调人的解放，强调人的尊严，强调人的民主自由。历史学家将这一历史运动称为人文主义运动。在我国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人文主义提法，而只是提出“仁”。《周易》把“仁”当作人的

本“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中国人讲“仁”实际上是讲做人道理，突出人的社会意义。这和西方人文主义突出个体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仁”要比西方人文主义早两千年左右。

孔子是被中国儒家奉为至圣先师的“圣人”。他的一生追求的是一个“仁”字。“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仁”说是以人为本位，尊重人道，实际上是一种哲学人类学。“仁者，人也”；“仁既有仁爱之意，也有人禽之分、人兽之别之意。中国儒家文化提出的仁学，涵盖宽广。从范围上看，它涉及到哲学、宗教、美学、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领域；从层次上看，它包含有身、心、灵、神四大层次问题。然而，仁学的核心还是道德的人本主义或伦理关系中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并通过人的各种不同角色来论述，论证人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每个人在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实现其价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让弟恭”、“朋友互信”，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和谐统一，达到大同世界。

孔子认为，仁义礼智信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称之为“五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孟子在说到仁义礼智信的规范作用时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

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人的美德，是善，并把它同天地之理联系起来，把“人道”等同于“天理”。因为在“理”、“道”这一层次上，天人是合一的。而要达到这一层次，需要人心体验、心灵感悟，方能“穷神知化”。

“仁义”之道被称为君子之道。体验此道就是人的德行修养，只有君子可以做到，小人则做不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也不是每一君子都能达到仁的标准，但小人是绝对没有行仁的。所以，仁与不仁是君子与小人区分的严格界限。“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即是君子之道。只有君子善于以仁与义的态度解决自身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孔子贵仁”，仁是他的思想核心，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命题，并指出行仁的方法和途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近能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些为仁之方，都是从人的本性（善）出发，把人的尊严建立在人的同情感、责任感和道德感基础上。不行仁，没有同情、互助、关心，则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人的尊严也体现不出来。因此，孔子论“仁”主要是从道德原则出发，把仁看作是最高的道德规范，是立人之道的根本。孟子则把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确立为人的内在本性，由内在

本性发出“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种道德情感。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恭敬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这“四端”即是人人生来就有的道德理性的萌芽。“四端”需要内心的自我体验，从而扩充发展为“四性”。孔孟之道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内容，“仁”则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反映孔孟之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体现出“仁”的道德原则，表现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学说是《周易》理论的深化。《周易》没有直接讲“仁”主要讲圣人之道，讲圣人与天地合一，讲圣人的品德与修养，但仍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系辞传》对圣人的品德与作用作了如下论述：“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圣人具有广博知识和高尚情操，就会乐天知命，敦厚仁爱，通达大度，以至于能“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这些论断既承认自然的客观规律，也肯定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人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就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主要是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以德感天。君子之德就是仁义礼智。《文言传》即把乾卦的元亨利贞解释为仁义礼智，把仁义礼智看作是君子的形象。认为仁义礼智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精华。

由上可见，《周易》与孔孟之道的儒家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重点都是以人为中心。在天人关系中认识人的意义和作用；在道德伦理关系中讨论人生修养和人生境界；在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精神不像西方人文主义精神那样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追求的不是个体自主性和个人权利，而是建立在群体的道德观基础上，追求天和人的统一性。人对道德追求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只是一种没有认识自己独立性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所以，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思维；在政治上表现为大一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关系。

保民敬德的封建政治文化

《周易》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一种认知思维习惯。按照整体思维原则，《周易》阐述了“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君主政治思想。它用自然变迁规律比附人世治乱规律，鼓吹君主“受命于天”的圣人观和臣民服从于天的畏圣规范。《周易》政治思想经过儒家的阐释和发展，逐步形成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

（《周易》形成于西周。《周易》卦爻辞基本上是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即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进程的记录，商灭周兴的巨大历史变革，使人们深感“天

命不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因而提出以德修政，“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大雅·文王》），而《周易》处处突出“德治”思想，时时告诫人们要记住殷之亡的教训。《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这里举《周易》中的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等卦为例，说明君子应如何身处忧患，反躬修德，履德行政的道理。履卦是说修德的第一步要践履，即要在实际行动中下功夫；谦卦是说要谦退，处患之时切勿矫亢自大；恒卦是说修德要有始有终，恒常不变；困卦是说只有在困境才能看出人的德行深浅；井卦是说修德就像井那样居而不改，有德施以及人；巽卦是说君子行德要深入其中，用心裁度，既顺时制宜，又不随流合污。上述所举卦例，皆是告诫君子要以德治天下，而不能像殷纣那样滥施暴政。时时忧患，谨慎从政，从而确保周朝江山万世一统。

《周易》通篇都讲忧患意识，戒慎戒惧的思想几乎贯彻六十四卦始终。君子当有识于此而有所不忘，对天下国家治乱存亡之大事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统治者要达到长治久安，就要以民为本，对民要谨慎宽容，“见善则近，有过则改”、“反身修德”、“恐惧而豫防之”（《彖传》）。

《周易》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敬德”、“保民”强调

宽宏容民，以德服民。在《周易》卦爻辞中，强调以民为本，主张实行宽和政策的论述很多。这些论述还表现出反对暴虐、同情民众、尚贤用贤、为政自治用明、治民用晦等进步思想。例如剥卦，在谈到小人与君子之间的关系如何调整问题时说：“君子得舆，民所载也”“上以厚下安宅”（《彖传》）。剥必始于下，阳被阴剥，“不利有攸往”，下剥则上危。观剥之象，统治者应该厚下，恩加百姓，施于仁治。只有如此，才能“安宅”，保证自己的统治。又如临卦：“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是天子诸侯君临国家，统治人民的意思。如何统治？从临卦中得出的结论是要教民、保民。主张采取道德教化的办法感化人民，反对以暴力刑罚来治理国家，即以德服民。临卦的表示是，土地是宽厚的，它以自己博大的胸怀，给水以广阔的居处，使之成为受包容受滋润的泽。人君应当像土地那样对民大度包容，宽厚为怀。否则，民将像水决堤坝那样冲垮它，淹没它。《周易》的其他卦也论述了这一道理。“师：君子以容民畜众”。“蛊：君子以振民育德”。“井：君子以劳民劝相”。“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这些都说明《周易》具有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在孔子、孟子论述中得到更臻于完善的说明。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对民本主义思想概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当然，《周易》是为君子谋而不为小人谋。以民为本，只是由

于民心可畏。如果不顺乎天应乎民，不去小心慎重地解决好百姓民众问题，就会导致君王统治覆亡，所以，君王要以民为本，以德修政。

《周易》政治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殷周时期，周贵族战胜殷贵族，建立了西周奴隶主政权。作为统治阶级，周贵族敬德保民，以维护王权统治权的稳固性和永久性。同时，还需要利用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君王、天子、诸侯是主体，居支配地位，下属诸臣只是君王的附庸。至于庶民百姓，只是小人，根本无权从事国家政事。

《周易》六十四卦是乾卦居首，象征君王之位，坤卦居次，象征臣位。乾尊坤卑即天尊地卑，决定了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系辞传》开宗明义地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的性质是健，坤的性质是顺，坤顺乾。健意为天体永不停息地运转，不借助其他力量而自动运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改变它。因为，乾坤两卦是一种主从、唱和、动静关系。坤卦的一切特点都是顺着乾的特点而产生，坤的活动都是在乾的影响下进行。虽乾坤合德，方能万物化生，但乾在创生万物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坤卦六三爻辞明确指出乾坤是主从关系：“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是说坤含晦不露，随时准备为乾效劳而不居功。这就把坤道释作臣道。坤卦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君是玄色，臣是黄色，玄黄不能混杂，君臣的尊卑界限在任何情况都不可混淆。君尊臣卑的等

级观念在六十四卦中都有表现，而且贯彻始终，经传一致，是《周易》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

《周易》的忧患意识、保民思想和等级观念是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在秦统一中国和汉武帝儒学为一尊之后，这些观点得到历代封建帝王肯定和青睐，成为治世圭臬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金科玉律。正是在这一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古代中国逐渐从诸侯割据走向多民族统一。大一统的社会要求统一、集中。这就需要儒家的精神力量。以儒家经典和思维方式明天道，正人伦，以德治天下。我国历史上的秦汉隋唐都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到了宋代，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财权、兵权都集中至中央。明清两代废除宰相，权力则集中到皇帝一人，中央集权成为皇帝的个人独裁。与此同时，儒家政治思想也进一步完善，等级观念发展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三纲”是中国封建大一统社会权力集中的思想基础，维护中国封建宗法制度有效的思想武器。

神道设教的宗教文化

《周易》的卦辞都表现了崇尚天命、迷信神权的特点，并提出王权神授，天子受命于天，“王用亨于帝”这一天命观，以此来论证周王秉承天意、统治人民的合法性。这表

明《周易》具有维护西周奴隶主统治的宗教性的政治倾向。

我国殷商时期，已经产生了高居于一切神灵之上，具有无限权威的最高神——天帝，使古代宗教由多神崇拜过渡到一神崇拜。殷王朝正需要这样一个有无限权威的神来维护其统治的权威。但殷商对天帝的信仰，还只是当作消极、被动的祈求对象来崇拜，还没有赋予它主动支配社会命运的神力性质。天意、天命的迷信观念还没有成为上帝的主要神性。周代开始，天帝被称为天上帝，其神性较殷商时期有很大的发展，其权威提高了很多。天的权威表现在：（1）具有直接派遣国王者权威的权威，被上帝选定的受命者与上帝有着父子关系，所以国王称为天子，使周朝统治权神圣化。（2）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及社会政治制度结合起来，顺从天意是宗教信仰的一般信条。周统治者利用这一点，把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也说成是来自天意。“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这里的礼也就是德，不仅指社会道德，而且还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等规范。把社会道德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准则神圣化、天意化，也就是“神道设教”，用以维护王朝纲纪和内部团结。鉴于殷王朝灭亡的教训，周代统治者重视德的天意化，强调上帝的天意是“惟德是辅”，只有明君才会得到神祐。所以，为君者必须“敬德”、“崇德”、“明德”、“顾德”、“用德”。如果君王不修德、不敬德，就会遭到上天的唾弃，其统治就会被推翻。

宗教迷信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上，而且还表现在相应的

祭卜祀、礼拜仪式和占卜活动中。祭神拜祖，占卜吉凶，祈祷上天神灵保佑。《周易》原本是一部占卜用书，对事物吉凶的判断和预测是通过算卦这一形式来进行。《周易》的思想观念只有通过卦象符号才能得到说明，没有卦象和卦辞的唯象思维和逻辑推导，就得不到吉凶判断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周易》通过占卦而得卦理，增加了卦的神秘性。把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以天命说明人事，赋予人事以神学性质。

《周易》崇尚天命 迷信神权。《易传》用神秘的天命观注释《易经》对卜占、卜卦进行神秘的解释。“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传》）依托于远古神人的创造来提高《周易》的权威性和神秘性，《系辞传》也对分揲蓍策五十根以得兆的方法作了神秘的解释，认为“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变化而行鬼神也”。实际上，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不过是对卜占进行神学论证，借此提高《易经》的神学地位和天启作用。

《周易》的天命观在卦爻辞中集中表现出来。例如乾九五：“飞龙在天”，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大有上九：“自天祐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姤九五：“有陨自天”，睽六三：“其人天且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这些关于天的论述，都赋予天以神的意义，天成了一种人格神。天对人间善恶均有报应，赏罚分明，天网恢恢，疏而勿

漏，人的命运逃脱不了天命的支配，陨灭由天。君王秉承天意，受命于天，故能得到上天保佑，无往而不利。人臣百姓只要能得到天的帮助和保佑，也能得吉，没有不顺利的。

《周易》既然崇尚天命，迷信神权，因此倡导“神道设教”用宗教鬼神观念教化百姓，陶冶灵魂。《周易》“神道设教”观点是在观卦里提出的，“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这几句是解释卦辞的，意思是说，为君者在上面无声无响地做出榜样，竭诚尽敬地信仰神道，为臣为民者在下面观看、揣摩，从中受到感化教育。天之神道是什么？就是无言无语的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这些变化是人的意志不能左右，有时甚至是不能预料的。天地阴阳，变化多端，奥妙无穷，但又“四时不忒”，极有规律，像有什么意志在其中主宰，这就是神。天有神道而四十不差忒。为君者仿效天之神道，默默地崇天命，信神道，祭神拜祖，占吉问凶，君子做出榜样，社会上行下效，百姓群起效法，从而达到观感化物，以德服民。统治者做出榜样，让天下百姓从中得到教育并按此榜样去做，这就是说教。因此，神道设教是以神为中心内容，以祭祀为主要形式，用自己的虔诚宗教行动表示对神道的衷心信仰，以感化臣民百姓，使其精神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神的轨道。

由上所述，“神道设教”思想是《周易》首次表述出来的，它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天命，而孔子《论语》就有许多天命观论述。例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道之将行也与 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宪问》）“获罪于天 无

所祷也”(《八佾》)“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泰伯》)“天下之无道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天生德于予 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孔子这里的“天”含义主要是义理之天，是命运之天。天虽无形、无言，但却以德与民为其“天命”的表征，天应之于人，天命征之于民心，人君只有敬德保民，才能直接与天交通，达到与天合一。也只有“以德配天”，才能成为真龙天子。孔子用天命来阐释仁义道德理论，强调君子践行，首先要做到“以德配天”，要用德行感召世人。孟子则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观点，认为天最根本的属性是道德性。合乎人的道德规范，也有是合乎了天意，人心、人性、天意是合为一体的。天所包涵的一切，也同时存在于人心，因此，尽心就能知天。汉朝董仲舒精心构制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经学神学唯心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就是“奉天”、“法天”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在董仲舒看来，作为最高神的“天”，具有人的各种精神属性，是至善的人格神，他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总之，人之性也就是天之性，天人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之所以创造出人类，是为了实现天的意志。这样，董仲舒就使儒家理论向神学化的方向转变。

儒家把天的神性与社会政治制度及道德规范结合起来，

要求人们顺天应人，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之所以如此，大概与《周易》提出的神道设教的目的有关。不仅儒家如此，其它各家学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神学色彩。

汉武帝刘彻（前 156 – 前 87）虽定儒学为一尊，实际上是儒、道、佛三家并驾齐驱，互相吸收、渗透。但就宗教观念方面而言，不管是儒、是佛、是道，都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我国封建制度的本质是宗法制度。它强调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社会关系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由此而决定的宗教观念中必然渗透有宗法意识和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修身养性，敬德保民，崇德利用。而所谓的“神道设教”正是在这种精神支配下的一个道德教化过程，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

崇德重礼的伦理文化

《周易》属于儒家经典，其伦理道德观点经儒家传人的发挥，逐步形成中国特有的崇德重礼的伦理文化。

德和礼是《周易》中两个重要概念、范畴。德表征人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系辞上传》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这是说，人们一旦认识到天

道人道之规律，就可以使思想认识水平达到神明的程度。又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行，存乎德行。”这段话是讲人与（易）的关系，强调卜卦是否神明主要看《易》者自身素质如何，修养如何，即德行如何。人们在用《易》时，对《易》的分析和体会所达到的深度不尽相同，见仁见智，只有谙熟易理、精通卦术，才能“神而明之”。要做到这点，不在《易》，而在于人，在于人的德行修养。德在易学中是对“道”之认识水平高低、个人素养高低的标志。

礼是血缘关系的亲疏差异和政治关系的贵贱不同而形成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用一定的程式和仪节表现出来，就是礼。《周易》对礼的形成作了说明，“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说卦传》）。人类真正脱离动物状态走向社会文明的关键环节是一夫一妻的对偶婚制的建立。《说卦传》将礼的产生追溯到人类婚姻制度的起端，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关系的原始是夫妇关系，有夫妇关系后，才有父子关系，有父子关系后，人伦等级就出现了。君臣关系、长幼关系、朋友关系等都带有上下、尊卑差别，由此形成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

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

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周易》是殷周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周易》所提出的伦理道德观念当然是反映我国奴隶制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念。《周易》表现出来的伦理道德观念带有当时社会的历史特征，例如，认为鞭打、卖买、屠杀奴隶并不是违反道德的行为规范。“升九二”和“革六二”爻辞说，用俘虏或奴隶来进行夏祭，可消灾患，是吉利之兆。又如“恒其德，贞妇人，吉，无子凶”（恒·六五）。“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渐·九三）。这是对妇女的道德规范，反映出奴隶制等级关系，对妇女行为有着强大的约束作用。

《易经》中还有许多有关维持社会秩序、保持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方面的记载，主要内容有：（1）将盗窃看作是不道德的犯罪行为。“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巽·上九）。（2）认为谦虚是人的美德。“谦、亨、君子有终”（谦·卦辞）。“谦谦，君子用大川，吉”（谦·初六）。“鸣谦，贞吉”（谦·六二）。“劳谦，君子有终，吉”（谦·九三）。“无不利，撝谦”（谦·六四）。以上爻辞都是说只要以谦虚态度待人处事，就会“亨”、“吉”、“有终”、“无不利”。《易传》发挥《易经》贵谦的道德观念，并引申到天、地、人三才中去，从普遍意义上论证了“盈则损”、“谦则益”的道理；（3）以节省为美德，如节卦卦辞：“节，亨，其节不可贞。”“节，上六”爻辞：“其节，贞凶，悔亡。”称赞节省行为，以节省为美德，是吉，是亨，而奢侈浪费，视节为痛苦的行为则是恶行，结果必是“贞凶”、“悔亡”；（4）提倡贵敬之

德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需·上六)。“履错然，敬之无咎”(离·初九)。这是说，对不召自来的客人，虽素不相识，也应恭敬礼貌，就像对待贵宾和熟客一样热情周到，对不同身份的人都以恭敬态度对待，乃是吉利的道德行为。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易)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在我国历史上首创了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孔子把人与社会、国家、宗族等关系，归结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乡党等关系，提出一系列道德规范，作为处理相应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作为提高个人道德品质、道德风尚的准绳和道德评价的标准。在孔子的道德规范中，“仁”是统率一切的，是道德的核心。其他规范诸如忠、孝、悌、信、恕等都是从“仁”这一根本点出发的，都是从不同方面表现“仁”。有了“仁”，做到仁人君子，就可以协调人际关系，正确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孔子在强调“仁”是伦理道德核心时，还强调“礼”。仁是内在的道德品质，礼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一个人严格地依礼行事，就符合了仁的要求。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有崇德重礼的特征。德和礼是互为表里的。礼作为等级名分制度需要一定的道德规范来维持。家国一体的封建家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关系的基础上的，维护家法制度则应提倡忠孝慈友悌等道德要求，故以“德”治为主。人们如果能“尽伦”，即尽忠、尽孝、尽义、尽友悌等道德义务，就可以正人伦，修己身，君臣、父子、

夫妇、兄弟、朋友等社会等级制度就安然如固。亘古如斯，最终自然就会实现“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大同社会。

形神合一的艺术文化

有着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舞蹈等艺术领域，曾取得璀璨夺目的成就。这些遗产独具一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形成和发展颇受易学中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周易》的天人合一、形神合一、阴阳和谐、刚柔统一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我国古代审美观的理论基础和审美标准。中国美学中的范畴，如言、象、意；理和情、文和质、形和神、虚和实、刚和柔等都来自易学理论。中国古代的书、画、诗、文和其他艺术形式追求的都是一种形神合一，物我交融，审美主客体和谐统一的审美心境和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和“易”理天人合一是不谋而合的。《周易》所阐发的人与自然的统一精神，是艺术和审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周易》是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人和自然的统一，艺术是从美的角度来阐述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所以，《周易》与艺术理论和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易》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指导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周易》的象论和意象思维是艺术创造的主要思维形式和艺术手法。我们知道，《周易》是用卦象来表达其思想的。它用抽象的奇“—”、偶“--”符号的不同排列而形成的符号，分别指代世界万物，并象征世界万物的复杂变化，这就是《易传》所说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事，观象而明理，这一意象思维类似形象思维形式。《周易》正是通过这种思维形式来把握世界的。艺术创造广泛使用的是形象思维，运用艺术形象反映人们的思想，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没有形象塑造就没有艺术，没有对客观事物及现象的摹仿、比喻、类比等形象思维的特殊手法，就不可能创造出艺术作品来。从艺术的起源来看，原始的艺术活动是直接摹拟客观事物形象和人类行为。所以，古代的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常把我国文字、绘画和书法的起源，归之于伏羲氏所画的八卦，提出书画同源说。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保存了自西周至春秋中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民间歌谣，雅是贵族作品，颂是宗庙祭神祭祖的乐歌，它们都是运用类比、象征、比喻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的心理，情节感人，形象逼真。古代还相传钟子期遇知音的故事：琴家伯牙鼓琴，他的朋友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奏乐想到高山、流水，钟子期一听就能理解，伯牙琴声就是高山流水的象征，琴声瑟瑟，流水潺潺，情景交融，声形并茂。这就是艺术感性形象的魅力所在。而《周易》提出“立象的尽意”，即是

指艺术与感性具体形象的关系，揭示了艺术形象表达意境的艺术规律，强调艺术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二、《周易》形神观应用到艺术领域，形成形神兼备的艺术创作基本原则。《周易》论“神”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阴阳不测之谓神，即神妙难测之意；一是指人的主体能力之“神”。客观事物内部的精义妙理，能为人所认识和把握即具有这种超凡入圣认识能力的人称之为有“神”。《说卦传》指出：“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这里是说八卦之象的神秘之处。其中所蕴含的精微奥妙的事理就是“神”。把握住这一精微之处即“知几”就“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务”。透过事物千变万化的现象去把握其中之“神”，以象传神，形神兼备，这是艺术创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为历代艺术大师所重视。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最早将《周易》中的形神观念引入到绘画领域，提出“神贵于形”的观点。东晋画家顾恺之（约 345—406）根据易玄学派追求义理和神力而鄙视物象的观点，提出“传神写照”、“以形写神”极重神韵。中国古代的艺术批评家在艺术批评中，直接以“神”为审美标准，判定书画艺术作品的优劣好坏。如南齐大书法家王僧虔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为可绍于古人。”根据形神兼备的见解，中国古代艺术家大都追求神似而不以形似为然，将“神形合一”看作是艺术品最高境界。

三、《周易》的阴阳和谐的整体观，是我国文学艺术批评的基本准则和哲学基础。阴阳统一、刚柔相济、整体协调是《周易》基本思想和方法论之一。这一思想体现在艺术和美学理论之中，形成阴阳刚柔协调一致的审美标准。受《周易》阳刚阴柔说的影响，我国历史上曾形成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美论的观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关系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彼此联系、互相补充的，阳刚之美的形象不仅是刚健遒劲，而且是刚中有柔；阴柔之美的形象不但柔婉妩媚，而且柔中有刚。我国现存的系统论述音乐理论的著作《礼记·乐记》，以阴阳对立说明礼的意义，以阴阳统一说明乐的意义，认为“乐者审一以定和，此物以饰节，节奏和以成文”，并提出“乐者天地之和”的命题。在这一命题中，“和”是指阴阳刚柔处于和谐的状态。这一原则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家和评论家影响极大，他们大都主张“阴阳相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的观点。古代书法特别重视刚柔相济整体协调原则。中国字是方块字，粗细长短、上下左右都要从整体着眼，错落有致、刚柔相济、整体协调，这样才能显出飘逸俊逸之美，既刚健豪放有气概，又柔美细腻有文质。整体美是所有艺术形式共同要求的，音乐、绘画、诗文、舞蹈等都是如此。在坚持阴阳统一、整体和谐的艺术原则的前提下，中国古代艺术往往倾向于阳刚之美。这种倾向也是受《周易》尚阳贵刚、阳贵阴贱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艺术作品，如颜真卿的书法、韩愈的诗、范仲淹的文、顾恺之的画，都显示出一种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志趣豪爽的

阳刚之美。总之，《周易》思想是我国古代艺术审美观念的灵魂，正是在《周易》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影响下，我国古代艺术取得辉煌成就。

第八章

《周易》与传统思维方式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的宇宙代数学，对神秘的东方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的催萌和范导作用。纵观中国哲学史，《周易》及后来的易学与中国哲学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汉代到近代，中国哲学理论思维无不受易学的影响。《周易》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哲学命题，经过历代易学家和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阐发，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解释和观察世界的依据，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确立的前提和基础。古代哲学家正是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锻炼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周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启迪人们的思维，而且促进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政治伦理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周易》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古代思维的规范作用

《易》有《易经》、《易传》、易学三部分。《易经》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的典籍，《易传》是战国时代形成的解释《易经》的著述，易学则是秦汉以来的易学家和哲学家对《周易》的经传所作的种种注释和阐述。《周易》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范导作用，主要是通过易学研究扩散影响的。易学派别林立，最有影响的当属儒家系统的哲学流派。不管易学流派观点如何不同，但都是将《周易》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许多易学家都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对《周易》的解释和考证上。易学家们对《周易》的注疏、解说的论述和著述浩如烟海，极其丰富，古代哲学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因此，通过对易学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研究《周易》，在历史上基本上分为两类人：一是历代的经学家，侧重于《易经》中的象数理论，以注释、考据为主；二是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侧重于义理。易学各流派，名家大师都在《周易》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阐发了《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易学发展基本上经历五个时期或五种形态：战国时期的《易传》，两汉时期的汉易，晋唐时期的唐易，两宋时期的宋易，明清时期的易学。两汉的易学基本是经师解《易》，属象数学派。其主要代表是京房、孟

喜、郑玄、荀爽、虞翻等人。他们以《周易》为构架，结合阴阳五行说和日月星辰及四季物候变化的天文历学，并采纳天人感应思想，创立了所谓互体、旁通、卦气、爻辰、纳甲等象数学模式体例，形成了以卦气为中心的易学哲学体系。从魏晋开始，两汉经学转变为魏晋玄学，《周易》原理玄学化，王弼是玄学派的创始人。用老庄道家理论解释儒家经典，是晋唐易学的主要特点。宋易是把《周易》同道学或理学结合起来，从本体论上论证世界的本原，其代表是邵雍、程颐、朱熹等人。他们以“理”解释太极，以阴阳二气解释两仪。认为太极和两仪、理和气之间并无先后关系，将天地万物看作是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明清之际，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认为天地万物乃太极之气自身的展开。太极之气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气作为世界的物质本原，同天地万物不可分割，这一带有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哲学、易学的发展推向新的水平。

封建时代，《周易》位六经之首，历来为儒生必习之书，并奉《周易》为圣人之书。他们认为《周易》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完满无缺，是绝对真理，对《周易》只能注、疏、解、释，不能离经叛道而乱猜妄测。每个时代的易学家都认为他们的解释符合于（周易）的本义，特别是儒家系统的易学家，更自认为正统，其他为别传。其实，《周易》的影响并不只局限于儒家哲学，其他系统的哲学，也一定程度上从《周易》的研究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易学既然是对《周易》象数义理的研究，那么，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则为

各家所共用，如太极、乾坤、阴阳、天道、人事、形而上、形而下、象数、言意、神等概念，都对古代哲学发展起到深刻影响，各流各派哲学基本上是以易为依据。当然，儒家哲学体系直接起源于《周易》，《易传》就为儒家哲学提供了初步的框架。汉代哲学家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说，将《易经》中的天人观念发展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体系。宋明时期，儒家学说发展到高峰，形成新儒学。从北宋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 and 理论思维形式说，是通过宋易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哲学中的理学派、气学派、数学派、心学派、功利学派等哲学流派，其理论内容都同易学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宋明哲学也是易学，易学是宋明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周易》中的基本命题和思维方式对宋明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它规定了宋明哲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由此可见，儒家哲学发展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易道精神，是易道精神的发扬光大。

《周易》思维方式在漫长的易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结构。它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政治意识、法律思想、宗教、哲学等各个不同的精神现象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社会实践和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普遍起作用的共同的思维定势。正是由于《周易》思维方式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根深蒂固，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从总体上看摆脱不了《周易》的思维窠臼，带有明显的易学特征。我们如果要了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就必须将其与《周易》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考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就是《周易》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当《周易》走出占筮的迷信误区之后，其中所含有的逻辑推衍和理性分析的方式方法，得到后来的易学和哲学的发挥，使它逐渐变成指导人们的生活、规范人的言行以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指南。如《周易》以阴阳变易的法则说明一切事物的辩证思维，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而《周易》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如此深刻影响，并不是它的神秘形式，也不在于它的卦象卦辞，而在于它理论思维内容和表达义理的辩证思维形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是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在华夏文明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的风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把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质，是由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因中遗传下来的行为方式。前面业已指出，《周易》的整体思维、唯象思维、逻辑思维、情感直觉思维等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重视形象思维，并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融汇贯通，灵活运用；长于直觉思维的内心体验，弱于对实体的抽象分析和逻辑推理；强调整体平衡、关系和谐、统一，追求天人一致而不是天人相分，追求道德修养而不是科学知识，等等。这些思维特征和思维偏向在《周易》萌发出来后，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并转变为传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不同文化领域，经过各门学科的引申、推广、具体化，生长出许多特殊概念和范畴。例如，哲学领域中的理、气、道、形、神、器等概念；美学中的“气韵”、“传神”、“意象”、“风骨”、“性灵”等范畴；中医中的“三阴三阳”、“辨证施治”理论等都是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下形成的，都具有传统文化的基因特性。

在《周易》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征：

1. 内向性

中国古代哲学是围绕人与自然，围绕天人合一的主题而展开的，人在这一主题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是以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思维指向不是客观的对象世界，而是思维主体自身。思维是从人的内在情感需要出发，通过意向活动的自我反思获得人生和世界的意义。儒家强调人的养性修身，把道德价值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认为人人皆有道德之心，就要反求诸己，返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进行“自省”即自我反思。修养养性就是修心，是道德修养的功夫所在。如孔子的“仁”

学，把仁看作人的内在德性，要认识和实现人的内在德性，需要靠人自身努力和修养。“我欲仁 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篇》）仁，是内在的，在人的心中。要得到它，只有向自己心中去寻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仁就等同于人的内在本性，仁就是心，心即是仁，要认识仁，必须反求诸己，内向思维。儒家是在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反省人的自然本性。儒家和道家都把重点放在个人身心的修养上面，是一种内倾性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内向性，还表现为是一元的，封闭的，收敛的。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条件下，人的思维要受到专制政治的约束，受到“大一统”政治观点的左右。政治和学术上的专制主义导致我国传统文化趋于封闭保守，人心收敛，思维缺少创造活力。这是内向性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内向性又是与“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适应的。

2. 整体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趋于寻求对立面的统一，长于综合性、整体性。这种求同性思维，善于从总体上，从事物的联系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中国古代哲学一向把主体和客体联系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考察，力求在天与人、理与气、心与物、体与用、文与质诸种对立关系中，寻找一种自然的和谐。在整体系统化思维框架中，道、气、太极、理是代表整体或整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等则是这一整体的构成要素。

（周易）在我国哲学史上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整体思维模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统统纳入由阴阳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中。它还提出天地人“三才”观，将天道、地道、人道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充实了整体论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命题。孔、孟、老、庄，诸子百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都提出了这一命题。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都强调了人必须与天认同、一致、和睦、协调。汉代董仲舒将“天人合一”命题发展为“天人感应”的有机整体图式。整体平衡协调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医理论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阴阳二气的不停运动是世界存在的原因，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因。所以，阴阳平衡是人身体健康的标志。为了身心健康，就要保持人体阴阳的动态平衡。整体观念是中国人古而有之的思想，普遍地为人接受，广泛地应用到人们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

3. 模糊性

中国传统思维重体验，贵象，用直观，取整体。这样的思维方式能够对客观世界有一个比较抽象的、素朴的、基本的把握，对世界总体图景和基本规律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缺乏严格的科学的求证和分析，它只能是粗略笼统的、不精确的，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因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唯象思维在中国古代比较发达。《易经》就是借助卦象推断天理人事的唯象思维方式，建立变易思想体系。

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学等学科也大都以《易经》的唯象思维作为观察、认识客观对象的主要思维方法。中国的语言是意象性语言，其文字符号本身就是形象和意义的统一。中国绘画也是意象一体，注重意、神和韵。意象性思维是以“象”作中介，直接去把握事物的理性具体——意，而“象”则是具体的、可感知的东西。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和社会呈现出来的现象，一是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而产生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运用自然之象或符号之象表示某种抽象概念和思想感情或意境的思维形式，就是意象思维。它直接运用具体的、个别的形象去把握一般，用生动直观的东西去喻指抽象深奥的道理。这是一种直观性、经验性的思维形式。在漫长的人类思维发展的历程中，意象这种抽象概括方式对人类认识有着特殊意义，在各民族进程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思维形式。如儒家和道家皆援“象”以为说，把“象”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演化成象数之学。儒道诸家学说都可用象数联系沟通，都可用意象思维来“尽心”“体道”。但意象思维仍有其不足。这就是模糊性。因为它凭借符号和经验领悟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深层意境，而不是靠抽象概括、逻辑推理进行综合分析，往往缺乏科学基础。强调自然界整体性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仅满足于通过直觉得到一个总体印象。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们重“道”轻“器”，追求形而上，忽视形而下，对自然的认识始终保持着直观猜测和朦胧意识的特点。

4. 非理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视心理体验和感性直观，非理性在它的思维方式中占有突出地位。直觉思维在中国古代比较普遍，也比较发达。先秦道家的“致虚极，守静笃”、“玄览”、“体道”、“见独”；佛教的“顿悟”；儒家孟子的“良知”，（易传）中的“穷神知化”、“德盛自知”，宋明理学的“德性所知”、“豁然贯通”、“明心见性”、“致良知”等，都是直觉思维，或带有直觉思维的性质。直觉思维是一种无需经过感性经验和理性逻辑思维，直接从整体上去把握形而上的思维方式。道家崇尚直觉思维，提倡冥思默想的体道方式，反对感性经验和理性的认识形式，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子》），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由于排斥经验认识和理性思维，道家实际是主张直觉思维，即通过非理性的直觉方法和途径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佛教哲学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内心体验的直觉思维。佛教追求超越现实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要达到这种摆脱人生痛苦的理想境界，就需要顿悟直觉的心理体验功夫。它排除感性经验，逻辑分析，甚至不立文字，力求解除语言文字对思维的束缚，通过悟禅，主体直接与客体融合为一，于是获得精神解脱和心理满足而达到超越现实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和道教、佛教一样，也是以追求人生理想境界为目标，从而也就这样或那样地采用直觉思维形式以体认人生和宇宙的本质。《周易》就特别重视认识主体道德情感、心理情感的直觉体验和自我超越，认为只要自强不息，朝夕惕慎地进德修业，就可以“精义入神”、“穷神

知化”德器自成,仁知自得。

5. 稳定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历史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既没有被其他文化同化,也没有因战争突变、朝代更迭而中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超稳定性。稳态的传统文化结构与超稳定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互为因果的。例如,儒家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经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孔子言论中就已充分表现出来。孔子提倡“述而不作”、“好古”、“混古”,主张“兴灭国,继绝世”、“克己复礼”,向往文王周公的“开明盛世”。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重儒家道统,崇尚经传,畏圣人,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样一种世袭相传的文化结构和混古不变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超稳定性。由此可见,稳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来自于稳定的传统思维方式,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又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思维方式的稳定性。

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上述特征,表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东方古老民族的特殊气质和风貌。从这些特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同《周易》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的。《周易》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它尊定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虽然后来有儒佛道三教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的文化融合,但《周易》创立的思维方式仍然为历史所接受,并在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长河中逐渐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成为中国人固有的

民族心理和思维模式，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内向性、整体性、模糊性、非理性、稳定性特征，也是《周易》思维方式的特征，两者是等价的。《周易》思维方式始终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支撑点，一开始就是一稳态结构。历史变迁并没有使它脱胎换骨，且得到不断加强，成为中国人主要的传统思维方式。

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传统思维方式也具有两重性；它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一个沉重的包袱；既给中华民族带来智慧之光，也给它的发展设置了障碍；既体现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精神，也包含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素。其缺点和优点掺杂在一起，既是长处又是不足。例如，整体性既是整体、系统、辩证的思维，同时也是模糊、不精确的，是整体模糊性。而传统思维就是整体性和模糊性的统一体。正是因为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两重性，所以，我们既不能对它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继承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积极因素，吸收其合理成分，抛弃其保守、消极、不合理成分，从而形成能适应现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思维方式。

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在近代中国，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向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并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逐步发生了变

革。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所发生的变革，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保守落后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从过去的陈旧框架中解放出来。传统思维固守封建伦理道德，把古代圣贤经典看作万古不变的教条，强调天人和谐统一而忽视人对自然的认识、征服和改造，满足于整体直觉，而忽视感性知识积累和理性逻辑推理。这种崇尚教条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的思维能动作用的发挥，扼杀了人的求知欲望和改造自然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从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近代思想家、学者康有为(1858—1927)、严复(1853—1921)、王国维(1877—1927)、章太炎(1869—1936)等宣传培根的实验方法和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主张思想自由，“破学界之奴性”，要求人们解放思想，摆脱传统经学方式的束缚。他们对传统经学方式的冲击和批判，是对两千多年封建思想一统天下提出的挑战，掀起了一场思想文化革命。从此之后，中国逐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传统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随着中国大门的被打开，摆脱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束缚，建立新的思维方式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二，介绍和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中国近代的先进人物除了批判和冲击传统思想观念，主张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外，还积极向西方学习寻求科学方法，以变革不合时宜的传统思维方式。如严复第一个在中国系统介绍西方

近代逻辑学 翻译了《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西方逻辑学著作，开办逻辑讲习班，大力传播西方近代逻辑学知识。他针对传统思维的整体模糊性、形式逻辑不足等弱点，提倡归纳的逻辑思维。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三，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919年，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是一次更大规模、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不仅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猛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思想和传统观念，而且还介绍和传播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这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已经和正在不断发生改变，并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所逐步代替。

从模糊的整体观、中庸论到近代的逻辑学、进化论，再到辩证唯物论，这是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思维方式发展中的一次大飞跃。但是，我们要看到，用唯物辩证综合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整体模糊思维方式，并不说明传统思维方式已经转换到唯物辩证思维方式上来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任务并没有完成。事实上，传统思维方式依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例如，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搞平衡协调，中庸之道；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唯上唯书，机械照搬，教条主义；凭感性直观和主观想象进行决策，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崇拜权力，搞人身依附，家长作风，等等。这些表现都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有关。我们还要看

到，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历史继承性，它不会随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改变而随之改变，仍会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和社会风俗习惯之中。

因此，总结近代思维方式变革与经验教训，分清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发扬优良传统，克服消极影响，在现代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更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努力实现我们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对于我们仍是一项重要的思想任务。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当代中国人的肩上。

易学智慧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朱 伯 崑

副 主 编 刘 长 林 郑 万 耕

序

任继愈

《易经》这部书幽微而昭著，繁富而简明。五千年间，易学思想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生哲学。

《周易》经传符号单纯（只有阴阳两个符号）文字简约（约两万四千余字），给后代诠释者留出驰骋才学的广阔天地。迄今解易之书逾数千家。近年已有光电传播媒体，今后阐释易学的各种著作势将更为丰富。

历代有真知灼见的易学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反映各时代、各阶层的重大问题。前人研究易学的成果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研究易学，古人有古人的重点，今人有今人的重点。今天中国人的使命是加速现代化的步伐，迎接二十一世纪。

易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也要为文化现代化而做贡献。当代新易学的任务之一是摆脱神学迷信。易学虽起源于神学迷信，其出路却在于摆脱神学迷信。凡是有生命的文化，都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大到社会治乱，小到个人吉凶，都想探寻个究竟。人在世上，是听命于神，还是求助于人，争论了几千年，这两条道路都有支持者。

哲学家见到《易经》，从中悟出弥纶天地的大道理；德国莱布尼兹见到《易经》，从中启悟出数学二进制的前景；严君平学《易经》，构建玄学易学的体系；江湖术士不乏“张铁口”、“王半仙”之流，假易学之名，蛊惑愚众，欺世骗财。易学研究走什么道路，是易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大事，每一位严肃的易学研究者负有学术导向的责任。

本丛书的撰著者多是我国近二十年来涌现的中青年易学专家。他们有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的基础，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有严肃认真的学风，易学造诣各有专攻。这部丛书集结问世，必将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助于易学健康开展，为初学者提供入门津梁，为高深造诣者申一得之见以供参考。

这套丛书的主旨，借用王充（论衡）的话——“疾虚妄”。《论衡》作于二千年前。然而，旧迷雾被清除，新迷雾又弥漫，“疾虚妄”的任务远未完成。如果多数群众尚在愚昧迷信中不能摆脱，我们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精神文明就无从谈起。我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

本丛书的不足之处，希望与读者同切磋，共同提高。

题辞

阐发易学的精湛思想
深研天地人三才之道

张岱年



一九九六年六月